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計畫名稱】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黃 默

執行期程：96.08.01-97.07.31

日期：中華民國 97 年 08 月 04 日

目次

一、	計畫名稱.....	p. 1
二、	計畫目標.....	p. 1-3
三、	導讀.....	p. 3-4
四、	研讀成果及議題探討結論.....	p. 5-49
五、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p. 50-51
六、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p. 51
七、	經費運用情形.....	p. 51
八、	改進建議.....	p. 51
九、	附錄.....	p. 52-180
	(一) 2007/10/05.....	p. 52
	(二) 2007/10/26.....	p. 53-60
	(三) 2007/11/16.....	p. 61-69
	(四) 2007/12/07.....	p. 70-80
	(五) 2007/12/28.....	p. 81-84
	(六) 2008/03/07.....	p. 85-102
	(七) 2008/03/28.....	p. 103-126
	(八) 2008/04/18.....	p. 127-149
	(九) 2008/05/09.....	p. 150-166
	(十) 2008/05/30.....	p. 167-180

一、 計畫名稱

「全球化、發展與弱勢族群的權利」經典研讀活動

二、 計畫目標

It is a much tougher sale out there, in a world where half of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struggle to survive on less than \$2.00 a day. Try to imagine what globalization can possibly mean to half of humanity that has never made, or received, a phone call. The simpl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is: if we cannot make globalization work for all, in the end it will work for none.

---Kofi Annan

「全球化」一詞儼然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人們朗朗上口的生活用語，即便未能釐清其所涵蓋的廣泛意含，行文用詞之間若不能加上「全球化」三字，似乎就顯得不夠「全球化」了。這股由新自由主義思潮所引領的，強調開放、競爭、自由市場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一書出版後，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夕之間，「全球化」與「世界是平的」被劃上了等號，允諾人們美好的未來—全球化可以為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帶來利益。但太多的數據證明，這樣的允諾並沒有實現，因為經濟一直在推動著全球化，然而政治卻左右了全球化的走向。經濟全球化，特別是WTO的遊戲規則，幾乎都在先進工業國家考慮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而被制定出來，在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下，發展中國家對遊戲規則的制定，從未能享有和先進工業國家相同的影響力，更遑於透過這些遊戲規則來增進自身的福祉，減少貧窮。

而貧窮的消滅與發展的追求卻也同時是國際社會長久以來所關懷的重要問題，但過去數十年來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大量經濟援助，因為政治背景、社會結構、經濟型態的重大差異，對發展中國家人民所面臨的問題仍無法發揮良好的效果。在這樣的反省下，國際社會對「發展」的定義逐漸由過去僅追求總體經濟和數字的發展，轉而關心人類本身的發展。這種重大的改變，主要是受到Amartya Sen 所提出的「能力理論」(Capability Approach)以及Martha Nussbaum後續所提出的「人類重要能力」(Central Human Capabilities)清單的影響。在晚近數十年，「能力理論」在學術界與政策制定上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國外學界，「能

力理論」已成為福利經濟學、發展研究以及政治哲學標準的課程的一部份。同時也常在教育、殘障研究(disability study)、公共衛生、以及性別研究的課程中被引用。「能力理論」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有其貢獻，同時對實際政治也產生了影響。除了聯合國每年發表的人類發展報告書外，更有超過500個地區或國家層級的人類發展報告，以「能力理論」作為理論架構來討論區域性、全國的、地方上的發展策略。基於上述之關懷，本研讀活動選讀了：

1. Held, Davi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7.
2. Rivoli, Pietra,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Wiley, 2006.
3. Stiglitz, Joseph 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4. Stiglitz, Joseph E.,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W. W. Norton, 2006.
5. Sachs, Jeffrey D.,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Penguin, 2006.
6. Easterly, William,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6.
7. Singer, Peter,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Deborah Eade and Ernst Ligteringen, *Debating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Future*, London: Oxfam, 2001.

企圖從弱勢族群的角度出發，帶進全球化的脈絡，持續討論發展與貧窮的議題。究竟全球化的趨勢為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帶來什麼變化？如何評價全球化對人類發展帶來的影響？對弱勢族群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以及NGOs對促進發展

及消滅貧窮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遭受哪些問題與批評？都是我們關心的重要議題。

三、導讀

(一) 研讀書目、進行順序、導讀內容及討論議題如下表所示：

序次	研讀時間	主讀人	研讀內容	討論議題
1	2007/10/05	輔仁大學法律系-雷敦蘇副教授	Global Transformations: Introduction and Ch.1, Ch.3	全球化理論關注的範疇，政治、經濟的全球化
2	2007/10/26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助理教授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h.5, Ch.6, Ch.7	企業跨國、移民與文化全球化
3	2007/11/16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助理教授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Part I and II (Ch 1-6)	全球貿易的市場、生產鏈、權力與政治
4	2007/12/07	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黃默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1, Ch.2, Ch.3	1、世界性的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所作的承諾為什麼沒有實現？ 2、華盛頓共識指稱什麼？又共識的原則對貧窮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影響？
5	2007/12/28	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黃默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4, Ch.5, Ch.9	1、東亞金融的危機 2、俄國改革政策的失敗 3、全球性機構的改革
6	2008/03/07	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黃默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3, Ch.4	1、公平貿易 2、專利權的問題 3、如何去除資源的詛咒
7	2008/03/28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李河清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6, Ch.7, Ch.10	1、環保與全球治理 2、跨國公司 3、全球化的民主運作
8	2008/04/18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及社會醫學科教授-黃嵩立	The End of Poverty: Ch10, 12, 13, 16	1. 介紹 poverty trap 的概念，討論某些社區處於絕對貧窮狀態而無法自拔的原因 2. 介紹如何在鄰里層級提供基礎建設和必要服務，以協助處於 poverty trap 的社區脫離貧困 3. 探討高收入國家提供官方援助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做法
9	2008/05/09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及社會醫學科教授-黃嵩立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1. 討論由上而下的援助對於經濟發展和社區發展成效不彰的原因，並探討替代的做法 2. 討論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對於社區發展的必要性，以及外來援助對於這兩個因素可能產生的影響
10	2008/05/30	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林正弘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倫理議題
11	2008/06/13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紹華	Debating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Future	NGOs 對發展及消除貧窮能做什麼
12	2008/06/2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紹華	Debating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Future	NGOs 工作的倫理議題與挑戰

(二) 參與成員：

姓名	服務學校/系所	職稱
劉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李河清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宏銘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葉德蘭	台灣大學外文系	副教授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劉惠琴	東吳大學心理系	教授
林正弘	東吳大學哲學系	客座教授
黃 默	東吳大學政治系	講座教授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系	專任講師
黃嵩立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及社會醫學科	教授
雷敦齋	輔仁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
陳菽芋	台灣大學法律系	研究生
吳景義	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研究生
黃怡碧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	柬埔寨援助與發展計畫專員
陳文葳	政治大學外交系	研究生
黃斐欣	東吳大學英文系	大學部學生
王顯翰	東吳大學法律系	大學部學生
蔡境予	東吳大學社會系	研究生
李俊達	東吳大學哲學系	大學部學生
白湘銀	東吳大學政治系	研究生
林承正	東吳大學政治系	博士生
李仰桓	東吳大學政治系	博士生
沈雅雯	東吳大學政治系	研究生
何嵩婷	東吳大學政治系	研究助理
劉恆君	東吳大學政治系	研究生
鄭雯如	東吳大學人權學程	研究助理
楊詩諭	東吳大學人權學程	秘書
董若竹	東吳大學人權學程	專任助理

四、 探討議題及研讀成果

歷次探討問題及成果內容歸納如下表（研讀會議記錄請見附錄）：

日期	2007/10/05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主讀人/ 研讀書目	雷敦蘇/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前言（頁 1~31）
主讀內容	<p>前言的重點是說：全球化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全球化是一個複雜國際關係的現象，在某方面是今世的現象，但是它也有根在過去社會中。本書使用的英文非常抽象，故意提供讀者的困擾，不過實際上書要講的非常簡單。</p> <p>五個問題（頁 1~2）</p> <p>本書問一下幾個問題：</p> <p>什麼是「全球化」？</p> <p>全球化是否新的現象？</p> <p>在全球化下，國家的地位如何？</p> <p>如何將全球化民主化？</p> <p>全球化論壇（頁 2~10）</p> <p>前言提供三種全球化的理論，第一、二都視它為純粹經濟現象，第三則不然。</p> <p>第一（超級全球理論）：傳統國家已被毀滅，未來只有全球市場控制一切，自由經濟派者因而高興，馬克思主義者因而反對。</p> <p>第二（懷疑全球理論）：國家的勢力仍存在，而且地區性的合作使得沒有一個全球市場。</p>

前言認為前兩種看法都不對，兩者把全球化限於經濟市場而已。

第三（轉變全球理論）：全球化是一個長期歷史演變，最近幾年變化很大且影響全社會，但是與過去歷史變化有某些相同點。此理論不談未來如何。

全球化論壇五個議題（頁 10~14）

前言認為全球化論壇包括五個議題：

什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影響全社會，不僅是經濟市場的現象。

全球化的來源是什麼？

全球化與西方化有什麼關係？全球化是否等與西方化？

全球化的時段有哪些？

有的學者認為要從中世紀開始談，或二十世紀，或 1970 年代等。

全球化有什麼影響？

有的學者認為全球化減少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不過實際上全球化在不同國家內有不同的影響。

全球化往哪裡？

超級全球理論與懷疑全球理論皆認為全球化的方向很明顯；轉變全球理論則認為在過程中有各種矛盾與不順，不知未來如何。

訂定全球化（頁 14~16）

全球化是一個過程（更好「一套過程」）。他包括社會關係、交換從制度的空間方面的轉變，因而產生在活動、溝通及勢力使用的跨洲、跨國河流與網羅。這些轉變可以從四個幅度審查，即其廣度、深度、速度和影響。

此定義把全球化與另外四種現象做分割，即地區化、國家化、地區化和國際化，不過這四種現象與全球化的關係並不單獨，反而複雜。

	<p>全球化在歷史上（頁 16~21）</p> <p>此部份分析上述的「廣度、深度、速度和影響」，即在時空的幅度，同時也討論全球化的制度幅度。後者也分四個部份：全球化的建設、全球網羅及勢力使用的制度化、全球化在社會各層面的影響以及全球化進行的方式，如以軍事實力或經濟勢力等。</p> <p>全球化的性質（頁 21~27）</p> <p>全球化可分為深、淺兩層面，又可分瀾、普兩幅度。這樣可以分四種全球化模式：</p> <p>深層全球化，如 19 世紀英國帝國：有高廣度、深度、速度和影響；</p> <p>密度全球化，批評全球化的人所期待的：有高廣度、深度、速度和低影響；</p> <p>普度全球化，如 16 世紀西班牙帝國：有高廣度、低深度、低速度和高影響；</p> <p>淺層全球化，如中歐絲綢貿易時代：有高廣度、低深度、速度和影響。</p> <p>全球化在社會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本書研究全球化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勞工、移民暨環境各領域的影響。</p> <p>結論（頁 27~31）</p> <p>爲了了解全球化，作者選了六個國家：美國、英國、瑞典、法國、德國、日本。</p>
<p>討論問題</p>	<p>經濟學由 Adam Smith 建立的學科，到 20 世紀才發展，影響歷史、地理的研究。經濟學形容過去經濟的變化，同時規定未來，而且其規範在今日社會像神的命令一樣確實。經濟學家像 Alan Greenspan 或機構像世界銀行爲普通老百姓，特別窮國家，規定一切，使人民在這些偉大人物前不敢開口。此本書的作者好像要把經濟學拉回社會之中，不要那麼崇拜它。到底，經濟學的位置應該如何？</p> <p>淺層、普度、深層到密度全球化是邏輯的模式或歷史的模式，或兩者都是，像黑格爾思想一樣：歷史就是邏輯的表達模式？</p> <p>所選的六個國家都是富有國家，是否足夠反應全世界的全球化？</p>

日期	2007/10/05 PM6:00~9:00
主讀人／ 研讀書目	雷敦蘇／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h 1
主讀內容	<p>本章分五部份：第一部分討論現代國家的出現（頁 32~49），第二部份談政治的全球化（頁 49~62），第三部份討論聯合國、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以及區域單位如同歐盟（頁 62~77），第四部份把前言關於全球化的類別與特色引用於三階段的國際制度（14-18 世紀、19-20 世紀、1945 年後）（頁 77~81），第五部份討論作者所選的六個國家（頁 82-85），第六部份是結論（頁 85-86）。</p> <p>第一部分：現代國家的出現</p> <p>歐洲領土國家的概念出現在 17 世紀，特別以 1648 年 Westphalia 條約為心，此模式分國內、國外：國內有制度和法制，屬於國王絕對權勢下；國外則相反。現代國家的特色是把權勢與領土合併，因此國家有固定邊際、中央控制武器、法制代替貴族領導、國家的合法性來自他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不僅現代領土國家是今世的基本政治單位，但是從 1945 年後，此種國家也是自由民主國家，因此國內有民主、法制，但是在國外民主與法制仍然比較弱。</p> <p>第二部份：政治的全球化</p> <p>作者說明如何在現在世界越難分國內、外兩個空間。過去外交部負責所有外交事業，但是在現在的世界政府的各個部門都必須與國外聯絡，甚至會做他們自己外交部不同意的決議。國與國之間的來往那麼複雜，外交部無法全盤治理。作者特別提電話及同類資訊國際網，來證明國際已開始更密切的合作。</p> <p>第三部份：聯合國等</p> <p>國際人權法要求合法國家符合某標準的人權保護，因此限制國家主權，甚至若國家虐待人民，他國不會因為國家主權而已就不干涉。</p> <p>第四部份提五個結論：（一）有效政治權分散與國家、區域、國際等領域，（二）政治社會不限於單獨國家內部而已，（三）國家主權仍存在，但是國家參與各種國際機構會影響他的主權，（四）過去邊際問題等於地理問題，但現在國與國的邊際在各領域中，負責的單位常不清楚，如環境保護、經濟規範、資源用盡等，（五）</p>

	<p>各種議題如 SARS、AIDS 超過一個國家能單獨處理。</p> <p>第六部份問：是否可以用「新歐洲中世紀」來形容今日的世界。</p>
討論問題	<p>人權與現代國家同時誕生。現代國家的滅亡是否帶來人權的滅亡？</p> <p>所用的例子都是歐洲的，中國的國家經驗不同，是否影響人權的理解？</p> <p>是否需要宇宙（universal）政府、國際民主化來應該配合國際人權制度？</p>

日期	2007/10/05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教授					
報告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政治系白湘銀／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h3					
主讀內容	<p>本章主要討論的是貿易全球化的發展及影響</p> <p>1 貿易行為與貿易全球化的概念與指標(p149~152)</p> <p>貿易行為可視為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所從事的商品與服務的交換行為。</p> <p>貿易全球化則是強調一個可供全球商品交易的市場確實存在，且其中含有調節商品與貨物交易秩序的機制。</p> <p>一般來說，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在全球貿易行為中測量一國貿易強度的指標，但是該指標仍有限制。</p> <p>2 全球貿易之發展與貿易全球化(p152~163)</p> <p>(附表 P178~179)</p>					
		工業革命前	金本位時期	大戰期間	布列頓森林體系時期	當代
	擴張範圍	中度 亞歐非三洲的 長程貿易延伸至 美洲與澳洲	高度 20世紀初 期，大多數地 區已納入全球 貿易範圍	大多國家均有 貿易行為，但早 期貿易鍊由於 封閉貿易區而 被破壞	除共產國家外，其餘國 家均加入全球貿易體 系	幾乎全球 各國都參 與貿易且 相當密切
	強度	貿易強度低	中度	低	由低至高	極高度
	速度	慢	快	慢	慢	快
影響傾向	僅對少數國家 及社會變革有 重要影響	對已開發國家 的收入大有助 益	初期對貿易衝 擊大，之後轉弱	對貿易成長影響升高 尤其使工業成長之影 響	對經濟成 長、工業 結構與國 家收入都 有影響。	

基礎建設	從原始運輸系統發展至較優良的船隻與航行技術	運輸成本大幅降低；新通訊科出現	運輸系統因其他科技持續發展而進步	航空運輸與海運成本降低	通訊系統發展促進服務交易增加
制度化	貿易公司與商人組織為主。原先保護措施不明顯，但在民族國家出現後提高。	國際自由貿易協定之增加。出現不同層次的保護措施。最惠國原則普遍被接受。	國際協定被破壞	貿易在 GATT 體制下定型化。多邊貿易協定。貿易自由化開始。	WTO 的運作及貿易機制維持全球貿易規則與貿易自由化
層級化	起初低，但因 17 世紀的帝國主義之影響，使貿易組織化情形增加。	多透過帝國而被組織。貿易由少數出口商支配。	由強權國家主導區域協定	已開發國家貿易量增加；美國則支配貿易國家	貿易集中度降低。其他國家加入支配體系
不均衡性	只有少數貿易點，大部分地區並未納入貿易體系。	貿易對強權國家及初級產業很重要，但其他區則不然	貿易量低對初級產業出口國打擊大	某些國家貿易市場成長慢，但大多數國家則擴大。	貿易拉大各國差距

3 全球貿易規則(p163~167)

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

WTO 具有的四項原則：最惠國原則、互惠原則、透明性、公平性

--非關稅障礙之移除

4 貿易分層化(trade stratification)(p171)

由於貿易會影響各國在經濟上的有不同表現，因而在全球競爭下，各國會根據其成本與利益的考量，發展出對本國市場有利的產業，進一步地使全球貿易走向貿易分層化的趨勢。

5 全球貿易之影響(p182~187)

-決策性影響(Decisional impacts)

在全球市場中，各國政策之變動與全球貿易息息相關，因而，一國的國家總體經

濟之決策，對各國而言將會是經營國家經濟時的重大課題。

-制度性影響(Institutional impacts)

全球貿易的制度化，可望在自由貿易的原則下，提供國家對福利政策上的更多支持。

-分配性影響(Distributional impacts)

主要是指對於貿易的生產要素造成重新分配的影響，與生產專業化現象有極大的關係。

-結構性影響(Structural impacts)

在全球競爭的情況下，會導致國家朝向專業化生產的方向，爲了保持本國在全球市場中的優勢地位，會持續性地對本國貿易的進行結構調整。

從上述三點觀察，貿易全球化對除了帶來全球貿易行爲地更加熱絡之外，同時改變了國家自主性及降低國家政策的變動。換言之，現今的全球貿易不僅藉由全球貿易規則與機制進行全球調節，也重新對國家主權觀點有不了同於以往的詮釋。

日期	2007/10/2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主讀人／ 研讀書目	潘美玲／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主讀內容	跨國的經濟生產和大範圍而持續遷移的人們，以及藉著發達的傳播媒體工具的大眾娛樂文化都是當代全球化的重要現象。然而其中帶來聚合或同質的力量的同時，也面臨著抗拒與分化的互動效果。全球化的帶來經濟重新分配產生了贏者與輸家，也牽動著不同層級與類別的人們的流動與遷移，並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世界的內容，從而挑戰了個人的認同與國家的權力。
討論問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際貿易和全球生產的差別何在？從全球生產的商品鏈所呈現的國際分工層級化的結構對於全球經濟不平等產生的衝擊與效應。 2. 全球競爭（Global competition）如何成爲一種意識型態，及其對社會發展方向的影響？ 3. 移民層級化的形成機制爲何？以各國政府的公民政策與移民人權的關係。 4. 從大眾消費、流行文化到觀光旅遊都是文化全球化的媒介與工具，產生了同質化與國家認同和地方文化之間的交互影響。文化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內建立多元文化體制是增進或抵銷的力量？ 5. 從經濟、移民政策和文化的面向如何保障在全球化當中弱勢族群的權利。

日期	2007/10/2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報告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人權學程董若竹／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h 5
報告內容	第五章介紹跨國公司及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從國際貿易到全球生產鏈的轉變中，跨國公司對於政府權力、政府政策的影響。
討論問題	1.對於位居生產鏈末端的國家以及當地的人民，是否真能走出核心與邊陲的差距？以台灣而言從 OEM、ODM 的轉變依然是跟隨先進國家科技創新的腳步。 2. 當關注的議題從「南北」發展不均的概念到今日的「全球化」，在這種全球生產鏈的效用下，基於生產效用、生產成本的考量人力成本似乎是最容易可以「節省」的成本。此對於產業移出、移入的兩造勞工的影響？

日期	2007/10/2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報告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政治系鄭雯如／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h 6
報告內容	<p>人類的遷移是全球化中最普遍的一種形式，以最簡單的說法，遷移（migration）是指人類的移動，暫時或永久性的地理位置變動（geographical relocation）。</p> <p>本章主要是透過在導論中介紹的概念性的工具來檢視全球化遷移的歷史型態。這些與遷移模式（migration patterns）有關的主要概念有：</p> <p>遷移的廣度（extensity）、強度（intensity）、速度（velocity）、對移入地、移出地國家與社會的影響（這部分呈現出不同的結果，因為移民與移入地居民團體間同的權力階層而引起的）。此外，交通與通訊的基礎設施、支持全球勞力市場與遷移潮流的機制（institution）也非常重要。當我們研究民族國家之前的移民地理型態，我們同時會發現，國家疆界的特性和位置其實不斷在改變。</p> <p>第一節 全球化與移民</p> <p>本章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人類的跨區域、甚至是跨洲的移動。遷移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則是指在民族國家出現以前，跨洋或是跨洲的移動。例如在十六到十九世紀，將被奴隸的非洲人運到美洲。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跨界遷移都具有全球化的程度。例如，二次大戰後，從東歐和蘇聯地區大量逃出的德國後裔，只能算是區域性的遷移。</p> <p>作者企圖提供檢視遷移廣度、強度、速度等相關的衡量標準。經由遷移的地理範圍，我們可以知道廣度；檢視移出國、移入國的人口有關的遷移數量，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檢驗遷移強度的指標；評估遷移的速度有兩種方式：一、特定時間範圍內，人類跨區域的移動或是一個大規模的遷移，從頭到尾所花的時間；第二、以個人的角度來看：一個移民從當地到新的移入地所需的時間。很明顯地，交通科技的改變在這方面造成極大的差異。</p>

哪方面的社會生活和遷移模式有關？很多文獻都將重點放在勞工移民。但本文認為最重要的，並不是勞工移民，勞工移民主要是因應勞力市場中供需所形成的推力和拉力而遷移，只是人類大規模遷移的一個面向，雖然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面向。但是遷移和政治、軍事、文化上的權力網絡有關，甚至是構成這些網絡的重要因素，譬如戰爭所帶來的難民潮。所以，全球性或區域性的遷移對移出國與移入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經常是多面向的。如果單從工作或是就業的面向來看的話，我們無法完全掌握遷移對經濟帶來的影響，例如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初，香港人大批湧至加拿大西岸，對加拿大帶來主要的經濟影響並不是在勞力市場方面。同時，人們遷移的時候，也會把自己的文化帶到各地去。藉著在移入地區定居並建立新的移民社區，移出國與移入國的社會建立起以前沒有的新社會關係。這多少會創造或改變移入國文化權力或社會認同的型態，隨著人類遷移的腳步而來的是新的觀念、宗教、信仰等。

人類的遷移不會憑空出現，是經過許多的組織跟協調，同時遷移需要、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會影響潛在遷移的花費、風險、速度、規模），以及相關的機構與規則。便宜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會影響移民社區和家鄉聯繫的程度。區域性或全球性的遷移可以用「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的失衡」來加以分析同地區的不同團體間，不平均的分配方式都可以用權力階層的觀念來思考。例如，菁英移民與一般移民，除了本身社會組成分子的差異外，在累積遷移資源、成功打入其他社會的能力上都有差異。而國家權力的階層指得是各國在控制人口流動、維持邊界完整等上不同的能力。

有了以上這些概念，第二節要談的是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的人類遷移範圍與模式，第三節談的是現代的全球性遷移形式，四節則是比較與對照，第五節討論遷移對民族國家在人口、經濟與政治方面帶來的影響，最後則分析不同遷移潮與模式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自主性和主權之意涵。

第二節 全球遷移的歷史模式

2.1 近代以前-廣度與強度

2.2 近代初期-宗教性與全球性

2.3 近代初期到近代-大批遷移的肇端

2.4 奴隸貿易

2.5 亞洲人的離散-契約勞工

2.6 區域性遷移與工業化初期

2.7 世界大戰間的遷移

第三節 當代的遷移模式

1914 以前和 1945 以後遷移的強度和地理上的廣度相去不遠，但是二次戰後的規模遠比兩次大戰間的規模大上許多。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地區或國家沒有引進或輸出勞力。歐洲和蘇聯共黨垮台後，過去封閉的地區現在也紛紛加入遷移的行列。大多遷往 OECD，也有遷往其他地區。

3.1 全球性與區域性的遷移

當代的遷移始於二次戰後，在地理和時間上都很複雜無法清楚表列。在遷移的強度和範圍上，主要是向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 OECD 國家前進，但遷移的性質並不一致。二戰後初期西歐區的遷移多屬區域性。1950-1960 後移民開始轉為土耳其、北非、拉丁美洲、亞洲人所取代，雖然歐洲的移民減少，但從亞太區移入的增多，所以區域性遷移上沒有衰退。1970 中全球經濟大蕭條，減緩了西歐地區移民的步調，移民法令也開始緊縮。1980 年代西歐國家在移民與國籍取得法令普遍採取嚴格限制，相反的，在北美與澳洲的外來移民則不斷增加，來自歐洲的移民又有取代亞洲、拉丁美洲的趨勢。

3.2 遷移潮中不同階層的形成

隨著 1970 年代移民到西歐國家的機會減少，以及發展中國家各種經濟發展過程競爭激烈，全球性與區域性的移出也有新的模式。在全球性遷移中最明顯的是往中東去的移民：1974 年石油價格暴漲，使得油產豐富卻人口稀少的中東國內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區域內的遷移也夾雜在全球性的遷移中。到 1980 年石油收益下降，加上擔心移民的政治忠誠度，使得區域性的

遷移減少，轉向東亞與南亞募工。印度人、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開始向西遷移，其中包括許多高技術勞工，至於來自斯里蘭卡與菲律賓的婦女則進入服務業或是擔任家庭幫傭。亞洲的模式也呈現類似的全球性與區域性遷移的結合模式。

3.3 當代遷移趨勢與模式-分散而複雜

當代遷移模式非常複雜，全球性與區域性的遷移不但重疊而且彼此互動，兩者的本質同時包括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在全球性遷移的中心，是以 OECD 會員國為目的地的經濟性遷移。而這個經濟性遷移一開始只是區域性的，從比較窮的西方國家到比較富裕的西方國家，然後才演變為從發展中國家移民到西歐。但接下來就轉向北美或澳洲。

大部分的當代遷移都是因為跨國界的勞力市場需要而引起的，不論是正式制度安排的或是非正式的。

人口遷移的歷史模式一直在改變，伴隨而來的是移民人口的組成以及他們的工作機會也不斷在變動。1950-60，外來移民的工作多為卑賤的公共服務工作，或是製造業的工作。1980-90，OECD 國家這兩個部門的就業機會不是停滯就是減少。影響所及，移民的職業和西方的經濟發展一樣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越來越多移民從事私人服務或是家庭幫傭，因為女性移民的數目和就業數目越來越高。另外，移民也開始訓練有素，高技術專業人士的移民，也就是菁英移民也出現。1970 年代後，波灣國家也成為進口高技術勞工的主要國家，但是移往西方的菁英移民依然為數眾多。

第四節 全球性遷移的歷史型態：比較研究

4.1 歷史形式-時空的比較

就某方面來說想對全球性遷移所造成的影響作一系統性的比較是不可能的，因為很多都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不會重複發生。如果要估算當代遷移的影響，我們必須檢視遷移對移入國社會和經濟的衝擊，不過這些面向在過去和現代截然不同，所以一些簡單的統計數字比較往往變得不相干。不過還是有一點值得注意，遷移最明顯的影響在人口方面，無

論是移入國或移出國，在人口組成和數量上都會發生變化。對現代的福利國家，這樣的轉變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影響範圍包括福利服務的層次、法規、住宅、教育以及國家經濟本身。過去排斥外人的學者認為，遷移所造成的一切後果都對移入的福利國家有害無益。外來移民會排擠就業市場上的藍領階級或是原住民，讓原本就搖搖欲墜的福利制度雪上加霜，進而榨乾福利國家的財政。不過作者認為這沒有事實的根據，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造成這些問題主要是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對移出國而言，因為國內失業率的下降，而獲得很大的經濟利益。不過遷移也可能帶走移出國中沒有參與勞動的人口，而使高失業率一直無法下降。和之前的遷移相較，當代的遷移很可稜會抽乾移出國勞動力中最具高技術和高教育的那部份，使國內經濟益發困窘（腦力外流的問題）。然而和 19 世紀的遷移相同的是，移出國從當代遷移所獲得最大經濟好處是在外工作的勞工從海外寄回的匯款。這些匯款的錢可能會超過這些國家本身的發展援助金額。

4.2 歷史形式-組織性的比較

交通方面，空運超越海運成爲今日全球性遷移主要的方式。然而交通方式的轉變，並沒有改變，反而是增進了遷移透過幾個主要地點進行的集中情況，例如機場、重要城市等。結果是，往西方國家的遷移所面臨的邊界及出入境管制更言，更制度化。過去公民權不普遍時代中，既長又無管制的邊界，已經不存在。奴隸貿易和亞洲的勞工遷移是由殖民地國內部的行政機構和殖民地者所組成的聯盟「由上而下」的管制。在中國人、印度人到美洲的例子裡，是由鐵路公司所安排。二次戰後，歐洲國家依然掌管了遷移的組織和規範事宜，但不是由殖民機關，而是由就業部門負責。除了相關政府機關外，這些國家的資本與勞工代表，尤其是最缺乏勞力的特定產業代表，也會視各國決策過程的不同特徵，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有關遷移的決策。

在國際層面上，對遷移過程的規範一直都沒有什麼效，雖然國際條約對難民和庇護全申請者的待遇規定已經逐漸增加，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成文化的國際建制或是法律主體能對國際勞工的遷移提出一項媲美貿易或是資本流通的規範來。ILO 從 20 世紀初成立以來就在尋求建立一套關於勞工待遇的

基本規則，現在也有相關的基本權利宣言，但只有歐盟建立了一套關於勞工的有力國際法架構，雖然這套架構本身還必須依賴國家力量來強迫執行。

在國家層次上，國家希望透過加強邊界管制和有利的移民規定來限制國際遷移，同時外來移民也越來越難獲得移入國的公民資格。這些發展反應出 19 世紀和 20 世紀末之間，遷移階層化模式的轉變。19th，北→南，今日北←南，東→西。

諸多現象反應出的不只是移民團體在文化經驗與社會聯繫上的差異。凱索斯(Castles)和米勒(Miller)曾在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和族群共同體(ethnic community)的形成間提出一項有用的區別。前者不僅在勞力市場和特定居住區域中被隔離，在社會、文化與政治上遭到明顯的排斥。後者則存在於一個視「移民與其子孫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不可或區的一部分，並願意重新塑造其文化認同」。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完全符合這兩種分類的，都是混合的。

幻想的（假裝沒這回事，日、義）、排斥的（一種種族-民族主義，瑞士、德國、比利時，要以外籍勞工制度才能移入，移入後法律地位雖被承認，但是在移入國國民之下，且歸化的可能性與公民權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共和-帝國式的（英、法、荷，公民地位是以居住為準，排外色彩沒那麼濃）、多元文化式的（外來移民是永久的，也可保證獲得公民權，加、澳洲、瑞典）。民族主義政治和國家認同、公民權、合法性的問題。

第五節 遷移與國家障礙

從二次戰後的全球情況看來，和戰前比較，這六個國家都是勞力進口國，而非出口國。除了英國以外，其他國家還是有向外的移民，但是層次都比 19 世紀或 20 世紀初的層次低。二次戰後美國實行嚴格的移民法律，這是在二次戰間通過的，1940 年代曾放寬，為收容美國的戰爭難民，1950 年代又變嚴格，一方面響限制外來移民的總人數，另一方面想藉特定國家與半球所設的配額制度，讓移民都是以北歐人為主。不過從美國戰後移民的情況來看，證明這種做法是極端失敗的。

第六節 全球化、遷移與民族國家

- 1.源源不絕的非法移民顯示出民族國家獨立維護邊界的能力有限。
- 2.即使加強邊界監督的國家，也無法阻止非法移民的湧入。
- 3.國際間企圖控制或協調改變移民政策的努力，表示各國已經承認國家自主與主權的本質正在改變，在這方面確實需要跨國合作。
- 4.在經濟與文化政策的範疇內，遷移已經改變了國內的政治環境。
- 5.政治利益外貌以及對利益的概念的改變。
- 6.遷移改變了可行的國家政策選項，以及政策利益與代價之間的平衡。

6.1 對決策的衝擊-邊界控制與監督

外部控制的失敗，合法、非法移民在邊境間不斷發生。轉為內部監督為控制。

實行政策的能力不能由上而下依賴社會成員

移民政策不能孤立於其他會影響勞工市場的政策之外

6.2 對制度的衝擊-國際合作與管制越界

尋求國際合作，從遷移的根源開始著手，透過發展、經濟援助，或是國際警力合作。

發展模式目前只是嘴上說說，不然只有一些相對沒有權力的機構，如歐洲議會願意採用。

目前對難民和移民規定的限制正在逐步統一，如歐盟透過都柏林公約和申根公約，但和國際法、條約和責任發生嚴重的衝突。(都柏林公約 vs. 日內瓦難民公約)

6.3 對分配的影響-不同的就業與繁榮模式

遷移帶來邊際的但又值得辯論的建設性影響，比如新來的移民滿足了勞力

市場的底層需求，移入國當地的勞力就會轉入所得更高的工作。

遷移的實際特性，不能把移民都視為相同的一大群人。不同族群的移民會對移入國造成不同的結果，在移入國勞動市場裡，常會出現兩極化的現象。（高技術勞工來自西方國家，低階勞工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

平心而論，在特定時期內，移民對 OECD 國家的貢獻是正向的。如果沒有他們在 1950~60 會面臨嚴重的勞力短缺。但這樣可能增加非技術勞工的就業壓力，不過不論在哪一個時代，非技術性勞工都會面臨這樣的挑戰。不過，在 1980 年代 OECD 國家重建經濟的時候，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其實都是外來移民，不是本地非技術性勞工。美國製造業在當時有那麼大的競爭力跟美國是唯一有持續而廉價的臨時工或非法勞工的先進國家此一事實脫不了關係。

6.4 對結構性的影響-國家認同與國家公民權

人活著不只是工作。經濟性移民所帶來的結構性影響無可避免會溢出到社會、文化、政治層面。目前歐洲國家首次出現這麼多黑人、拉丁人和亞洲人。雖然在移入國中也有富裕的移民社區，但大部分的外來移民居住的地區都是貧民區。移民社區通常聚集在大都市中，並且形成集中的區域。結果就是產生移入國因應的住宅政策、勞力市場的地域性以及在城市中自成一格的移民社區。在逐漸形成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因當代遷移的全球化與區域化，使得國家認同的問題在政治議題中的比重不斷增加。

第七節 結論

當代遷移的模式較近代廣，但強度較弱。遷移在科技與社會基礎建設上有長足的進步。當前西歐國家多元種族的特性是前所未見的。以往的合法移民和現在非法移民所帶來的衝擊重新定義了民族國家的自主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管制邊界與人口的能力已不敷所需。目前也還沒有可行的國際合作方式。另外，當代遷移和文化的全球化使得公民權和國家認同又成爲爭論的議題，在許多例子裡面，這些爭論的焦點還是模糊不清。

討論問題

1. 若公民權利的保障仍有賴於個別的民族國家來提供，在缺乏強而有力的國

	<p>際建制時，難民、移工的權利該如何獲得保障？</p> <p>2. 民族國家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係，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將有何種轉變及衝突？如何回應？</p>
--	---

日期	2007/10/2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報告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政治系李仰桓/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h 7
報告內容	這一章的主旨在於說明「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現象。作者從時間（即歷史）和空間（即地理）和組織的角度，分析「文化全球化」所需要的基礎—包括文化與現代科技的發展。接著說明當代的全球化現象與民族文化認同的辯證關係。
討論問題	<p>1、從時間、空間以及組織面向的說明文化全球化的現象。</p> <p>2、歷史上的文化全球化現象，以世界性宗教和帝國為例。</p> <p>3、當代的文化全球化現象：</p> <p> （1）基礎：通訊科技及共享語言</p> <p> （2）組織面向：跨國企業、廣播、流行音樂、電影、電視、旅行</p> <p>4、當代文化全球化現象的政治影響：當代全球化與民族認同和民族文化的關係</p>

日期	2007/11/1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主讀人	潘美玲／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研讀書目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主讀內容	透過一件 T-Shirt 從原料生產到製造完成的過程中，作者指出全球化的贏家不是因為自由市場的競爭獲利，而是避開市場，這些策略產生的對窮苦老百姓的剝削比市場競爭本身更甚。作者透過 Polanyi 的 double movement 論述，將反全球化運動納入到有助於市場回歸能夠「正常運作」的動力當中的，因此市場是在政治、社會體制之中運作，經濟力量只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因素，政治、社會、文化等力量，從不會完全被排拒出其運作之外。
討論問題	<p>1. 「現代社會的原動力是由一雙重傾向支配著：一方面市場不斷的擴張，另一方面是這個傾向遭到一個相反的傾向（把市場擴張侷限到一個特定方向）的對抗。這樣一個相反的傾向對社會的保護雖然極為重要，但是卻跟市場的自律互不相容，因而也跟市場本身互不相容。」(Polanyi 1957: 130)，這是 Karl Polanyi 所定義的社會自我保護原則。他指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同時出現「社會自我保護」企圖限制市場經濟的擴張，反對市場的力量總是會相應而生，來維護社會的連帶與整合，因此兩者的作用是同時進行的，即使結果可能是減低了市場的效能，也有可能讓市場的力量更加擴張，也就是說保護機制成功也可能失靈。那麼作者所談到的現象到底是市場的成功還是社會防衛機制產生作用？</p> <p>2. 如果說雙重運動的結果，帶來了工作環境的改善，從而市場制度能夠擴張，為什麼不是所有的人都受能受惠，像是非洲和南亞的棉農？為什麼在中國的女工還是次等公民？</p>

日期	2007/11/1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主讀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政治系林承正／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Ch1~3
主讀內容	<p>作者從自己任教的 George Town 大學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對全球化的批判，以及學生指出一件 T 恤的製造背後的不堪事實，引發其對全球化的反思，並激起作者想要探究一件 T 恤製造的真相。這個探索不只是一要說明全球化現象，更是從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的脈絡中，梳理出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樣貌。</p> <p>如果美國的工資水準處於世界最高之林，那麼美國如何在工資問題上維持在棉花產業上的宰制？另外，棉花產業這種基本的下游產業在進步的、服務導向的經濟中，為何能持續繁榮？棉花產業看起來似乎缺少永續利益，企業策略模型會認為在這種類型產業的宰制，僅是短暫且充滿壓力的：因為缺乏產品的差異性、激烈的價格競爭、進入市場的門檻也低。這些說法對窮國而言非常真實，但似乎對美國來說並未構成問題。</p> <p>棉花產業除了在美國經歷不景氣時持續繁榮，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何解釋美國棉農可以向更窮的國家出口棉花？樂施會（Oxfam）提供了一個解釋：美國棉農的比較利益在於他們取得政府補助（subsidy）的技巧。不過作者認為不只是補助這麼單純而已，她認為從 200 年前，美國棉農就超越其競爭者，而當時並沒有補助的問題，因此補助不足以作為美國棉花產業宰制地位的長期解釋項。另外，美國棉農的調適、企業家精神常是 MBA 個案研究的對象，他們的生產方法、行銷、技術、組織型式，很能夠回應全球市場供需的轉變。美國棉農具有開放、向前的特質、配套的制度化管理機、公共政策的配合等因素，都是美國棉業的比較利益所在。更重要的是，美國棉農知道如何趨利避險，從這個產業一開始在美國發展，他們就鑲嵌在制度中，幫助其與各種市場力量的壓力隔絕。</p>
討論問題	1. 如果美國的工資水準處於世界最高之林，那麼美國如何在工資問題上維持在棉

	<p>花產業上的宰制？</p> <p>2. 另外，棉花產業這種基本的下游產業在進步的、服務導向的美國經濟中，為何能持續繁榮？</p> <p>3. 如何解釋美國棉農可以向更窮的國家出口棉花？</p>
--	--

日期	2007/11/16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主讀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政治系何嵩婷／ <i>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Ch.4~Ch.6</i>
主讀內容	棉花從美國運送到中國之後，經過了一段什麼樣的過程才會變成一件貼有「中國製」的標籤的 T 恤？農村或窮苦家庭的姐妹們，為了離開困苦的生活而投入血汗工廠的生產工作，而血汗工廠回報她們的，除了低廉的薪資之外，還有一些是她們仍舊呆在農村中的姐妹所沒有的-自主能力、寬闊的視野等等。除此之外，這些無名英雄的犧牲，造就了該地區的都市化與工業化，甚至，也喚起了激進份子與政府的良心，使他們更著力改善工廠的工作環境與勞工的工作品質。
討論問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對於血汗工廠，我們到底要懷著一顆什麼樣的心情去對待它？誠如作者所言，血汗工廠會帶來該地區的都市化與婦女的解放，如果我們因為血汗工廠的殘忍無情而抵制它，甚至讓它因此而關門大吉的話，那工廠中那些勞工，包括婦女與童工，他們將何去何從？ 繼中國之後，下一個血汗工廠會在哪？當一個地區的勞工不再廉價與順從之後，血汗工廠會再去尋找下一個目標，那下一個目標呢？ 作者談的幾乎都是血汗工廠與當地勞工的關係，那移工呢？血汗工廠之於移工本身及她的家庭或是國家，是不是也跟本國勞工相似？

日期	2008/12/07 PM7: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雷敦蘇
主讀人/ 研讀書目	黃 默 /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主讀內容 討論問題	<p>一、作者的背景</p> <p>二、學者與政治人物</p> <p>三、作者的論點：漸進的，強調制度的作用。與 Ronald Dworkin、Amartya Sen 的比較。</p> <p>四、作者批評的對象：華盛頓共識與 IMF 的意識形態與政策</p>

日期	2007/12/28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雷敦蘇
主讀人 研讀書目	劉恆君 /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 4
主讀內容	<p>本書背景</p> <p>* 作者於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擔任世界銀行的 Chief Economist。</p> <p>* 在序言裡，作者關注全球化給窮人帶來的浩劫，認為全球化應該是要帶來富足窮人的正面幫助，「（而）要實現這個想法，必須對進行全球化的方式加以管理，... 還有過去在全球化過程中層加強於開發中國加之上的諸多政策，都必須徹頭徹尾地思考一番。」</p> <p>政府是兇手或幫手？</p>

1997年7月2日，泰幣的急速貶值，掀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序幕，並且延燒至全世界。作者抨擊IMF在事前完全沒有預測能力，還在風暴之後，認為罪魁禍首是亞洲的政府。「（懷疑）亞洲經濟奇蹟的評論家暗自竊喜，政府（果然）是經濟失敗的罪魁禍首」，但真的是這樣嗎？透過金融風暴的後續觀察，這本書認為IMF必須對金融與資本市場自由化過快所帶來的傷害負責，並批評存在於西方金融界的利益與意識型態導向。

東亞經濟奇蹟

制度腐敗、政府貪污 vs. 東亞奇蹟→與華盛頓共識的扞格

1. 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與得宜的投資運用（包括教育），與政府的政策息息相關（如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帶來經濟（成長，數十年不墜）與社會（利益共享均霑）的轉型。
2. 東亞的貿易自由化：循序漸進（出口→就業機會）
3. 擔心IMF的譴責與隨之而來的國際資金撤離，許多東亞的國家雖然想要規避危機，卻只有馬來西亞仍舊維持低利率政策

兩種金融危機模型 vs. IMF的對策

影響：

1. 社區共同協助續辦教育，提供足夠的糧食（如泰國），甚或助學計畫（如市銀在印尼）以減少傷害；但政治、經濟與社會都受到嚴重損失
2. 地區性的衰退影響全球

IMF與美國財政部__一錯再錯、錯得離譜

- * 經濟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因此大量的資料得以證明東亞金融風暴是因為不斷受到舉債的催促與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嚴重影響。更何況，被凱因斯稱為動物精神的投資人情緒更是連政府都無能抵抗。
1. 資本市場自由化可以促進一國經濟的穩定！？然而，資本流動卻會誘發景氣波動
 2. 資本市場的管制有礙經濟效率？（泰國）

早期投機性嚴格限制銀行放款不動產的幅度，希望資本能投入帶來就業機會的製造業，避免泡沫化帶來的經濟波動。但是，IMF 堅持市場運作，也排擠了基層建設，如教育體系等公共投資。

3. 南韓的自由化攸關美國國家利益？（韓美貿易）

南韓過去以引進技術與開發市場為導向，而不像星馬有大量的跨國企業，雖然體認到資本需要自由化，但卻規劃出較謹慎的步調。經濟顧問委員會提議『system of prioritization』，評估市場開放對美國的影響，但是財政部認為全國經濟委員會才是協調經濟政策的組織，財政部的地盤觀念，使得所有可能是較為客觀的建議，都不會被提起討論。

第一輪的錯誤

IMF在拉美的經驗，造成對東亞危機的誤判，東亞受到的威脅是不景氣，而不是通貨膨脹，因為企業負債很重（借了很多錢），所以提高利率是死路一條。

I. 緊縮政策的誤用

面對景氣衰退是要刺激總需求（如凱因斯的理論），但IMF的緊縮政策卻使經濟衰退遠超過應有的幅度。預算平衡的迷思：美國財政部與經濟顧問委員會都曾經反對平衡預算的憲法修正案，因為他們明白，當景氣衰退時，因為稅收減少，若為了平衡預算而減少支出，則只會使不景氣更惡化。然而他們仍舊在泰國、南韓等東亞國家推動類似的作法。

II. 忽略各國政策交互影響的效果

1930 年「以鄰為壑」：透過關稅與通貨貶值來減少進口，而各國經濟因為他國的不進口而減少成長，經濟衰退因而逐漸蔓延到各個鄰近的國家（拉美失敗的經驗）

1970 年IMF要求減少貿易逆差、增加順差，完全背離本身存在的理由（東亞的失敗）

A. IMF擔心匯率下跌引發的通膨問題，但控制外匯卻正好違反了市場至上的訴求，將實質經濟問題拋諸腦後

B. 減少進口帶來所得減少，引發大幅衰退。IMF 只關心是否有錢償還西方銀行，

卻未協助危機國家度過

C. IMF一昧指責新興市場的言論與加諸的錯誤政策根本無法提振投資人信心。

III. 調高利率可以吸收更多的資金嗎？

A. IMF宣稱高利率可以吸引投資人，但任誰都不會想投資一個下坡的市場，反至加重經濟衰退，資金加速撤離。

。南韓：外國銀行因為擔心南韓企業還不出錢，因此拒絕再借錢，導致企業紛紛宣告破產（即財物槓桿過高的危險）。

。泰國：無力償還的中小企業，還必須擔負償還來自外國的高利貸。

B. 政治上的意識型態：亞洲貨幣基金

1. 日本領導、中國出資

2. 宮澤計畫_清邁計畫

第二輪錯誤：蹣跚的重整

I. 金融體系

A. 東亞危機=金融體系危機

B. 金融危機有其惡性循環：銀行緊縮放款，迫使廠商減少生產，是所得與生產下降，廠商沒錢賺，甚至破產，越多公司破產，銀行則越亦受到波及，則更加緊縮放款，衰退也同時更嚴重。

C. 銀行倒閉也可能波及其他客戶，因為銀行客戶的資料消失，使得客戶不易臨時找到其他的融資銀行。

D. 透過小心管制來強化金融體系

II. 銀行擠兌

A. 淘汰體質不良獲壞帳過多的銀行，犯下了組合的謬誤，但是若問題銀行過多，那麼這就可能禍患無窮。

B. (印尼) IMF關閉了十六家的銀行，而且還持續增加，使得其他還在營業的私人銀行紛紛受到擠兌的壓力，整個銀行體系遭到沈重的打擊。

C. 韓國並不理會，反而增資挹注這些銀行，是復原快速的原因。

III. 公司重整

A. 沒有完善的破產程序，無法解決公司歸屬的問題，經常因而誘發就業主竊佔公司資產。

B. 作者建議，政府應該積極推動財務重整，釐清公司所有人，並處理償債或債務轉換為股權等問題。

C. 然而，IMF過度重視解決經營實務上的問題，卻可能耗費龐大的社會成本。如削減南韓看似過剩的晶片產能，並引進外籍的管理人員，實質上這些國際組織中的官僚並不熟悉這些企業的發展。

最可悲的錯誤：社會與政治動盪的風險

1. 暴動的發生（經常可預知）

2. 貧民__例如印尼減少食物和燃料補給津貼（嚇跑資金）

* 瑪哈蒂因此說『預防嚴重的景氣衰退，並非只是經濟的問題，而是攸關國家生死的。』

馬來西亞

瑪哈蒂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並撤換意見相左的央行與財政官員

對於資本快速來去所可能造成的重大外部性，政府有權力、甚至有義務採行對策；馬國與世銀小組折衷以出境稅的方式干預，並在一年後取消管制。

中國

在全球衰退的時候，竟然能有接近百分之八的成長率，同樣採行資本管制的印度則超過百分之五。而且，擴張性經濟政策也發揮持續的效果，尤其是對基礎建設的投資。作者並強調IMF 習慣忽略總體經濟的系統性影響的重要性，但對中國自身的經

驗而言，經濟與政治、社會的關係十分了然。

南韓

保持出口通暢。持續發展晶圓產業，增加復甦能量。

反省IMF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施行的高利率政策，妨礙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的美意。因為，亞洲市場還未成熟到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與股東保障措施，大多仰賴借貸，調高利率不僅增加舉債風險，廠商用來因應風險的資金提高，相對降低流動資本與發展投資。

作者提出的改善方案：維持充分就業

1. 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
2. 維持金融的流動與停止債務償清，以改善體質差的銀行
3. 實施『超級第十一章』（美國破產法有可學習的內容，規稱為第十一章），機動因應破產公司重組。這需要政府的強力干預，釐清公司所有權，交由專業重整人員，並消除竊佔公司。
4. IMF與G-7 已開始重視破產、暫時停債、暫時資本管制等措施
5. 民主化的貢獻，將帶來更為透明的金融運作，如泰國新憲賦予這類知的權利
6. 然而，IMF在東亞地區造成的傷害，已使得亞洲市場不敢再承擔高負債的融通，
2. 造成資本市場運作的傷害，這恰恰與一向強調市場效率的IMF形成對峙。

日期	2007/12/28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雷敦蘇
主讀人／ 研讀書目	李俊達／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5
主讀內容	<p>Ch.5 Who Lost Russia?</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改革夢碎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1 紅色十月與共產革命（1917） 1.2 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1989） 1.3 1917 vs. 1989 2. 轉型的挑戰與機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1 戰時經濟_平時經濟 vs. 共產經濟_市場經濟：基本市場制度的有無 2.2 俄羅斯一九八九：制度的闕如 3. 先建立制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1 共產主義價格體系_市場價格體系、市場與基礎制度、國有財產私有化 3.2 改革的速度：震撼療派（Shock therapy） vs. 漸進派（gradualist） 4. 改革路上錯誤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4.1 震撼療派第一回合：立即的價格自由化_通貨膨脹 4.2 震撼療派第二回合：降低通貨膨脹_緊縮的貨幣政策（提高利率） 4.3 十年轉型、十年衰退 4.4 自由化、穩定化、私有化 5. 一九九八年的危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5.1 油價崩盤 5.2 匯率高估 5.3 IMF火上加油 6. 白白浪費的援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1 危機爆發 6.2 明知會失敗的援助計畫 6.3 普遍的轉型失敗 7. 工業巨人殞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7.1 生活水準下降 7.2 貧富差距大增 8. 錯誤的政策如何導致轉型失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8.1 通貨膨脹 8.2 私有化 8.3 社會架構 8.4 震撼治療
討論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身為過去兩強之一的俄羅斯，具有相當的工業基礎，為什麼仍然會面對如此劇烈的轉型失敗所導致的經濟危機？ 2. 貪污與人治的問題，顯然在圖求的發展過程是個問題，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要如何去避免或回應？

日期	2008/03/07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東吳大學政治系 黃 默教授
報告人/ 研讀書目	東吳大學政治所 白湘銀 /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 3
報告內容	<p>作者首先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為例，提出國際貿易協定的現況之後，討論貿易自由化的理論面與實際面間的差異，並且簡述了國際貿易協定的歷史。最後，則是提出對新貿易願景的看法。</p> <p>一般說來，「貿易自由化的支持者，都認為自由貿易協定能夠帶來國家的繁榮。已開發國家開放市場接納開發中國家的出口物品，使這些國家的市場自由化消除使資金、貨物和服務無法自由流動的人為障礙，讓全球化能創造奇蹟。」可是，那些貿易自由化所需要的代價，卻也沒換來原先所期待的提高效率或促進成長等等的目標。</p> <p>而「自由貿易沒有成功的原因，便在於沒有真的想做到自由貿易。」在不對稱的合約中，既不公平也不自由的貿易協定，就是現今國際貿易協定普遍的情況。另外，也須了解到的是，真正做到了自由與公平，也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蒙利，也不是所有人民的能獲得利益。況且，貿易自由化，也讓國家將更直接曝露在風險中，而不能承受這種風險或有所準備的國家，便更容易陷入危機中。</p> <p>因而，「貿易自由化必須要有與過去不同的管理方法，」才能使這些開發中國家維持長期利益且有效助於經濟發展。</p> <p><u>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u></p> <p>在一九九四年制定的 NAFTA，在當時創造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所含蓋的是 3.76 億人口和將近九兆美元的 GDP。該協定的支持者希望的是能夠透過其進而帶動墨西哥經濟，使這個國家能夠邁向繁榮。然而，在十幾年之後，NAFTA 顯然沒有成功隨然沒有像預測般的變成一場災難但也沒有帶來當初擁護者所宣稱的那些龐大利益。有如「支持 NAFTA 的論點，認為它能縮小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的所得差距，</p>

因而可望減少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可是，在 NAFTA 實施的前十年，兩國之間的所得差距，事實上不降反增，還提高了 10% 以上。」

「因而，一個較公平的協定應該要排除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並且取消美國對糖等農產品的進口管制，即使美國不全面取消補貼，也應該賦予墨西哥對抗的權利，也就是讓它對美國這類進口物品課稅以抵消補助，可是 NAFTA 卻不准這麼做。此外，必須注意到的是，雖然 NAFTA 取消了關稅，卻容許各種非關稅壁壘的存在。」

另外，貿易協定雖然可以讓簽定的國家在市場競爭時得到些許好處，但是不同國家的背景與經濟條件，都更是吸引外資與否的重要因素，因而，墨西哥更應該要將問題放在「需要做什麼才能更有競爭力」的問題上，進而針對公共投資花費多一番心力才是。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自由貿易能讓國家從本身的比較優勢得到好處，而由於每個國家各擅勝場，結果所有國家都能各蒙其利」

The Fear of Job Loss

換言之，在自由貿易下，一個缺乏資本的國家中的勞工，由於缺乏機器和技術，生產力與工資相對低，便會遷移到前兩者較高的國家。因而，也提高了產量，而勞工的遷移促使了世界經濟的成長。

然而，當工作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時，可能造成失業的危險，而這種情形發生在已開發國家時，有可能因為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有效運作，會在失業之後又能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但是這通常都不會發生。

「因而，如果快速貿易自由化的結果是失業率上升，那麼自由化所承諾的利益大概就不會實現了，因為一旦勞工從低生產力，但至少還受到保護的工作上失業時，那麼上升的就是貧窮率，而不是成長率了。」

「因而，貿易自由化需要更多的協助才能讓產業轉型。雖然全球化無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導致社會更沒有保障、貧富更為不均。但，政府的因應能力反而受到了限制。因為自由化不僅讓原本是開發程度較低國家的重要財政來源關稅被取消，同時為了與他國競爭，可能得降低其他方面的稅收，一但減短了稅收，同時公

共收入也會少了。於是，國家被迫削減教育、基礎建設以及失業保險等，此時最需要的社會福利措施。這些措施原本正是要一面因應國際競爭，一面幫助人民適應自由化的機制。」「因此，雖然先進工業國家已經開放了市場，可是開發中國家的出口獲利仍極有限，這些國家需要某些形式促進貿易的援助以幫助他們從新的貿易機會中獲利。」

「想要有成功的經濟發展：貿易與援助兩者都很需要」

Infant Industries and Infant Economies

幼稚工業保護論(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如果開發中國家打算進入某些產業，那些產業就必須受到保護，直到他強壯到能與基礎穩固的國際大企業競爭為止，進口的關稅會使進口產品價格提高到足以讓國際大企業競爭為止，進口的關稅會使進口產品價格提高到足以讓國內新工業打平成本，再投資研發工作等必要的相關能力，使他最終能站穩腳步」

「自由貿易擁護者則對其提出兩大批評 1 保護不是適當的解決辦法，如果長期來說這個公司能獲利，那麼它可以取得貸款撐過困難期。然而，在真實世界裡新公司經常很難取的資本 2 通常受到保護的幼稚工業，通常需要永遠與外面的競爭隔離，更常見的是特定利益團體會偏向鼓吹保護主義，為自己追求更高利潤，但這會使經濟體中的其他產業增加很多成本。」

而關於以上批評的回應，有一種是強調更廣泛的保護，因而衍生出幼稚經濟保護論(infant economy argument)的看法。「例如：要對工業製品制定統一的關稅，透過廣泛的產業保護措施，可以擴大產業的規模，進而產生創新的源頭並且擴散到經濟體的其他領域。」

Fair Trade versus Free Trade

如果所有的政府補助和貿易管制都取消了，那貿易體就會自然浮現，不過世上根本沒有這樣的體制，而**貿易自由化的不對稱**，使得可以去犧牲別人僅為少數團體牟利。此外，不可忽略地，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是建立在相對優勢，而非絕對優勢上的。所以，不管採用什麼標準，今日國際貿易的體制對開發中國家都是不公平的。而在不平等的競技場，表示會有更多國家，在整體而言輸掉這場競爭，也會有更多

人將成爲輸家。

The History of Trade Agreements

1994 年 WTO 正式取代了 GATT，其目的在於便於快速擴張貿易協定，並且把領域延升到 GATT 過去從未涉入的，如服務及智慧財產權等新的範疇。然而，WTO 是不完美的法規，在討價還價的談判過程中，通常有錢有勢的國家會佔上風。因而，談判機制的強制性是不對稱的。

烏拉圭回合貿易協定所引起的反彈：

1 不對稱協定更加惡化了最貧窮國家的情況，也使得不平等的競技場更不平等。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課徵的關稅，遠高於它對已發國家課徵的關稅，前者比後者平均多出了四倍。

2 該回合將重點放在資本流和投資方面的自由化，而不是勞力的自由化，即使後者更能使全球產出大幅增加。

3 強化智慧財產權主要是對已開發國家有利，但後來開發中國家爲此付的代價很巨大。

在杜哈發展回合上，他們承諾要創造一種貿易制度，主動加強經濟發展並且修正貿易談判的失衡現象。不過，幾度談判都卡在已開發國家拒絕撤銷農業補助的問題上。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作者希望能設計一套公平的全球貿易制度，不僅要促進貧窮國家的福祉，也能夠同時有利於先進工業國家整體利益。因而，他對這樣的新貿易願景有下列的看法：

1 開發中國家的待遇應不同

-爲窮國著想的自由貿易:一個擴大市場通路的方案

-擴大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議程

2 揮別農業補助

3 取消關稅升級

4 重視非技術性勞力密集服務業和移民問題

5 減少非關稅障礙（防衛措施、傾銷稅、技術障礙、原產地規則）

6 限制雙邊貿易協定

※ 改革制度才有更佳決策

現今國際貿易談判，主要有三大問題：議程不公平、談判不對等也不透明與執行不公平。而其主要原因便是制度上的缺失，因此便應該從議程設計、談判機制與執行機制上進行改革，並且透過國際合作，建立一個更公平及對發展更有利的貿易體制。

關於議程設計，「首先，以發展為導向的貿易議程，應該集中討論需要有哪些全球貿易協定才能使全球貿易制度順利運作，因為開發中國家根本沒有資源在廣泛的議題上做有效的談判。」其次，應該把重點集中在對開發中國家有利的一些領域。例如非技術性勞力密集服務業和移民等問題。有些新議題也可以加進去，像是限制賄賂、武器銷售、銀行保密制度，以及為了吸引企業投資而產生的各國稅率競爭等，這些事情都會對開發中國家造成傷害，而也唯有透過國際合作，才能有效的控制問題。」

關於談判機制，在治理的問題上，即使公開一直是國際談判時一個重要的考量，可是實際上的運作情形，卻是在 WTO 總部的密室(Green Room)裡秘密進行談判。而其當然也使得特定利益團體更有可能影響國際談判。

關於執行機制，在現今貿易談判，除了議程不公平，談判不對等也不透明外，執行不公平也是一大問題。執行機制的三公及缺乏有效性，即使弱勢國家在法案審判中獲得勝利，也無助於解決國家的困境。「因而，作者認為一個比較有效又公平的執行機制，至少可以准許開發中國家銷售他們的執法權。」另外，也應該建立獨立的國際小組進行法案的評斷。

討論問題

- 1.NAFTA 對墨西哥的影響
- 2.貿易自由化在理論面與實際面的差異
- 3.何謂公平的貿易制度

日期	2008/03/07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報告人／ 研讀書目	陳菽芊／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4
報告內容	<p>1.背景</p> <p>1.1 2004 年抗議美國摩洛哥貿易協定的理由</p> <p>該協定的條款延緩學名藥（generic drugs，相對於原廠藥，當原廠藥專利期過後，其他藥廠依原藥廠申請專利時所公開的資訊，產製相同成份產品）的推出，目的是保護美國的製藥公司的利潤。這個新協定裡對學名藥的限制，會使保護專利的期限從原先的 20 年增長到 30 年，有 NGO 推論，這只是增加了藥商利潤，卻減少了救命藥的取得管道。</p> <p>1.2 專利促進創新理論與 TRIPs（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p> <p>1994 年 WTO 的烏拉圭回合協定，簽訂 TRIPs，保護從事創新者享有專利的獨占利益，理論上就能激勵創新，然而事實未必如此(詳後述)。且 TRIPs 確保藥品維持高價格，批評全球化的人認為，TRIPs 如此的設計，代表歐美的大企業利益贏過了開發中國家數十億人的利益，商業利潤的重視已經凌駕環境或人道的基本價值。TRIPs 認為「越鞏固智慧財產權，經濟表現就會越好」。這是一個典型的全球化負面例子，犯了作者在第一章所提出的重大謬誤——「用一套特定的市場經濟理論矇騙世界，而這套市場經濟理論可能不適合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價值觀與社會背景。」</p> <p>從事創新者希望享有智慧財產權，並聲稱這是其從事創新的誘因，固然屬實，但目前智慧財產權制度需要更平衡一點，在獎勵創新與降低開發中國家使用這些創新知識的成本取得平衡。</p> <p>2.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s strength and Limit (p.107-118)</p> <p>2.1 概述</p>

智慧財產權是把智慧財產的使用權獨家給予擁有者。這就產生了獨占。當然智慧財產權的擁有者可以准許他人使用，通常是為了收取使用費。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設計，是爲了確保發明者、作家以及其他把金錢和時間投資於創造行爲的人，其投資能獲得報酬。

獨占的現象，會造成獨占的利益（也就是過度的利潤），而致力研究的誘因本來就是爲了獲得這種利潤。在知識的使用上若出現獨占，連帶產生的無效率現象會特別嚴重，因爲知識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公共財。想擁有經濟利益就表示應該讓知識能自由取得，可是智慧財產權制度卻刻意限制知識使用。這種作法是寄望於大量增加的創新能平衡獨佔所造成的無效率，因此經濟就能成長得更快。

然而專利所能涵蓋的範圍若過大，可能會形成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與蘇蘭圈地運動類似的弊病，也就是知識效能的損失，反而會減少創新。

當代的例子則是微軟利用其力量對付 Netscape 和 RealNetworks 等創意公司。1930 年代，授權汽車製造商協會(AM)形成卡特爾，維持汽車的高價格也是一例，若不是福特公司生產大眾價格的汽車，現代汽車工業的發展可能大不相同。在二十世紀初期，因爲萊特兄弟和柯蒂斯的飛機構想包含範圍很大，導致任何飛機的研發都有侵犯某些專利的風險，最後政府介入推動一個專利聯盟(patent pool)來解決。此外，專利制度可能增加公司很多行政成本，反而減少創新生產的支出。

主張強化智財權保護的人認爲，這可以促進研究，甚至宣稱「沒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沒有人肯做研究」，這是無理的辯護，因爲瑞士以及荷蘭到二十世紀初才有專利制度，立法完成之前也有傑出創新表現。智慧財產權只是創新制度的一部份，而非全部。

關於基礎研究，智慧財產權更是沒什麼正面用處。處進資訊流通和開放性架構才是比較有益的。例如 Linux 的火狐 firefox。

2.2 設計一個平衡的智慧財產權制度(p.112-116)

設計智慧財產權制度時，必須先回答一些困難的問題，例如什麼是可成爲專利的、專利時間應該持續多長、專利的範圍應該多廣等。這些答案不僅會影響到經濟的競爭範圍，還會影響到創新的層面。然而，許基本科學和數學裡很多最重要的概

念，都不能註冊為專利，因為阻礙以這類概念為基礎的創新，所付出的代價會極大，利益卻很小。近年來許多人想要擴大智慧財產權的範圍，容許更多事情被登記為專利並擴大專利的範圍。這引起很大的爭議。例如印度的瑜珈、基因解碼等。

製造 WWW 的功臣 Tim Berners Lee 曾經說過在他的領域，專利確實阻礙了創新：「這些專利帶來的是...網路發展的極大障礙。譬如一個正在往某方向努力的研發者，一旦聽到風聲說，某家公司的某項專利可能與此有關，這個研發者就會開始猶豫不決，不敢勇往直前。」因此，一個良善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可以運用各種方法，使獨占的成本和創新的利益兩者達到適度的平衡；這些方法包括：限制專利期限、要求公開專利細節，使別人能做後技研究；以及限制專利擁有者濫用獨占權等等。

2.3 TRIPs(p.116-117)

TRIPs 在談判時，美國與歐洲代表並沒有考量到，屈服於藥品業等利益團體，堅持延長專利會產生的不利，僅有少數危及健康的例子（例如 AIDS 的藥品製造）可以適用強制授權。而且 TRIPs 允許以貿易制裁合法落實智慧財產權，這比 WIPO(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更具執行力，然 TRIPs 讓美國和歐洲強迫全世界接受這種霸道的制度，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都可能遭受不利。

3.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3.1 目標：促進創新和社會正義

智慧財產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原先其也是想藉著鼓勵創新來增進社會福祉。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不只有資源上的落差，還有知識的落差，而智慧財產權制度能夠決定，要跨越這種知識落差是更容易，或更困難。開發中國家所求的是一個能夠讓他們比較容易獲得知識的智慧財產權制度；而且因位他們的醫療預算有限，藥物的成本對他們事關重大，只要多花一塊錢在醫藥上，他們就少了一塊錢在教育或經濟發展上。這也是為什麼救命藥物的價格對他們如此重要。

TRIPs 對於傳統知識也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護，以下生物剽竊的情形便是證明。

3.2 為開發中國家量身打造智財權

統一規格的发展策略是行不通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亦然。應該針對發展程度的不同

而設計不同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目前開發中國家要求修改 TRIPs，降低標準，這是很合理的。

3.3 取得救命藥物的通路

開發中國家很少有人負得起西方藥廠索取的獨占性價格，高出成本好幾倍，這種不對稱式一種經濟無效率，對於致命疾病更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就此有三種改革方法：

3.3.1 讓開發中國家以成本價取得藥物

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放棄所取其使用智慧財產權所需付出的「稅」。或許有人會說，開發中國家是搭便車。但是這是他們應該搭的便車因為已開發國家並沒有增加額外的支出，開發中國家卻能得到極大利益；可以促進其國民健康並且提高生產力。

3.3.2 強制授權

主要應該區分，究竟哪些是救命的藥，哪些只是美容或生活保健的藥。後者沒有理由非強制授權不可。但如果已開發國家不願以成本價把救命的藥物賣給開發中國家，那就必須准許開發中國家行使強制授權，生產或交易取得救命藥物。

3.3.3 獎勵醫藥研究

現金贊助研究的制度是不公平也缺乏效率。藥學的基礎研究是靠政府贊助，藥品則由私部門上市。一旦藥品上市後，企業及可賺取巨額利潤。訂價和邊際成本間的差價可視為對消費者課稅，這是一種極端落伍的稅，違反量能課稅的基本原則，因為藥物的稅率只有一種，一律適用於已開發國家中的富人和開發中國家的窮人。只靠市場誘因，無法促進針對開發中國家所需要的救命藥物的研究，已開發政府和基金會如何提供金錢和組織這種研究活動可能有兩種：

※以市場為基礎的誘因:保證基金：讓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做承購保證研發的成果。但這可能還是一個贏者全拿的制度。

※創新基金（較好的制度）：直接鼓勵為了開發中國家謀福利的創新。這種制度使研究者會因為創新的得到報酬，就能引導創新的方向。貢獻大者得到較高的報酬，貢獻小者得到較低的報酬。如此也可以確保這些補助被正確的支出。

3.4 Stop Bio-privacy and Protect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p.125-127)

生物剽竊的實例：已開發國家的藥廠將傳統醫藥或是民俗療法，加以研究，「在發現」，然後再行銷出去，甚至申請專利。例如於 1993 年，美國有人將醫藥用途的鬱金香登記專利。1997 年 RiceTec 公司取得印度香米的專利等，最後印度起訴並且勝訴。

TRIPs 並沒有提供任何誘因給開發中國家，保護可能蘊藏多樣豐富資源與知識的雨林。有兩種改革方式可以讓大家注意開發中國家的事：

※必須制定一個國際協定，以認識傳統知識，並禁止生物剽竊。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包括美國，都必須簽署生物多樣性條約。而凡涉及生物多樣性條約內的財產權，都應該列入智慧財產權的國際協定裡，尤其是 TRIPs 協定。

3.5 Governance

國際決策的模式一直有兩大問題：開發中國家聲音太小，利益團體的聲音太大。

改革的關鍵是，將決定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務的單位從 TRIPs 中撤出，並且改善決策模式，回到 UN 底下改組後的 WIPO，可以聽見各界的聲音與立場。並且應該保證窮國在訴訟中有能力和富國抗衡，如同法律扶助制度。

3.6 Trades and values

國際貿易協定和許多基本價值觀可能衝突，例如文化、環保等等。經濟利益不能凌駕於一切之上，經濟發展的長期遠景比 GDP 更為重要。

3.7 結論:Corporate interests

本章說明了企業利益如何影響全球化，使一些基本的價值觀不得不妥協。西方貿易談判代表忽略了美國或歐洲的納稅人以及消費者，只想幫助廠商，缺乏關心環境、人類健康、整體科學進步的動機。貿易部長們決策的過程又傾向秘密談判，完全不符合民主模式，只是讓企業利益的聲音凌駕一切。如何使全球化更民主是改革的重點，必須能夠包含各種價值觀的辯論，來超越那些單純企業利益的主張。

日期	2008/05/09 PM6:00~9:00
地點	外雙溪東吳大學 B013 室
主持人	黃 默
主讀人／ 研讀書目	吳景義／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主讀內容	<p>※ 第五章－富人市場、窮人官僚 【Chapter 5. The rich have markets, the poor have bureaucrats】 主題：探討由上而下的外來援助對於地區發展成效不彰的原因與可能替代做法 「無名氏：每個人都會犯錯，但真正弄糟情況是需要一群人的。」 【Anonymous : To err is human, to really screw up takes a committee.】</p> <p>1.前言</p> <p>(1) 援助代理組織在本質上是一官僚系統，無法使援助資金轉變成對窮人緊要的服務；但是官僚系統在西方富有國家政府中運作得比較好，因為民主制度使其對公民負有責任；而官僚系統在企業中也運作得比較好，因為市場使其對顧客負有責任，利用由下向上的<u>搜尋者</u>找出達到最大顧客滿意度的最便宜方式。</p> <p>(2) 在私有市場中優良表現的動力與自豪會彼此增強，在民主官僚系統中政治動力與優良表現的專業規範彼此相關，但在援助官僚系統中政治動力過於不利於那些嘗試獲得成果的專業人士。</p> <p>(3) 貧窮的悲劇是窮人沒有錢或政治權力，去傳達需要、或激發<u>搜尋者</u>來滿足其需求；援助官僚會有動力去滿足提供資助的富有國家、而非貧窮國家。</p> <p>2.再次由下向上的反饋 【Bottom-up Feedback Again】</p> <p>(1) 市場重視個體之優美在於顧客的選擇提供反饋於供給者，市場之奇蹟在於其調和無數個體的选择，通過市場運作的價格在供給與需求系統中像是溫變自動啓閉裝置；民主也以反饋為特色，政府公務員因為公民呼籲、或者政府因為選舉人抗議而可能就改變行動。</p> <p>(2) 外來援助代理機構的困境在於官僚正控制了那些無能力傳達其需求之窮人的遠端覆蓋物溫變自動啓閉裝置，以致<u>計劃者</u>沒得到來自於窮人的反饋，因此貧窮的外來援助接受者獲得某些不想要的事物、而沒有獲得她們急迫需要的事物。</p> <p>(3) <u>搜尋者</u>能藉著走出專業領域、與窮人對談、設計如全面調查等反饋機制、以及進行局部區域運作的實驗，而將援助事情做得更好。</p> <p>3.我是委託者、你是代理者 【Me principal, You Agent】</p> <p>(1) 富有國家的政治人物控制外來援助代理機構、作為援助委託者，而非由真正的顧客－貧窮國家的窮人來作委託者，而富有國家的選舉人與其代表更會撿選外來援助代理機構的活動。</p>

- (2) 計劃者心態中有終結世界貧窮等烏托邦式目標，以致於富有國家的政治人物可能以整體貧窮結果為基礎來評判援助代理機構；但事實上貧窮結果取決於官僚系統之外的眾多因素，援助代理機構要滿足富有國家委託者的夢想，就必須與可能不關心減少貧窮的當地政府機關與精英份子一起工作。
- (3) 問題核心在於個別援助代理機構的努力與成果是不可見的，由於無法容易地被測量，所以通常無法負起可說明的責任；當沒有人能區分援助代理機構的努力是否產生差異時，其管理者盡力做事的動力就變微弱了。因此，可見性將權力給予搜尋者，但不可見性將權力轉移給計劃者。

4.小孩貢獻某個浴室幽默【The Kids Contribute Some Bathroom Humor】

- (1) 假設在當中只有兩個小孩的電梯裡，為了避免被別人非難，就會有要抑制放屁的動力；假設在當中擁擠的電梯裡，由於其他小孩將不知道要責備誰，因此要抑制放屁的動力會減弱。
- (2) 因著救世主驅動力，西方嘗試經由外來援助去做任何事，造成有眾多的委託者（富有國家政府與議題遊說團）與代理者（國際代理機構）之複雜狀況，為代理者創造了極多的目標，而減弱代理者完成任何一個目標的動力。
- (3) 功能異常的官僚系統是一個或一群當中沒有人會被責備的代理機構—因為會說「那不是我的活動範圍」，當某件事情出錯時，委託者並不知道誰要負責任；問題在於目標愈大、愈普通時，可能貢獻於結果的代理者就愈多。

5.修補路上的坑洞【To repair a Pothole】

- (1) 鄉間窮人想要他家門前路上的坑洞被修補，然而如果是透過外來援助官僚系統來完成，將是一件永無止境和複雜的工作，最後轄區政府還不一定會去修補他家門前路上的坑洞。
- (2) 可能的改善方案在於：與其讓每個援助代理機構負責每件事，不如讓援助代理機構更加特定地在特定的國家內解決特定的問題。

「莫非定律的推論：不管如何努力地去嘗試，有時候事情總會朝對的方向發展。」

【Corollary to Murphy's Law :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every once in a while, something is going right】

6. 成功【Success】

- (1) 不要放棄所有的希望，援助計畫有時候是成功的，將真實利益傳達給窮人，例如更好的健康、教育與經濟政策，水、衛生設備、及電力的使用等方面；將這些歸功於援助是推測性的，因為援助代理機構沒有足夠科學性企圖去評估援助計畫的衝擊，但是至少提供援助計畫有時候會有用的某種暗示性希望。

7. 對官僚行為的預測【Predictions of Bureaucratic Behavior】

- (1) 在某些條件下，官僚系統可能會更有效，而將權力由計畫者轉移至搜索者，包括多努力於可觀察到的活動和實體且可測量的目標活動、由努力

到結果之間有清楚的連結、有較少的目的、專攻特定可解決的問題、有較多關於顧客想要事物的資訊、底層的代理機構受激勵且負責任的、以及能夠招募熱衷的專業人士等。

- (2) 特定可測試的預測奠基於結果是如何有層次性的、結果是如何有可見性的、與個別可測性是如何可實行的；具有層次性、可見性與個別可測量結果之領域較可能經歷成功（如：讓村莊有乾淨的水）；目標廣泛、努力不可見、與個別可測性不可行之領域較可能經歷失敗（如：達成經濟成長）。

8. Aid Volume 【援助的數量】

- (1) 當代理者貢獻於發展的輸出是不可觀察的，則代理者的計畫者會嘗試為其輸入於發展的數量做廣告；一個外來援助代理機構做廣告的可見性指標為其所支付金錢的數量；惟一的問題在於外來援助數量是對於發展的輸入、而非輸出，官僚與政治人物聚焦於整體援助花費金額似乎是很奇怪的。
- (2) 這個特殊的病理學至少在理論上是有解決方法的：富有國家對於援助代理機構的監督應該讓援助支付不能作為成功的測量。

9. 熱帶地區的優勝美地·山姆【Yosemite Sam in the Tropics】

- (1) 援助代理機構頂層管理者有動力去對於富有國家的民眾展示可觀察到的努力，以致於產生許多可見的架構、任務人事、報告、與政府官員會議；援助代理機構努力為著彼此與富有國家的媒體撰寫報告；層峰會議與架構的激增證實代理機構側轉努力至可觀察到的輸出與擁抱集體責任之預測。
- (2) 援助代理機構因著設立目標而被獎賞更甚於達成目標而被獎賞，因為目標對於富有國家的民眾是可觀察到的，而結果卻不是；個別的援助代理機構感受到政治壓力而加入許多目標去回應富有國家的選民，但是由無法代表窮人的富有國家議題遊說團而來之反饋可能事情更糟糕。
- (3) 最終的結果造成援助代理機構就像優勝美地·山姆一樣任意地在所有方向上生火；頂層管理者感受壓力而承諾去做任何事，援助代理機構在每個目標上都做一點點，以致於錯失來自特定專攻的收穫，並且使低成本/高利益的活動資金短缺。
- (4) 部份的解決方法在於改變援助代理機構面對的富有國家政治市場，使援助代理機構不再幻想去做任何事，而以一些能確實達到的具體方式讓窮人生活得更好。

10. 良好的可測性【Good Observables】

- (1) 某些由援助代理機構產生的浮誇報告是有真實價值的，包括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努力成果當中貧窮國家可見性必要事物與需要、許多其他前哨專業人士獻身於發展問題的精確分析而產生的報告，例如世界經濟瞭望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重要出版品、世界發展報告是世界銀行每年的最好報告，這些報告構成了世界上關於個別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資訊供給。

11. 低維持性的發展【Low-Maintenance Development】

- (1) 要產生可觀察到的輸出之動力也造成援助代理機構的服務與窮人的需

要之間的不協調；由於資助者認為在基礎建設計畫完成後的運作供給與維持是接受者政府的責任，想像地方政府必須接管計畫才能維持下去，因而拒絕提供資金，造成援助代理機構成功地建立可見的道路、卻不做較不可見的維護，建立學校、卻不提供教科書，建立醫院、卻不支付醫生或藥物。

- (2) 有個方式可以讓援助更有效，即援助資助者應該勉為其難地永久資助道路維護、教科書、診療藥物、以及其他發展計畫的運作成本。

12. 協調【Coordination】

- (1) 每個援助代理機構都有動力在多重目標上滿足其選民，而嘗試做任何事，如同彼此複製一樣，以致於有過度的援助官僚；持續地有協調的呼籲與缺乏協調的抱怨，正說明每個人都想要、卻無法改變任何事去達成。
- (2) 在目前的援助系統下，每個援助代理機構向有不同議程的不同老闆報告，協調是不可能的；聚焦於可解決的問題之某些建議，如特定資助者、越過政府等，將會緩和協調的這個馬蜂窩。

13. 附帶的利益、附帶的傷害【Collateral Benefits, Collateral Damage】

- (1) 援助代理機構幫助窮人較不有效，不只因為來自於預期的受惠者之聲音或反饋微小，也因為有來自確實地付賬的富有國家委託人之嘈雜聲。
- (2) 富有國家資助者會限定某部份援助要向其本國的出口商購買（屬於受束縛的援助），援助的束縛會降低對接受者的價值，因為它限制了能夠被購買商品種類與向誰購買的選擇。
- (3) 對於貧窮國家的技術協助是更糟的，因為富有國家通常堅持其國家是技術指導者，因此技術協助援助的優良部份簡單地又流回那些傳遞出由對貧窮國家兩週了解而來的這種深刻理解之富有國家諮詢者；援助的束縛顯示出富有國家的偽善。

14. 評估【Evaluation】

- (1) 雖然在援助代理機構的評估已進行一段長時間，但是它常是利用執行計畫同一群人的報告進行自我評估；目前援助代理機構確實有評估部門，例如世界銀行有執行評估部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獨立評估辦公室，然而即使內部評估指出缺失，並不表示援助代理機構就會改變其執行表現。
- (2) 只有來自外部的壓力才可能創造出良好誘因，做出好的評估；富有的國家委託含糊的目標，而貧窮的人沒有聲音；因此援助代理機構只有小小的誘因以激勵其積極表現。

15. 透過規劃而參與？【Participation Through Planning?】

- (1) 援助機構最近已經把更多重心放在窮人的參與上，然而，他們並不真的能放棄他們的中心計畫，他們也容易用這些來減少貧窮者的主動性。
- (2) 真正的參與將會讓貧窮者作他們自己的選擇，授與貧窮者權力的最好方法將會是在特別的區域中專攻特別的部門。

16. 先前的生活狀態【Prior Lives】

- (1) 援助代理機構似乎受困於一個重覆自身經驗之同樣無力的循環中；在援

助社群裡缺乏歷史性記憶，以致於往往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對許多想達成目的地之不變處理方法，再度顯示出援助代理機構持續投入愈來愈多的資源，企圖達到一個註定而達不到的目標。

- * 作者以表格比較過去 50 年援助階段分期（石時代→鐵時代→矽時代）中各種援助構想（捐助者協調、援助量增加、對援助接受者有選擇性、貧窮重視增加、國家所有權、及負債消除）的實際作法，而以一句法國諺語「改變愈多，事情愈是一樣。【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EME CHOSE.】」來詮釋。

17. 援助官僚之間的差異【Differences Among Aid Bureaucracies】

-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經失敗、但目標縮小後稍微有較多的成功。
- (2) 世界銀行(WB)：易有無意義架構與目標增殖、仍屬較好的援助代理機構。
- (3) 美國國際開發援助署(USAID)：聲明其目的在於推動美國外交政策目標。
- (4) 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比大部分其他援助代理機構更致力於獨立評估。
- (5) 聯合國(UN)：透過有眾多委託者與集體責任的笨重聯合國大會經營，表現比其他援助官僚系統更差，往往發表永無止境又無意義的報告，其內文句常無實體內涵，其可疑的經濟分析不像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地好[以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的貧窮分析圖示為例]，時常不斷地舉行高峰會、乃因為前次的高峰會尚未完成目標。

18. 獲得進步【Making Progress】

我們應該如何改善援助組織？

- (1) 請富有國家資助者放棄改變其他國家的烏托邦幻想。
- (2) 請不要鼓勵援助代理機構設立那些在政治吸引力而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 (3) 請只要求援助代理機構聚焦於狹小而可解決的問題。
- (4) 請支持援助代理機構各別地對於其本身計畫要達成的目標負有責任。
- (5) 請考慮讓援助代理機構彼此競爭去在特定國家提供特定發展性服務。
- (6) 請讓援助代理機構接受獨立性的評估。
- (7) 請鼓勵更多學術機構的研究者進行獨立性的評估。
- (8) 請幫助援助機構內的研究者具有更多獨立性。
- (9) 請讓商人也被開發成為進行援助觀察的一大資源。
- (10) 請丟棄所廣泛性架構、中心計劃及世界性目標，只根據地區需求而回應。
- (11) 請尋找小的改善措施，而測試是否達成想要的結果，之後重複這些步驟。

五、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一) 研讀目標方面：

如前所述，本研讀活動企圖從弱勢族群的角度出發，帶進全球化的脈絡，持續討論發展與貧窮的議題。究竟全球化的趨勢為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帶來什麼變化？如何評價全球化對人類發展帶來的影響？對弱勢族群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以及NGOs對促進發展及消滅貧窮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遭受哪些問題與批評？是我們主要關心的重要議題。在一連串的研讀活動中，參與成員皆能針對上述議題進行討論，同時根據各自不同的訓練背景、經驗提出反思與回饋，因此針對研讀目標的部份，可說有相當豐富之收穫。

(二) 研讀進度方面：

由於討論之議題牽涉範圍廣泛，觸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面向，同時這些議題本身不論在學術研究上或是實務工作上仍存在著許多爭論，也因此在進行討論時往往十分熱烈，使得進度難以完全照預定時間進行，因此在時間的控制上或需要加強與注意。

(三) 成員討論與資源分享：

雖在進度的掌握上有些許落後，但參與研讀之成員皆有充分準備，對問題有深入的討論。對於研讀會中無法回應、處理之問題，會後成員彼此間仍會以e-mail針對問題進行討論或是資訊分享。同時相關討論、資訊、資料、活動訊息都已上網，置於研讀會之Blog上，促進學術資源之共享。對本經典研讀議題有興趣之青年學子，也透過Blog的討論與聯繫，參與本研讀活動。因此在問題的討論與資源的分享上有十分傑出的表現。

六、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由於本研讀活動觸及許多跨領域的議題，導讀人分別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學術研究上皆有傑出的表現，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哲學、人類學及醫療領域。相較下，經濟問題方面的學者、專家的參與則較為缺乏，這主要是受限於國內、外主流經濟學理論（新自由主義）仍舊認為整體經濟的成長是解決發展與貧困的不二法門，因此在國內經濟學領域內較不容易找到可以對話的

九、 附錄

研讀活動紀錄：

(一) 2007/10/05/Global Transformations: Introduction and Ch.1, Ch.3

報告人: 雷敦蘇、白湘銀

1. 全球化治理的問題：誰反對全球化？亦或要求進一步的轉變，但仍期待全球化。書中持後者的態度，反對國家某些方面的治理。雷神父認為了解治理的原則與操作方式、讓參與治理的行動者擴大，而不獨依賴經濟學專家，值得我們思考。
2. 作者的分析架構，尤其是在對貿易方式與發展的分類上，有沒有遺漏的範疇？不少與會的成員提出這類的疑問或質疑；是否作者們以簡單的邏輯牽強附會地套入歷史。黃默老師則注意到作者的角色，以為此種分類的走向與四位作者皆來自不同領域的對話與妥協有關，提出了另一種回應問題的觀點。
3. 透過本書，如何關心弱勢族群的人權問題？與會的成員都同意這是今年閱讀收穫的重點，在第一次的閱讀裡我們還有初步的答案，但這個問題是很關鍵的。

(二) 2007/10/26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h.5, Ch.6, Ch7

報告人：李仰桓（內容請參見研讀大綱）

黃默：謝謝。我們是不是有些問題想提出來問他？哪位先開始？

蔡竟予：結論第一段說在區域內發展世界文化主義，請教這裡的世界文化主義與之前的文化世界主義是同樣的東西嗎？又你覺得作者的意思是什麼？這令我聯想到對世界文化主義的各種討論，而導讀您覺得作者最終的看法是什麼？

李仰桓：作者並未在這裡特別說明世界文化主義。我認為作者討論文化全球化，認為文化世界主義卻是有比較明確立場的，所以我想在內容上兩者有很多的相關。

雷敦蘇：仰桓你提到一些地方是你看不清楚的（請參見研讀綱要）。如7.3.6:你的翻譯我想做（如下的）一點修改，全球文化活動的地理範圍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電話使用的影響，使得他與以前的制度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樣的。意思是說，比如像英國在帝國的時候，英國人可能去澳洲、紐西蘭或巴西的較多，但是現在旅遊盛行，旅遊的人現在可能選擇到西班牙的海灘等等，他們現在不會去原來帝國時期當中的那些殖民地地區。這個地理的變化是指這個。

又你問到為什麼是東方與南方的東西會跑到北方？這時候的北方就是西北方，如美國、歐洲等。我自己是想現在全世界最多不同佛教的城市，你知道是在哪裡嗎？不同類型的佛教教派在同一個城市？是洛杉磯。這個就說明一些東方的太極拳等就是跑到歐洲或美國去。是不是變成主流？不知道，但是影響還是蠻明顯的。

李仰桓：我那時候會在這個地方有點不大瞭解的原因還有一個；他整個文章描述的方式似乎都是在敘述西方文化向其他地區的傳播，可是在這個地方他（作者）忽然間又提了這個。可是東方文明向西方傳播的過程，作者並未說得更多。所以我才覺得這邊有點突兀。

雷敦蘇：其實東方文化在清代的時候對歐洲的影響蠻重要的，如中國思想。那後面他談到歐洲的部分。因為不是最新的書，我自己的感覺是現在，特別在

某些國家，如愛爾蘭，他們就非常肯定歐洲的貢獻。雖然，我承認，尤其是在英國比較落後的地方，他們會比較排斥，但現在在英國的排斥，從去哪裡放假可看出，他們都會去法國這些地方，其實還是有很大的影響。我自己感覺是慢慢好一些。

但是我自己想像，因為這裡談很多媒體，電視，可能對現在來說就要加上網路，因為這是網路還沒發展之前寫的。但另外一個，我認為在全球還是以英文為主，甚至我們知道新聞，大部分是CNN或BBC，我們很難從非英語的媒體得到消息，比如從阿拉伯文或俄文來看。當然我知道，英國廣播電台努力在做這樣的事，甚至我們在台灣的Taipei Times，每天努力從不同的地方拿到其他的消息，比如前陣子從韓國等，但是現在仍舊常常透過英文，所以我們看世界恐怕在某些方面我們知道更多，但在某些方面，出現一個危機，我們只是從某幾個國家的角度去看，電視或是媒體，甚至有時候窄化了我們的世界觀。

李仰桓：這裡談到語文作為文化全球化的基礎建設的時候，其實他指得就是英文，因為越來越多人可以學習英文，而且英文也是一個越來越被要求學習的一個語言，所以它逐漸成爲一個共享的語言。

潘美玲：

我覺得作者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腦袋中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因為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定義文化的時候，人跟他的環境，（在適應互動）之間所發展出來的一些方式，所以會有一些東西，如穿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樣的食物？跟這個東西是有關的。又文化存在哪裡？除了在博物館以外，其實是存在於我們人的身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我們文化的動力（agency），傳承，繼續實踐文化那套，然後繼續傳承下去。

所以，我要講的是，如果從比較動態的觀點來看文化的形成與累積的時候，作者似乎假設有一個比較靜態、不動的東西，然後透過全球化的過程，（這個東西）會怎樣地改變。我們如何去看待作者所提出的文化？作者提得太多，我大概分成幾類：文化產品（culture product），如唱片、電影、戲劇等；媒介，雷神父也提到，如電視、廣播或網路等可以散播文化的，所以誰擁有這些東西，某種程度可以去推銷怎樣的文化產品。所以或許我們可以用這個角度，從誰掌握了怎麼樣的

工具或媒介，透過這些東西，傳播了怎麼樣的產品，也許從這裡再去看文化全球化是從哪一邊散到哪邊去。

第三，作者比較關心同質化與個別多元文化的發展問題。但我會想看的是，每個人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可能都會有許多作法，經常針對同型、同類文化，我們會去加強我們的差異與認同（identity），比如說鄒族的衣服特別就做出一件T恤（那天雷神父穿了一件鄒族的T恤）。其實這就是我們面對一個問題時的反應，這是我的傳統，因此我要把它提出來，所以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說傳統是重新創造的（reinvented）。我會覺得作者給了太多的東西，可是，基本上在全球化過程中，他沒有去想這塊東西，我認爲他從非常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某種程度是美國化，從這個角度去切進來，然後一點一點的去看這樣的過程，可是，我會覺得文化是動態的，可能有很多不是我們的東西，可是現在我們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以後，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日本的東西，我們經常使用一些好用或傳下來的東西，從定義而言，那叫不叫文化？那可能就是一個文化，文化背後有許多拼接及剪貼，動態、傳承（go carry on）、繼續發展（going on）的東西。我覺得這樣來看全球化也會蠻有趣的。

再者，我們前面提到的一個移民，移民也應該與（文化）全球化一起來看。因爲若把人當作一個文化載體來說的話，人到哪裡去？接觸到不同的文化，他自己也會帶著他的文化到世界去。這會和作者在談早期的移民不一樣，因爲早期的移民的時候會說菁英比較可以移動，統治階層或移工，可是旅行的過程裡面可能是左右鄰居所有的人都可以發散出去，所以這個互動，若要說有一個全球化的、文化的東西，結果可能就是混合（mix）在一起，可能會比較像，就是大家都有一點那個東西存在，這是我讀這本書的觀察。

黃默：您們（黃嵩立、黃怡碧）二位坐在那裡...怡碧妳先說。

黃怡碧：我很同意雷神父的看法，語言可能是最關鍵的，因爲語言的隔閡，即便有了網路，仍使得我們對其他文化的忽視、偏頗或不瞭解。可是爲什麼英文會變成現在的強勢語言？我覺得作者對政治與強權對文化影響的關連琢磨太少，書中討論的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對政治的影響，我覺得將政治與文化對全球化的影響脫離來看，是有點可惜。

特別是在同質化的部分，我認為作者有點以偏蓋全，提出了一些有點可愛的例子，例如北愛或魁北克來達成訴求，可是，從我剛才學的經濟學來看，如果大家都在消費同質性的文化時，相對而言，就沒有人要去消費那些少數的文化，就沒有人...(關心?)，我的意思是M，那這些少數的文化就會慢慢的死掉，不見得是被同化，而可能是不見了。總言之，我認為文化全球化背後有強力的政治鬥爭的面向，而不是根據很多的硬體，怎樣的流動，就自然而然的變成我們今日的社會，應該有特別人為的操縱的努力，那可能是一種政治力。

黃嵩立：請教因為仰桓剛剛所問的問題，還沒被回答。文化世界主義對民族國家提出挑戰，新的想法是要求把權力要放在insitution（制度）裡，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在說，假設透過一個全世界的意見或資訊的交流，形成了一個環保的社群，這個社群會要求將權力放置在一些國家之外的、怎樣的政治結構當中，是這個意思嗎？

黃默：我想是，我是這麼讀的。如歐盟、聯合國、婦女運動、環保的網絡都是制度的例子。問題是，剛剛雷神父提到，當前歐盟四十年來的努力有什麼樣的成效，神父覺得歐盟意識的展現是比書上寫得要多一些。若將潘美玲老師的說法放在一起看的話，潘老師特別強調會引起一種反動，對抗從西方來的文化、擴散或宰制，會在很多時候產生一種反撲，如（台灣）邵(鄒)族的T恤，這沒錯，但我想這樣反撲的力量還是非常弱小的，多少人穿這樣的T恤？反觀這些跨國公司的T恤，在每個購物中心都能購買？怡碧說得也沒錯，好些時候，當地的傳統就不見了，所以我想不論我們感情上如何想，我觀察到的是這個樣子，可能我們不願意看到，但到現在多是這樣的；英語是最具影響的語言，中國的人口比例儘管是很高，但我們都不是透過漢語的新聞傳播來瞭解世界的。

再回到文化世界主義，竟予問，其與文化全球化的關係，可能作者想說的是將文化世界主義可看做是個結果，後者（文化全球化）則是一個過程，分析透過這些過程能否可能達到一個文化世界主義，假若可能的話，這是對文化民族國家（cultural nationalism）提出一個最最基本的挑戰。

另外一點，一開始，仰桓你對定義的部分稍微化約了一些，你一下就開始說，前面還有一句話，在第328頁最後一行，因為你沒有翻出來，所以我們就比較會想

爲什麼僅僅只談機械、電影等，儘管他真的談的比較多，我覺得他還可以再談一些social construction, articulation and receptional meanings，但是他都沒有談，那這樣的談法，在剛開始我沒有對照原文來讀，我就覺得這是傳統談文明(civilization)的方式，而非文化(culture)，雖然他沒有談得很多，但提出來了。

我最近讀到Dworkin的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他談得是美國的情況，但最開始的一章，我想可以提出來，最早他也談到文化，他說，我要把文化(culture)定義爲，他說有很多可能性，其中一個，每個人每天生活做的決定是文化的一部份，這就接近美玲老師所講的，另外一部份則是法律(law)，一個社會共同做的一個決定，也是文化。所以文化可以從很多面向來看，沒有遲疑的，作者則是將重點放在文化傳播的媒體工具。我又想作者不大願意說出他對文化立場，似乎可說是他對這本書想做一個比較客觀的選擇，這是可以受到批評的。我初步的回應，還有沒有想提出來問的，雯如呢？嵩婷？恒君？Dorothy?好，你(景義)先說？

吳景義：我看不懂這個結論，從文化全球化，美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但在結論，歐洲人民對歐盟的認同，我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連可能是什麼？

李仰桓：我也覺得有點突兀。不過這章除了講文化全球化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文化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影響，就是說對於民族認同的，剛提到說尤其是以消費同質的時候，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有什麼影響。我覺得他的結論是想透過歐盟的例子去說明其實那個影響並沒有這麼大。這個例子與前面討論的關連應該是在這裡吧。

吳景義：比較難想像在歐盟裡所呈現的文化全球化現象，應該不是前面所介紹的這些東西。

黃怡碧：作者是否是想在北愛爾蘭與魁北克這類的例子上再做一點補充，有意地想整合在一起，可是做不到，如同仰桓說的，這對國家或民族認同的影響力並沒有這麼大。可是，我覺得台灣與中國的狀況又可以做一個反證。

黃默：我也想問這個問題，台灣與中國，妳先說。

黃怡碧：舉一個實際發生的例子，去年帶了一個實習生，他是道地的台灣人，但卻自稱是失根的蘭花。

黃默：這是什麼（指『失根的蘭花』）？

鄭雯如：這是我們以前都會唸的。

黃怡碧：這是我們小時候都有讀過陳之藩，說他家破人亡之後，到國外唸書。可是意思是說，一個家族在這裡幾百年，可是因為我們有經過這樣五十年的教育或透過文化的形塑，我們很容易就對一個，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沒有任何血緣，或是，血緣可能有，比較久，四百年以前，可是就會產生那種祖國的嚮往，或是感情的連帶。我今天不能再這樣說了，因為有人說我是國民黨派的（大家笑）。我覺得歐盟不會向它原先組合在一起的目的，要建立一種共同的文化或國家的認同，它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以經濟統合為目標來進行一部份的統整的，所以目的非常不同，而且沒有任何人以一種統治者的身份出現，也沒什麼能作為那種反動的對象。

雷敦蘇：我自己對歐盟在形式上是一個經濟的聯合，但是開始進行這項工作的人非常清楚他們並不只是做經濟，而是要確保戰爭不會再發生，當然這個背後是有很多歐洲共同文化的基礎，然而歐盟現在仍舊還未克服國家認同的問題，大部分的人還是會先以國家為他自己的自我認識。在某些方面，有一批人就變成，比如以前的一個大學同學，他在歐盟工作，像這樣的人，可以從一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基本上，因為會幾種語言可以溝通，其實在全世界，我們也會產生，比如說希爾頓飯店，或某些地方，你可以清楚知道大概吃同一類的東西，變成去另外一個國家，去了很多國家，但實際上你根本沒有碰到那個國家的文化，因為你的範圍都是一個全球的範圍，還是會堅持自己原來的文化，你就變成一個全球人，住在跟國家完全另外一種的文化當中，這也是經常發生的。

黃崑立：作者前幾章不都有用速度、廣度等分析，我覺得這時候應該用這個架構來討論，卻反而沒有？在前面作者談到我們有很多生活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可能包括我們看的電影等，但最後的結論可能是說，其實這些看來很廣泛，但都沒有深遠到可以影響我們對於自己是哪一個國家的人的認同，這樣的討論好像有斷層，把推理的部分落掉了。

李仰桓：其實作者也再次提到這個架構，但我無法清楚的看到這個架構說明這章的東西，所以我的報告裡面也沒有很清楚地點出這個架構，不過他確實有一兩段話把這個說了一下。

潘美玲：我在導讀的時候提到，文化是他整本書最弱的部分。我覺得作者對文化的處理不足，而且還很表面，只能作為導讀，對文化全球化的瞭解，應該左以其他的書做補充，我在課堂上，就用了Walter講文化全球化的書。

黃默：這個我很同意，我想為什麼開始就讀這本書？就是把它看做最淺進的一本書。本來想很快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但沒想到，已經費好幾個星期了。

我很同意怡碧的看法，政治與文化的關係當然是非常密切的，假設將兩者分開來看，好些議題也就看不到，但這個關係應該怎樣去分析，在不同的情境是什麼樣的關係，當然也不是用幾句話就能明確地表達出來的。

最後一個問題，我又想問在座有沒有覺得是很受西方文化壓迫的？

鄭雯如：有啊，在閱讀英文的時候（大家笑）。

黃怡碧：對啊，就是被迫英文要比母語更好，才被當作是有文化水準的。

潘美玲：像我們系上需要英語教學，可是我們系上有老師是法國回來的、東京帝大回來的，他跟我們說，他這輩子最後悔的決定是去東京留學，而不是去美國（大家笑）。我聽了之後真的是感嘆，因為我對他的學問非常崇拜，能去東京帝大拿博士比我們去美國是多麼地不容易，竟然因為這種制度，竟然跟我說沒有去美國讀書是錯誤的選擇，我想這個例子應該很明顯吧。

黃默：雯如，你剛才想說什麼？

鄭雯如：我只是再說失根蘭花的事情，教育真的有很大的影響。高一的時候，第一次台海危機，九六年飛彈危機，許多的鄰居都移民了，大部分是醫生或有錢的商人，當時我慷慨激昂地在週記上寫著「我們的國人如此地不愛國...我們要捍衛我們的國家...」，但我那時對國家的認同是模糊的，我會同時用「中國」、「中華民國」、「我們」，但這裡的「我們」其實不包括「他們」（大陸地區的人們），...

蔡竟予：台灣比較哈日、哈韓，我訪問了台裔的妻子，我覺得父親的那一輩不要與外省人結婚，對我的影響很大。外省妻子以為台灣很好，下飛機的時候就不這麼想了。許多的朋友覺得台灣很封建，妻子應該坐在客廳裡削水果，被迫面對別人的質疑。

黃默：我似乎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尤其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我想有先問題我們可以先放一下，再回頭來討論。大家對這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提出來討論的？那我們就讀這個**T-Shirt**，好不好？有好些問題我們可以再回來討論。

(三) 2007/11/16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Ch 1-6

主讀人潘美玲：

因為這本書的內容都蠻簡單的，所以等一下我們介紹的時候可以比較細緻的來討論。所以我的主讀內容會在作者是用什麼樣的寫作策略來撰寫這本書。

作者以Karl Polanyi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理論來展開論述，我覺得很有趣，剛開始以為政治經濟學終於被放進市場裡了。但實際上，作者好像又耍了些小技巧，使得結論仍舊傾向古典經濟學的主張及強化對自由經濟市場的認同。書中一方面提到政策對經濟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想說服反全球化的運動者，回歸一種市場正常化的運動。

我引一段Polanyi的話，但與作者是不同的，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作者僅僅是用了Polanyi的理論形式而已。

另外一個重點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作者對現象的描述對我們的助益頗多，但對於其論述，我覺得應該有更細膩的對話，尤其是與反全球化者的對話，作者的論述企圖將反全球化的論述吸納到裡面，但必須更加地被檢視。

報告人承正重病，請李仰桓代替報告。（報告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黃默：謝謝。哪一位？你先來好不好？看看有哪位想...

鄭雯如：當我們談全球化，尤其是經濟貿易時，我們似乎很容易用南北關係來看待，但是我看到一些東西，像之前談勞動標準，我們覺得全球化降低了勞動的標準，但後來說要提升勞動標準的反而是先進國家，反對的反而是那些我們一直以為要去幫助、比較落後的（國家）。另一個例子是說，中國要指派一個爭端處理機制裡的大法官，希望讓更多的NGO發表意見，我以為會支持這樣想法的是南方的國家，結果我卻發現反對的反而是南方的國家，因為他們認為勢力龐大的NGOs是北方國家的NGOs，如果以上的制度通過了，反而對他們更不利。再來，每次遇到大陸的同胞，在這波（全球化）裡受益的，大多會說，當然有很多缺點，如環境等，但是想想他們以前連飯都沒得吃，我一直在想的問題，是有（這樣的問題）沒有錯，但難道比沒有飯吃好嗎？在這樣的衝突當中，如作者也問了，我

們好像試圖去提升這些人的權利，反而好像就是這些人自己在反對。不僅是作者提的美國保護主義，其實在教育等方面，很多都是這個樣子的態度，也被人家告，也有被法庭判輸，但我不清楚結果有什麼樣的影響。台灣在這方面也很特別，在高科技方面，我們都與美國合作，去剝削比較慘的國家，在農業上，我們也企圖要給自己的農民多點保障，但政治力沒那麼強，所以我們失敗了。我在想這個關係到底，如果我們想提升弱勢的保障，在那個架構...，有點困擾，不知道...。

黃默：你能回答嗎？還是大家來討論？

潘美玲：針對承正的第一個問題，如果美國的工資水準處於全世界最高，那麼為什麼在棉花業上可以處於宰制（地位）？我們從前三章可以看到一些事情；我先講答案，因為最後美國採取了一個機械化大規模的企業經營，基本上她將勞動力成本的問題解決了，可是在處理勞動力成本的問題之前，美國試過很多方法，一開始是蓄農，第二，佃農制，第三種，**company town**的方式，前面她想了各種方式來確保勞動力，其實美國除了棉花以外，像玉米、大豆等都是機械大規模經營，然後賣到世界，基本上盡力排除了工資的問題。一開始作者問這個問題其實是有趣的，但最後的答案是問題不在工資，其實是機器上。但作者有想去說為什麼這些機器是發明在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我會覺得作者對其他國家的描寫，尤其是中國的內鬥，如「侷限於中國文化的優越感...」，有點（笑）難以讓人搞清楚並說服人他講的是正確的。基本上，有時很多發明是蠻偶然的，比如有需求。另外一個，相較於其他西非、印度或巴基斯坦的棉農，大概可以發現他們耕種的方式是小面積的耕種方式，在這種情況之下，確實會有很多問題。第二個，政府是什麼樣型態的政府？西非得政府是個掠奪式的國家，政府靠這個得利，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棉農，記得去年到印度的時候，報紙一打開就是自殺，自殺的數目是二位數以上，我以為是看錯，但這年下來已經幾百個或幾千個棉農自殺了，政府藉口沒有經費可以補助棉農，這個事情繼續發生。在詳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會想大規模的經營型態，某種程度讓美國，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如棉農自身組成一個利益團體，一個政治上有利的。

其實第一個問題與第三個問題大概是同樣的，就是為什麼她們的成本能夠降到很低。這裡又提到美國偽善的一面，如在推動WTO裡面，美國也是非常...，因為美

國已經萬事具備了，極力說服別人撤銷關稅障礙，要大家公平競爭，可是事實上，公平競爭的背後有太多政策的補貼，讓美國的納稅人來共同承擔的產業，而別的國家並沒有這麼做，所以作者提到的偽善就是這樣的。聽聽看別人的意見。

雷敦蘇：另外一個問題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可是我好多年以前有一個美國朋友是研究棉農，發現在前蘇聯時期，Casbien海旁邊，污染非常嚴重，就是因為用了很多水，現在這個海就逐漸沒有水了，另外一個海也可能受到影響而不見。作者在這裡談到美國的一些棉農的，都沒有提到這類的環保問題，環境是否是一個問題？或是他已經克服了這個問題？你們有沒有研究？因為他們一定用了很多水，現在又用了農藥...

潘美玲：我自己最近看到一個全球暖化的問題，如果要在穿衣上做環保的話，最好是穿二手衣，因為每穿一件新的衣服，在製造棉花的過程裡，貢獻全球暖化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感覺上，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聽起來環保專家的建議是穿二手衣的話，那表示在棉花生產的過程當中，對環境的傷害還沒有去處理或被解決。

雷敦蘇：現在有二手衣的衣服嗎？

潘美玲：其實也有，美國蠻多的，台灣比較少。

蔡竟予：在台灣，如果你去上班族較常去的傳統市場裡其實很多（二手衣），我就蠻常穿一百元的衣服。

李俊達：不是有正牌經銷商的，比如說NIKE跟我們訂了一萬件，我們工廠可能做了一萬一千件，多的一千件我們就自己拿出來偷偷賣。

黃默：好。還有哪位？你們看這個解釋，就是美國棉農的情況，棉花的歷史，大家看是不是已經做了一個詮釋？而且對大家是否有一個幫助？有什麼遲疑的沒有？有沒有什麼問題想提出來問的，有沒有？

蔡竟予：我想討論一下，作者這樣的解釋會不會跟社會科學建立的歷史途徑...，比如幾世紀時工業革命、又法國大革命...等，似乎凸顯了一種意識型態，也就是推崇西方工業的進步？

黃默：沒錯，但問題是我們有什麼其他閱讀的選項呢？作者談到棉花業的發展。雷神父您有什麼看法？

雷敦蘇：我們最近有個教師在我們那裡（輔仁大學）做了一個演講，他提了幾次在農業方面的管制，歐洲是更嚴格，用各種辦法，他說在歐洲，每一頭牛都有兩塊美元（的補貼），農業受到特別的保護，棉花在美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實際上若要促進真的公平貿易，歐美都需要取消這些補助。

李俊達：2005年吵得很凶的就是因為在農業條款上面一直都有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坎昆會議上要求各國都不可以補助自己的農業，普遍是這樣，但美國與歐洲都以獎助為由，仍舊繼續這種不公平的制度。很多小國也沒有辦法與這些國家抗衡，甚至台灣基本上很快就把自己賣掉了，沒有跟這些國家做什麼談判。

黃怡碧：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之前我們也討論過。到底為什麼美國的農業有優勢？經濟學的回答就是補貼，如果把補貼去掉，他們即便受到整個環境的支持，如建設或生產力等，整個單位成本還是會遠高於其他比較貧窮的國家。

黃默：我想Stilitz的書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s** 對這個問題也討論過，也十分強調這個美國政府補貼的論點，這個沒有太多的爭論。只是說要給多少的份量？這裡的討論比較是將減少風險和政治上的運作等面向都帶到裡頭來討論。

雷敦蘇：其他地方的棉農應該也都是非常不穩定、痛苦的，天氣突然改變，就不能去工作了等。假如要所有人都回到沒有機器的兩百年前...

黃默：看來是做不到了...

雷敦蘇：是，但是你要這些機器，整個制度...，有沒有別的地方也能做得像美國一樣，工業這樣發展？

黃怡碧：印度其實本來有機會，因為她的土地規模也很大，我想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說她們沒有一個大學或怎麼樣子的專家或資本家願意投資適合她們的機器，我覺得反而是周邊（社會）的環境沒有給予支援這類的產業發展，而只能用非常辛苦的方式來耕作，是否在印度，氣候的變遷那麼...，而且沒有人去替她們發明那種可以提早，在結霜之前...

雷敦蘇：但是印度不缺大學。

黃默：我想到的另一個例子。很多年前閱讀到中國的茶葉，在十九世紀中葉佔世界市場很高的比例，後給英國趕上了，英國在印度、斯里蘭卡經營茶葉，也做了不少研究。作者沒有說得很多，我在想為什麼中國的茶葉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在十多年之間就物換星移呢？

鄭雯如：我看到的好像也是跟這個一樣的，英國很有效率地發展了一套機械化的生產制度，不需要這麼多的人工，而中國仍舊維持傳統的人力，就無法大量的生產。

潘美玲：您剛才說的那個印度的棉花，我覺得印度人力太便宜，便宜到都寧可使用人力而不要用什麼機器。印度另外一個問題在於電力、原料的供應不足，一般科技需要的基礎建設都不足、動力供應落後，使得對機械的維護成本相較於其他地方更高。所以我觀察到許多可以用機器做的，她們寧可使用人力。

黃怡碧：忘記是在哪一章作者提到英國本來其實是和印度進口大量的，尤其是染了色的顏料，而在後來爲了保住本地的羊毛工人的工作，限制從印度進口的數量，由於政治的力量介入，使得印度又失去了一次機會，...

黃嵩立：

這裡規定的好像很好玩；（英國）規定公務員必須穿羊毛內衣，而不能穿棉織品內衣來保障市場。

可不可以問一下潘老師，您一開始提到作者引用Polanyi的理論可能有點失真，從剛剛講的這段歷史當中，美國棉花一開始使用奴隸，然後有不同的制度，有沒有辦法用Polanyi來解釋，那又是怎麼樣的呢？

潘美玲：前面第一個部分我比較沒有看到作者怎麼樣去使用Polanyi的東西，Polanyi其實有講一個事情，他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市場的發展，我們現在會覺得市場的力量是獨立於政治經濟之外運作的一個力量，但Polanyi認為市場一直都是在政治社會下運作，市場不能脫離政治的脈絡，也無法事外於政治的影響，這是Polanyi的一個說法。所以若要我去看作者對Polanyi的詮釋，第一個，市場與政治社會運作之間的關係如何？Double Movement如果是要要求政府保護，可不可以算是一種相對於市場競爭的力量？我不知道，我覺得這個部分作者是把市場放在政治與社會的制度下面，一起來談。可是，我對這本書比較疑惑的地方是，作者對市場的定義似乎不同，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市場一詞有時指的是勞動力市場，有時又是指自由市場的運作，可是作者都只用market，比如說，講勞動力的時候他就說這是迴避市場的力量，可是那其實是在講說迴避勞動力市場的競爭，這是很具體的；但是後面作者又講市場力量其實是自由市場的原則...，所以我覺得在這裡作者對市場有不同的定義，但他沒有講清楚，所以我也無法給您一個明確的回應，但是我覺得他也是在用Polanyi這套東西再談這件事情。

再者，讀Polanyi的時候我們會比較去爭論一件事情，沒有所謂自由市場（free market）這回事，真正的自由市場應該由國家來保障建立的，除非國家建構出一個，如保障私有財產、公平貿易等，這樣的一個體制建立了之後，沒有自有市場，要政府建構出來才行，如保障私產左右裡面的人才可以去玩自由市場的遊戲（game），不然的話，如果這些東西沒有在一開始建構出來，自由市場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從這樣的一個論點來看，根本沒有自由市場，自由市場的背後其實就是要靠一種不是自由的力量去保障的。在第一章棉花的部分，我沒有辦法回答。

黃默：Dorothy您讀了好些自由市場的書與論文，妳也要寫這方面的論文，妳有什麼建議或看法？

白湘銀 (Dorothy)：我想到一個問題，政治干涉或人為干涉算不算這個社會反動、對抗的力量的一種形式？因為您提到自由運作之下，會產生一些干涉的動作，那如果干涉是一種反動力量，就變成了一種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算嗎？

潘美玲：我想這個必須要回到社會脈絡去看，Polanyi講的是在那個時代裡的運作原則，那我們就要回到那個社會裡面來看是否是這個樣子。這邊講所謂社會的防衛機制被定義為，原來存在的社會關係、社會運作的形式不是只為商業的目的，比如說經濟有很多的目的，我們有很多社會的整合的、人與人之間的部分，不是完全放在商場上的那些，若我們覺得那些東西遭受市場力量的侵害，我們就會組織工會來做一些基本的保護，舉例來說。是否所有的政策都可被當作自我保護的措施？我不敢講。

黃默：我想美國政府對棉農的保護應該不算保護。又潘美玲老師說自由市場的先決條件，我想現在已經是普遍的認識，應該沒有太多爭論？

我覺得這個迷思在當前已經討論非常多了。

鄭雯如：我覺得這個迷思好像不是在政治。我看了一些經濟學家寫的書，不管是哪種類型的表達，最後都認為市場的力量若能免於干擾應該可以運作得很好的，而大多數的政治涉入則多是一種不好的干擾。好像經濟學家真的都很相信這些。

潘美玲：從每日的報紙新聞的修辭來看：政府鬆綁等用法、去管制等，都是先預設政策是種干擾，因為政府有太多的管制，沒有辦法讓市場的力量出來，我覺得在這裡我們很有共識，但其實會發現在一般的論述裡，我說的還是主流的論述，也好像變成日常生活當中理所當然的語言，政府管得太多，背後就是（市場）要求（更多的）自由。

黃怡碧：我讀到的經濟學好像是連自由古典經濟學都會承認，即便是沒有任何的

干預，市場失靈的情況還是存在的，比方有些企業自然而然地形成獨佔，所以我想政府可能還是需要去介入。

我想比方說外部性是當初買賣雙方沒有預期到的，偶然的，這時就會產生一種外部性，並非任何人刻意去造成的。我不知道，因為我正好現在在修（讀）這個，好像就變得是談到了總體與個體經濟學之間的重疊。不知道老師在讀經濟學的時候是怎樣理解的？好像這時候市場失靈時，政府的角色就會去出現？

鄭雯如：我想那種政府的角色好像也不是那麼積極的，只是對市場失靈的微調，但不要過份的干預，是那個意思嗎？

黃怡碧：但其實經濟學在強調的就是不要去產生那種外部性損失，但如果政府的干預，就產生了外部性損失，但如果不是政府的干預就產生了損失，可能還是希望能夠用政府或其他怎樣的力量把損失降到最低。

黃默：Dorothy您想不想談一下當前對公平貿易(fair trade)與自由貿易(free trade)的爭議、概念的變遷？

白湘銀：我想要先釐清自由貿易到底是因為有缺失才需要補足？還是自由貿易有沒有做好本來應做的？若是前者，因而出現公平貿易來補充它，那就沒問題（OK）；若是後者，自由貿易沒有發揮功效，然後公平貿易去介入，感覺起來就很怪。

黃怡碧：好像Stiglitz認定現在不是自由貿易，而只是在貿易自由化的階段。

黃默：我想問題就是有沒有自由貿易這樣的一個東西（animal），有這樣的東西嗎？我想這個談話跟什麼有些相似，比如說，竟予看看您怎麼反應？還有好些學者說共產主義在現實、實踐上是失敗的，但這並不表示共產主義失敗了，或共產主義沒有發會它的作用及功能。您這樣談自由貿易就有點近，但假如我說從來就沒有看到自由貿易，那你會怎麼說？

李俊達：可能一個層次上我們去談自由貿易在某種程度上是很學理的，但在實際作用的脈絡上經常並非如此，而是從理論上用來當作遊說的理由而已。對我來說，這都只是策略上的、是用來運作的機制，而它所服務的相對於整個社會的大多數，僅是資本家的工具。因應這樣的機制去談公平貿易，讓我覺得好像是個對應。但我覺得公平貿易某種程度在談的意義只是單純指我們去幫助第三世界農業的小合作社形式？或是...，我想公平貿易的意涵還是有點模糊，我不明白這裡討論的重疊是什麼？或層次在哪裡？

白湘銀：我解釋一點公平貿易，原本像你（李俊達）講的那種社會運動，去建立共識的一種過程，有透過一些NGO去執行這項共識，如透過認證商品、公平貿易標籤。

李俊達：不過很明顯的，公平貿易並非去回應自由貿易運作的機制，而只是在這套貿易運作的機制裡，通過用認證的方式購買第三世界的產品，卻沒有看到批判整個以自由經濟做為市場運作的部分，包括運作生產的過程當中，而只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選擇性的購買，就像消費者可以不買動物實驗的產品。

黃嵩立：剛剛這樣談論公平貿易，似乎沒有談到一個公平貿易的全貌。公平貿易，至少以Stiglitz的觀點而言，並不是NGOs去採購一些少一些生產剝削的東西，而是在回應幾個基本問題：譬如補貼的議題，就原則上破壞了公平的貿易，所以要去做公平貿易，基本上需要去改變補貼的結構，這個是很難的；又譬如整個貿易規則制訂的民主化，因為現在的WTO是根據過去GATT的架構而來，當初參與的都是工業國家，所以對於農業與工業產品的標準是不同的，或在WTO的談判過程當中，誰掌握了國際論壇上的議題，這些東西都可以讓貿易比現在更公平，所以剛剛如果潘老師講的那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套規則的話，自由貿易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國際之間並沒有這套規則，所以現在自由貿易基本是不存在的，現在談公平貿易，正是要去回應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來談公平貿易是想要用這個制度上去回應那個問題，而不是用那種良心採購的方式在做。

黃默：我想我們的時間看來不夠，今天在這裡結束。

(四) 2007/12/07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1 Ch2 Ch3

報告人：何嵩婷

黃默：今日還是維持在九點鐘結束，但假如有很多問題想談的話，當然也非常好，並不做硬性的規定。我們今天報告的是嵩婷，因為上次T恤這本書只報告了一半，另外一半還沒講完，所以我們先請嵩婷報告T恤的故事，然後再來是Stiglitz的Gloablization and Its Content，到那個時候有三個人，我先做簡單的介紹，再來是劉恒君、李俊達，我們現在就開始了，好不好？

何嵩婷：我這邊要說的部分就是T恤從美國運送到中國之後，是經過一個怎麼樣的過程，才會被貼上中國製的標籤。作者認為有許多農村裡面的人，爲了脫離原本比較貧困的生活，而投入血汗工廠裡工作，他們在血汗工廠中的薪資都是很低廉的，但除此之外，這些人也得到那些待在農村裡面的人所沒有的，如自主的能力或開闊的視野等。...（詳情請參考報告綱要）

討論內容

黃默：謝謝嵩婷。我們現在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是要請她澄清的？然後看有什麼問題，包括她所提出的一些比較大的問題，有什麼想法？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看法，我想我們就在這個時候提出來討論。如果是跟我們待會兒討論的議題有關，我當然就會建議暫時放一下，等到我們報告Stiglitz的書，再來討論那些問題。哪位先開始？謝謝大家。

蔡竟予：我問一些台商的經驗，他們質疑我們所說的血汗工廠的存在，尤其是一些台灣頂尖的企業，通常認為他們對台灣的外匯存底十分有貢獻，因而造福許多台灣人，對於學者們所控訴的血汗工廠，在這些企業眼中，是沒有數據也沒有實際證據的，並且認為在工廠中的情況還好。

何嵩婷：您說他們指的還好是什麼？

蔡竟予：他們（企業）不覺得有不好的勞動條件，也認為這樣帶來了中國的經濟

發展，也否認對環境或全球上造使了不公平的競爭，因為實際上，反而覺得對員工的待遇頗好，在中國有許多人迫不及待的想生存下去，或我們剛提到外勞的問題，（外勞）本身也認為，到那裡投資的商人也是如此。像我去問他們有關血汗工廠的事，管理階層認為企業本來就是如此，他自己當一個總經理，可是如果業績沒有達到，董事長也是會拿皮鞋丟他，雖然他年薪千萬，所以他反問我對血汗工廠的認知是什麼。

何嵩婷：可是我覺得妳問那些管理階層人員，可是血汗工廠的問題，應該是要問勞工，因為是勞工被剝削，而不是管理階級被剝削。因為他們都想要賺錢，當然會不擇手段的去賺更多的錢，才會不管勞工的生活環境如何。

蔡竟予：對，就是我问那些管理階級，他們就否認，工廠都是競爭的。但重點是他認為我是沒有證據在亂講的。

鄭雯如：我覺得那個狀況現在可能是好一點，看現在的大陸，當然不一定是他的公司，但有這樣的狀況。現在的情況比較好，也是因為之前有很多家被披露，使得大家比較注意，以免形象受損。

那您說的證據，大陸有人在研究這類的數據，也有人潛到工廠裡面去拍，一旦被暴露出來，工廠自然就會去改善，所以我覺得這個（血汗工廠）情況是有的，但可能未必是他們那一家。

我覺得作者這樣談，好像是從一個歷史發展的角度去說，這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似乎（國家）都需要經歷這樣一個階段，才能進展到下一個階段，我不確定這樣的邏輯是否是必然的？如果是的話，我們又要怎樣去看待這樣一件事？我感到書中暗示這樣一個必然的過程，最後這些人才會進步到另一個經濟體，這些工廠又會轉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我想這類的事情是否就是這樣？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會是怎麼樣？像我們去柬埔寨玩的時候，其實就是去最窮、最多人力的國家玩，那之後可能會富起來...，可是從農村的父權進入到市場的父權，就會比較好一點嗎？我不曉得，他自己預設的邏輯本身與看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的想法又是什麼？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

黃獸：嵩婷，妳怎麼回答？妳得到的印象是不是這個作者有這樣的一個邏輯在他的思考當中，好像這個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是一個不能不避免的道路？

何嵩婷：我覺得作者就像雯如講的，他把血汗工廠當作是一個必要的惡之類，爲了帶動那個地區的繁榮，讓農村女性心甘情願進入那裡，我也覺得很奇怪，事情真的是這樣嗎？同雯如所言，在我們一同到東普寨旅遊時也觀察到當地人民上班的情況，一台卡車站滿了人潮，許多人還站在卡車的後面，每個人前胸貼後背，是超載的情況，那些卡車上的人又大部分是女性，似乎就是要到工廠去工作的，我覺得連交通工具都是如此，那麼工廠的環境應該是更糟糕的。我不知道血汗工廠是否像作者所言，是一個必要的惡？而且作者還認爲會出反對的勢力，可是反對勢力帶來的改變真有這麼大嗎？我也是很懷疑這點。

承正：我有點覺得血汗工廠這個名詞好像加上很多道德的立場，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有好幾個標準，第一，血汗工廠是否是一個道德的？因爲工廠的成立若不是將人力抓來工作，可能就沒有什麼道德問題，因爲這是市場的選擇，工人是自己願意進來被剝削的。另外一個，作者提到血汗工廠好像讓都市化或被解放，看起來這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要解放與都市化不見得需要透過血汗工廠。我覺得血汗工廠背後的重要資本主義價值在於自我剝削，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的科學園區人員，它們是血汗工廠嗎？但他們過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也是很血汗，只是不同的付出而已，所以我覺得如果依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而言，會有一定的歷程，但我不覺得血汗工廠是必要存在的。想要問嵩婷的問題是，書的第一到第三章提到很多美國棉農成爲宰制世界棉花產業兩百年的原因，有很多政府的政策把不同時期的勞工綁在農場主人的手下，在看到中國的時候，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同，書中說了1950年代中國的戶口制度，可是之前呢？爲什麼他們沒有反抗？我們看美國的時候，除了制度綁住之外，甚至農場主人會給這些黑奴、佃農或墨西哥勞工也好，提供他們一些福利。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況是怎樣？制度的誘因或歷史文化的背景，很有趣的是爲什麼中國沒有起來反抗？什麼力量壓制住他們？我最近讀萬曆十五年，提到一些中國用道德治國的結果，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閱讀的時候我也好奇是否有這樣一個文化的部分，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下的價值的差別，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做比較多的瞭解。

黃默：嵩婷，你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何嵩婷：我看這幾章下來，作者好像也沒有特別說後來會到中國身上，作者只說中國人比較多，人力成本低，中國在封閉許久之後又對外開放，世界看到這塊大餅，進而將魔爪伸到中國，其他也沒講很清楚。

黃默：俊達，看來你想發言？

李俊達：因為人力便宜。好奇的是，中國到底有沒有真的發生？可能有，但是我們看不到，消息被封鎖了。一部份，看到其他國家對待的例子，記得清朝的置外法區，這個地方不受本國法律管制，東南亞許多國家也是有這樣一個區域，如加工出口區，軍警在區外管制，工廠在這個區裡面，都是外國的包商，用很低賤的工資與糟糕的勞動條件，其實基本上是政府特許的，若有什麼要求改善，包商就會威脅要撤廠。

黃默：還有哪一位？

承正：我問的沒有反抗不是指現代，現代其實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也透過了其他管道知道有反抗，我比較好奇的是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政府對棉農的幫助是爲了拉近南北的經濟差距，傳統中國價值偏重士農工商的倫理，是否有一個制度面上的限制？可否找到一個如美國一般較爲整體性的解釋？因爲美國看來較清楚，可能因爲這本書主題上帶來的限制，但我想問中國是否有一個制度文化上的限制，對棉農也產生了一些環境條件上的限制？

黃默：你說的棉農是在中國嗎？什麼時候，有多少中國的棉農？我讀這篇文章，有沒有給一些數字，譬如在英國十九世紀有多少紡織業的工人或美國等等的數字？

鄭雯如：前面幾章好像有稍微提一下，不過好像只有美國與英國，中國就沒提那麼多了。

承正：前面其實也沒有提那麼多，他只是提產業M，比方佔世界市場的比例，棉農的數字則是概略的，比方中國就是非常契約式的，都是小規模的，美國就是大規模的，大概只有這樣比較粗淺的提到，我好奇的是制度面上，比較美國成功的原因，反而是勞動成本比較高的國家輸出到其他國家去，然後又再回到美國，我在想是否背後有一個比較制度上的因素，因為美國這裡談的比較清楚，但是中國或其他國家K，我們就沒辦法從這裡看得比較清楚。

黃默：我本來就想要在談到制度面的情況，待會Stiglitz的幾本書會談的不少，不論是國內或國際社會的，所以有些問題我們也可以到那個時候再談。但是你提到中國歷代對棉農有什麼制度性的，我本能的想法是沒有，中國歷朝歷代對農民開始的時候，就是西方達到一個比較平均的土地的分配，但過一些時候就有兼併的情況出現，然後就造反，又來一個新的，我們想到的如黃安石變法，所以我想沒有一個你說的制度性，對棉農、果農或其他人的...，雷神父你有什麼中國農業政策歷代的背景沒有？

承正：我想既然是討論棉花業進入世界市場，所以我想如果是討論中國，應該集中在對清代時候，因為作者提到清代棉花佔有小部分世界比例。老師剛才講得沒有錯，中國對農民的政策許多時候是要馴服他們成為良民，基本的照顧，卻沒有非常完善制度面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玩的，美國是這樣的，中國又是另外一個的，難道中國農民都是良民或順民嗎？都不會反抗嗎？美國可能不是因為他們的人，而是因為他們被制度面綁住了，沒有辦法作有效的抵抗，那中國是不是也是這樣的情況？還是不一樣？所以我好奇的是這個。

黃默：但中國的農民反抗難道不就是中國歷代的農民革命嗎？還是農民造反嗎？然後再出現另一個朝代？這個新的朝代看來也沒有什麼改變，在很多時候，對最最基本的觀念和制度的面向，看來是比較少改革的，到了共產黨不論是農民改革還是合作社的運動，到最後的人民工社，這當然算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的一個企圖，所以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有什麼補充的？

陳宏銘：剛剛聽嵩婷報告，很有意思的主題。讓我直接聯想到的是比較結構性的

因素，到血汗工廠工作的這些人看似自由、自主，可是卻可能是在生產結構、社會結構限制下做的有限的選擇，又想到過去看到所謂國際體系低度發展的發展，這是比較國際體系分析的層次，那用在國家內部的個人，對血汗工廠內的內部層次是否也有意含？也許不見得要是必要之惡，也許是否隱含這樣血汗工廠的存在，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裡，對他們來講尤其是對這些付出勞力的人而言是一個依賴的發展，我也不清楚是否不得不然，但是有這樣的一個聯想。

鄭雯如：打個岔好嗎？我剛才在想說清代的時候，美國有很具體的（理由說明），中國那個時候，因為已經發生了八國聯軍，所以可能沒有時間管這個，當初沒有強過美國，現在唯一的利基是便宜的人力，我看到在國際談這件事情的時候，企圖改善勞動環境的問題，其實他們（中國）也有反對，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自己的優勢。我父親很早就赴中國大陸經商，也是認為中國就是人多，因為生計的緣故，只要有工作，隔天幾萬個人就來爭取一兩個的工作機會，只要能吃飽就好，也不顧工作條件等問題，我不清楚是否這是一個必然的情形，或是因為我們攻擊這樣一個情況，也不過是因為我們已經吃飽了。

又市場體系發展的依賴關係，是否又是一個必然？像中國的發展策略，就是先使一部份的人富起來，再有接下來的發展，在上海的有錢人再去做金援之類的事，我的意思是說這是否無法改變？或要改變的話，國際體系當中（這些國家）又自己反對改善。

剛剛竟予的問題很有趣，我覺得妳不應該問他（台商經理）有沒有血汗工廠這件事，就好比在政治學當中去問是否贊成反貪污，沒有人會反對，所以妳應該去問工人工作的時間，一天有多少小時，或薪資等問題，然後妳就可以看出那個狀況，再對比當地的情形（可能可以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因為妳問的問題都已經（存在著預設的價值）。

承正：其實他前面三章不斷提的是說制度環境，我想這些是否可以提供人才去冒險與創新技術，然後這個技術就改革整個棉花產業？作者提到美國發明軋棉機，因為得到資本家的協助，可以放手一搏，作者又提到當時在世界佔整個棉花產量的國家，如印度或中國，書中的解釋是，這樣子的一個人才到這些地方去是否有一個制度可以願意提供資本，讓他們去冒險，這樣一個技術的突破，或所位知識

經濟的突破是否可能在這些國家中發生？

黃默：第一，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自願選擇這些工作，但是進一步去討論，他們其實沒有什麼選擇，或這是他們當時最好的選擇，所以，假若一個人情願被剝削，如承正剛才所言，是否就沒有道德的問題？我是有些遲疑的，我們可以想像一群人或一個階級情願被剝削，但還是有一個道德問題的存在，我想這個問題就是，血汗工廠有沒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我們可以想到，假如一個人他得不到溫飽，他的工資是不能讓他或他的家人活下去的，這樣就比較容易說這是一個血汗工廠，這是一個剝削。

最近NIKE在亞洲受到非常多批評，我看到許多來自美國的電視訪問，訪問一些在越南的女工，這些女工抱怨辛勤的工作，薪資卻不足買下一雙NIKE的鞋子，這個當然比那些工作但連吃都吃不飽，又不大一樣，所以我們是否可以去想像一些比較客觀的標準？我又想到早先讀過Amartya Sen談飢餓的書，或多或少，我們可以說出一些標準，如一天人所需的熱量，這個我們都已經瞭解，所以也不是說我們還需要去問資本家，女工等。

是否為一個必要之惡，我想不是的。但是，從歷史來看是有這樣的情況，從英國開始，紡織工廠就是資本市場最先跨出去的場所，那在中國也是這樣，談到上海的這些，那些工廠也都是共產主義最有發展的地方，這個一點都沒錯，還有另外一個行業，最早共產黨有影響力量的，在中國或歐洲都是這樣，我們等下請教雷神父，是報館裡頭的排版工人，因為他們算是比較有知識的，馬克斯最早發起共產黨，有好些這樣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大老陳雲是商務印書館的排版工人出身的，所以看來，我想紡織工廠，讀到20或30年代的小說，不少描述紡織工廠與共產黨革命的關係，但是是否必要這樣走，我個人不竟然這樣想，這牽涉到政府政策，還有國際的大環境，還有很多，但在歷史上看來，好些國家都是這樣走的，我先說到這裡。

吳景義：血汗工廠看來是在一個大環境下自然產生的，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下來求取利益，追逐最少的成本，壓低人力或原料成本自然可獲得最大利益，如果在一個原料豐富、人力多的地方自然有這樣的工廠產生，我覺得血汗工廠不是一個絕對的定義，而是一個相對性的，與其他人的勞動條件相比較的結果，可能就會被

認為是血汗工廠，因為全球化移動要來獲取最大利益，如果整體環境無法滿足他（資本家），便會移往更能獲取利益的地方，如法規制度對於勞動條件較不保障或（當地）文化傳統能提供服從性較高的勞動力時，書中提到美國由北往南移的原因是法規與文化對公司跟童工的規定較不嚴格，我想信這樣的情形在血汗工廠的移動之下，也是這樣的，當勞動條件與法規規定的不完全的時候，血汗工廠就比較容易出現。不見得有什麼標準的定義來說明血汗工廠，因為對於每個人來說情況都不同，有些人辛勤工作，卻無法養活一家人。

黃默：我剛才的說法實在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可能性是有比較客觀的標準，但是我又有一個問題，你（吳景義）也說了法規與政治上的保障，政治與血汗工廠、經濟的剝削是密切相關的，這些血汗工廠在中國，若是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意，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台灣或越南亦然。但是你說有些工人是在歷代文化上比較服從的，我是比較懷疑的。

吳景義：我認為從中西方的比較上來看，東方民族較為去順從一個體制，西方比較會去爭取他們的權益，我想這是他們發展出來社會文化上的特點，因此西方較早出現，而權益的爭取應該是大家都追求的，因此後來東方也跟進。

蔡竟予：我想到之前關心RCA的議題，當初這是一個蔣經國頒獎的一個績優外商公司，這是否是個血汗工廠？工人們說他們每天有高級的公車接送上下班，能進入這樣的公司基本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我想當下我們恐怕無法辨認，但後來出現癌症的問題，是幾十年後的事情，也不是一下能看得到的。

吳景義：如何證明血汗工廠？我認為就是勞動力的壓榨，可能造成容易有傷亡的事件，如果由一個地方的工殤事件或疾病發生率、或壽命降低的速率，比較能呈現血汗工廠存在的事實。

黃默：RCA的議題我們通常不稱做血汗工廠，血汗工廠是比較傳統的用語，工業化以來。RCA比較是當前認為公害或環境傷害的議題，也是比較新的，一般人比較不會稱RCA是血汗工廠。

蔡竟予：我剛才的意思是現在類似RCA在中國的這種血汗工廠，現在看來還不錯，因為書裡說這樣的工廠讓經濟繁榮，RCA可以作為一個反證，只是說當下看不出來。

李俊達：RCA那時候還沒有做到晶圓，只是做代工。血汗工廠應該指的是勞力密集的產業，直接在很差的勞動條件底下，RCA會被放入這個議題，是因為後來產生了一個工作傷害，而且是由廠商惡意造成，而與血汗工廠強調的高工時、低薪資，直接在勞動現場剝削的情形不同。RCA是做代工的，所以也有女工。

我覺得雖然無法很絕對，但是至少是很直接的在勞動場所中，人無法好好生活，雖然無法是數據上的絕對，但至少是相對可以衡量出來的標準。

在必要之惡的地方可能是為了競爭，以這樣的理由來合理化血汗工廠，應該比較巨觀的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來反省這類事情的發生。不過，在道德責任的面向，好像還是無法從這裡證成，至少對人基本要求面向。然而這樣的情況又要如何去跳脫呢？如果必須依賴加工出口才能有競爭，那其他發展方案的不同可能又是些什麼？其他國家有沒有可能？這可能與政治或法律相關。

劉恒君：我後來回去看序言，作者其實沒有說什麼必然，這本書的源由作者自述是來自一位女學生對他不瞭解血汗工廠的批評，作者當初的想法是出版一本經濟學的書來解釋這個問題，所以本來作者的企圖應該是想從自由貿易的面向來看這個必然發生的結果，但作者說在他做完研究之後，他發現他錯了，他認為這必非市場的因素，這些血汗工廠的存在其實是規避了市場競爭的機制，他說，即便是經濟學家，也不會任由市場發生作用，因為市場力量的強大是無法控制的，以致於最好的經濟學家都不會任由市場決定，血汗工廠是一種市場失靈的現象，所以他才說他不得不去談論政治，又可能是歷史，如軋棉機的產生。雖然一直強調競爭力需要壓低勞動成本，但是我想作者並沒有要說這是必然的。

黃默：非常謝謝。我想好些問題放在制度面來看，等下的報告立刻會反應出來。我還是有些遲疑哪裡有一群工人一定是天生比較順從的？我對你（吳景義）東方與西方的講法，也是很遲疑的。中國人歷代都在造反。

吳景義：對，那爲什麼中國會造反卻沒有推翻君主的制度？那爲什麼西方那麼不會造反，卻推翻的君主制度？

黃默：西方人也會造反，所有民族都會造反。

吳景義：那還是沒有辦法解釋一個民主制度的產生的源頭。

李俊達：我覺得這樣的談東方與西方的問題之一在於，將東方與西方各自看做一個整體，忽略了各個國家的脈絡，因爲不可能制度與環境或歷史等條件都不談，就算是西方，許多地方也是到了當代才有民主，去化約出東方與西方的界線，我想是太粗糙了。

黃默：Amartya Sen在他自己談自由與發展的書中，對這個問題有好幾個專章，是可以參考的。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蔡竟予：我回應這個問題，因爲之前他（吳景義）做了好幾個文章跟參與的計畫，比較很多國家勞動條件的傷害，全世界只有日本的基模夠大，也就是過勞死的員工超過了幾十萬，所以這可以算出大概工作幾小時，當作世界醫療核可的標準，或者，現在強調的（因職業傷害）已造成的殘障情況，保險需要補助多少年限的生活，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文化差異，有的國家的條件，如日本與韓國，長期的勞動條件差，雖然不是在初級產業，所以顯示出的醫療數據很齊全，但其他國家，包括台灣在內，爲什麼台灣沒有成立過職業災害，因爲大家都不知道那個叫做職業病。我的意思是這裡有教育的因素，有人買NIKE的鞋子，是因爲Michale Jordan，因爲廣告告訴了消費者Jordan的背景故事，引發美國黑人對美國夢的同想，台灣或韓國的學生，也是如此的心態。

黃默：我沒有說文化與這個沒有關係，我只是說我很難想像有一群人天生就是比較服從的，我並沒有說文化與疾病或勞工條件沒有關係。

吳景義：我想老師可能誤解了我的意思，基本上沒有天生這件事，這是一個大環

境底下所產生的。

鄭雯如：我想那應該是制度與文化的交互過程，很多中國大陸人若是出門去遊行，不會被逮捕的話，我相信就會有人站出來，但是，因為會，所以人就無法站出來。這牽涉到制度與教育的方式，西方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偶然地走到了一條比較（自由）的路，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我覺得不單就是文化造就這件事，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是阿拉伯國家，也不需討論這樣的話題，因為坐著就有黑油冒出來。文化一定是有影響的，但是制度怎麼走也是關鍵？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一昧地去譴責商人，商人本來就是要賺錢，像學長所提的，徐斯儉在做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就說九〇年代私有化，為什麼走道今日這樣，那是因為官商勾結，而本來的立意是好的，這是一定要被譴責的，你看那些村的幹部把窮人都壓榨光了，窮人為什麼不出來？因為他們在那樣的制度裡，無可奈何。

黃默：被關被殺，是每天都發生的事情，在中國或是俄國也是一樣。

黃默：還有什麼對這本書的問題沒有？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陳宏銘：可以去看電影血鑽石。

黃默：我想T恤的故事，如果我們來談咖啡或鑽石，或多或少是異曲同工，但我不敢肯定。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到這裡結束。

(五) 2007/12/2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4 Ch5 Ch9

導讀人：黃 默

報告人：劉恒君、李俊達、蔡竟予

黃默：今天要談的是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這是Joseph Stiglitz的書。我的工作就是做最簡單的介紹，然後恒君要來談亞洲金融風暴，再者俊達談俄國的經濟改革或經改帶來的失敗。我的討論是非常簡單的，先給大家勾勒出一個背景資料。Stiglitz現在哥倫比亞，早年是研究數學經濟的，關心的是information theory，用這個來討論經濟發展，討論有關經濟的問題。他在1993年離開了學術界，擔任柯林頓政府下的經濟顧問，1997年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副主席，共三年，到2001年離開回到學術界，他說他很幸運，在2003年時正好是蘇聯解體，俄國要從共產黨的計畫經濟體系轉變為一個市場經濟，這就是俊達要報告的。1997年是亞洲金融風暴，亞洲好些國家都受到嚴重的打擊，有的表現比較好，還穩定些，有些就受到很大的傷害，所以他說他就在這個時候瞭解不少的問題，觀察到不少情況，在一個程度也是學以致用，把早年的研究帶到工作上。在我的印象當中，他對全球化與發展的批判是一步步在提升，他的講法就是全球化應該給這些貧窮的國家極其貧窮階級的人們帶來好處，但是看來並不是這樣的，他把全球化的錯誤歸咎於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幾年來他寫了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然後又寫了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s，前者是2002出版的，後者是2006，同年他又與一個作者合寫了Fair Trade for All，所以你可以看到全球化與世界貿易的批判是逐漸地提升，對弱勢族群與國家是有比較多的同情。在這本書的前言一兩句話談到，他也批評好多學者若是參加政府的政策，為了奉承政治人物，就改變了他們的初衷，又說好些學者也不斷地呼籲政治人物應該多讀幾本書，稍微有些知識背景，但作者也觀察到這好像也很難，這當然是一個柏拉圖談的老問題。

作者將自己的論點看做是漸進的，尤其對蘇聯的危機，他強調制度（institution）的作用，強調法律的架構（legal framework）和法治(rules of law)和民主（democracy），即決定應該是比較民主開放的，尤其是那些受到影響的人，比如說落後國家還有在國內的那些弱勢族群，都應該盡可能的參與決策與討論，所

以作者是逐漸往這個路在。我們有沒有讀過Ronal Dworkin，我們已經讀過了Amartya Sen，所以我就想說在一個程度可以做一個比較，Amartya Sen 在Hunger and Public Action裡面我們讀過的，就非常強調政府發揮的作用，當然他並不是什麼都要政府來做，但比如說飢餓這件事，政府應該有責任來處理，在他談Development as Freedom，也是一個比較中間，強調制度的作用，認為自由不但是發展的構成部分，同時自由也是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假若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也無從談起，這個自由當然牽涉了很多最爲基本的權利，他最後也強調民主的制度，剛剛我們也提到了，如俊達所言，他也不同意東西方的劃分，這裡頭也牽涉許多，我們也不能說東方是那麼威權的，或說西方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自由的，他也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在書裡有很多這樣的討論。但是一個漸進地提出背景的制度，我想他與Joseph Stiglitz是非常相似的。那另外一個人是Dworkin，尤其是他最近的一部書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我在上次也提到，也非常強調背景的制度，他稱之爲Political Arrangement，也就是說不論我們討論經濟的政策或稅的政策，我們都不能忽略這背景上的政治安排，這也和Stiglitz非常相近的，所以在一個程度上，把這三個人做一個比較。

另外一個可以做比較的是，他們這三個人都很願意提出他們的建議，就是說怎麼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s，在trade arrangement應該如何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應該是怎麼樣的政策？哪些政策是錯的，應該改？比如談到南非或非洲的愛滋病，這些藥廠應該怎麼樣？政府又該如何？他們都很願意提出具體政策的建言，在一個程度，這三個人一樣，所以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作者批評最多的是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與IMF的意識型態，他認為這個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政策，在很多時候犯了錯，就是說不願意面對現實，不願面對亞洲或俄國的情況是有什麼不同，他一再提到，我也不能說很多，比如在這本書的第20頁，他提到說華盛頓共識在很多時候就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是傷害了很多數的人，在很多時候，這個華盛頓共識指的就是IMF或美國財政部（United State Treasure）的政策，這個政策看來不是什麼陰謀詭計，最早是應付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而來的，他們提出的就是要私有化（privatization），要自由化及開放市場，就是要求貨幣的穩定，基本上就是這幾個大原則，但這幾個大原則若不去關照到當地的情況，而強加於亞洲或前蘇聯，就帶出了很多毛病，在很多社會就引起了暴動（riot），所以現在也有一個字，就叫做IMF Riot，說這些

政府受到IMF的壓力，IMF的貸款條件就是要政府減稅、減少社會福利、提高米或麵包的價錢，立刻就會引起暴動，表示出這些政策是立即發生影響的，簡單的說，這包括了第73頁提到，還有許多其他地方也談到，也就是自由市場意識型態（Free Market Ideology），這個華盛頓共識在一個程度也可以說是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所以上次我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要大家思考自由市場是什麼？是不是一個錯覺（illusion）？是不是從來也不可能有這麼完美的自由市場的條件，看來從未達成；還是用另外一句話來說，自由市場是少不了背景制度，也就是法律的制度、一個比較健全的銀行制度與比較穩定政府。所以他的說法基本上是，華盛頓共識是在一個過份簡單化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對於是處在一個競爭平衡的模型上面的說法，作者是很遲疑的。在當今的華盛頓共識下，政府是不需要做什麼的，一般也被稱為新自由學派的（Neo Liberal），在他看來，這也可以稱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alism），一個程度是我們談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這些內容就是我剛才講的私有化、自由化等這些。而且在很多時候IMF和華盛頓共識，在第76頁，是不去瞭解實在經濟發展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社會整體改變的議題（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所以作者對華盛頓共識有很多批評，很強調制度、法律及民主的政治。

當然，IMF這些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所以這幾年來他也一再地遭到IMF的攻擊，他也公開說這幾本書是希望引起一個比較開放與深入的辯論，討論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所以在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s中，開宗明義地說，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就是我剛才講的，看來我會想說一個經濟發展一定要走哪一個道路，我不怎麼這麼想。我一方面沒有什麼背景，另一方面，不論是全球化或發展，都是一個非常龐雜、雜亂的過程，很不容易要用最簡單的理論來解釋。他的一些批評都用在IMF和華盛頓共識如何用在亞洲的金融風暴、如何來主導俄國的經濟改革。

劉恒君（詳情請參見報告綱要）

劉恒君：我可不可以問一下，我在讀書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疑問，書中提了很多的例子，一開始我原本和俊達說例子蠻重要的，也就是整個過程的操作，可以讓我們瞭解一下經濟到底在座什麼，但是，我也發現他有太多的例子，有大有小，我想問我們到底需要哪些東西？

黃默：這當然是妳的選擇啊！

鄭雯如：可是應該是IMF的主要幾項，提高利率及減縮什麼，然後他談後面導致的結果及各種不同地區的類型...

劉恒君：我想不知道是否是觀念都已經在前面的章節當中談得非常清楚了，我覺得我這個地方會變得他簡單的講觀念，然後例子真的是超多了，而我所能理解的也就是一兩個觀念，但我的例子有一百個，沒有那麼多啦。

鄭雯如：因為是經濟學的書，所以前面好像也只是提到而已。

劉恒君：我這章就只有提高利率與經濟衰退。

黃默：我想當然是有關金融風暴，妳就多關心這個吧。下一章就關注轉變到市場經濟。具體的政策建議，都在**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s**，下面這本書。我們這樣講好了，這本書開頭是講華盛頓共識，然後就引了東亞和蘇俄，然後再談一些另外的問題，這就會一步步接近到下一本書的討論，所以看來有這樣的一個途徑。

承正：恒君講的那個部分其實我蠻同意的，不過應該沒有太大的關係，其實我有處理過金融風暴的，我可以幫妳做一些補充。好比妳剛才提到的熱錢，其實這有標準的定義，熱錢和外人資金投資（FDI）有什麼不一樣，對經濟有什麼衝擊及影響。我想重點是這些政策背後代表的價值，所以才要施行這些政策，我想下次做一點補充就夠了。我想像老師說的，我們看一些就夠了，還有要這麼做的原因就可以了。

(六) 2008/03/07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3, Ch4

黃默(主持人):今天我邀請了幾位同學來,希望你/妳們將來有興去參加我們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已經有了四年,每年都選擇一個議題,今年的題目是「全球化、發展與弱勢族群的權利」,尤其關心移工、婦女等。去年十月開始到現在,請妳/你們看一下我們的行事曆(已經印出),我們要商量一下改一、兩場時間,今天晚上讀的是*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本來是要讀三章(第三章到第五章),第五章談的是「資源的詛咒(resources cuse),假若之後還有時間,我可以來補充這一章的報告。下一次,我得與李河清老師商量一下,談環保、跨國公司,也就是第六章、第七章與第十章,兩次就會把這本書做一最初步的討論。我介紹一下黃嵩立老師,是陽明大學的教授,參加我們這個讀書會好多年了,對我們的讀書會非常有幫助,會提出非常多深刻的問題,經驗也很豐富。

黃默:*The End of Poverty*讀一次,在四月十八日,*The White Man's Burden*就讀一次,在五月九日,是嗎?也就不需要改變林正弘老師和劉紹華老師(本來預定好)的時間。大家可以同意嗎? Is it clearable to you? Ask her(黃斐新) to explaine to you. Now what we are doing is to reschedual because we are kind of behind what we have planned to do. 林正弘老師與劉紹華老師都還得規劃由什麼人來報告,剛才(白)湘銀說她可以做一次報告。所以這個我們再來討論。現在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讀書會。一般的情況,我們希望在九點鐘就結束,因為我們發現如果到了九點鐘還不結束,大家的發言就會開始不清楚了。今天的情況比較特殊,好幾位老師都不能來,下一次我們要比較努力一點,希望能早些時候與他/她們約好時間,能有比較多位老師來,討論就比較有趣,我們也能學到多一些。

今晚,只有我們二位(黃默與黃嵩立),還有陳榮利先生,我介紹一下,假如您們不認識他,他是從中國游泳過來的,在中國南京大學學政治學,但後來參加政治活動,在牢裡很多年,出獄後就輾轉到台灣來,這些年來他與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也非正式的參與我們的活動,與中國方面的情況,我們都要諮詢他的意見一下。另外一位是從印尼來的, We have new participant from Indonesia only two weeks here on our campers. And we are very pleased that she agrees to come and

finds out if she likes it and if this reading group would be useful to her. I don't know yet. So most of the reading is in English so it should not pose problems for you. But the discussion is in Chinese or for most part the discussion is in Chinese. But for time to time, we would be arguing about how a specific word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hat does the phrase mean in Chinese so that we will use some English but not that much. But the reading is very much in English. Now so much for that. We had the first report by Dorothy. It's on chapter 3 of this book. Before that let me...

我稍微講幾句話，因為我算是導讀，這些話我可能也已經講過了，因為我也導讀過Stiglitz，他的另外一本書叫做*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這是他比較早期的一本書，我簡單地講，提出一兩個看法吧。

首先，Joseph Stiglitz多年來是一位學者、經濟學家，後來又到政府去工作。開始是在白宮擔任經濟政策顧問，當時正好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後來也影響到俄國，所以作者在*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一書對這兩個事件都有分析。他到世界銀行工作之後，瞭解到世界銀行、IMF與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對亞非或發展中的國家帶來非常多的傷害，「華盛頓共識」是美國財政部多年的主張與政策原則，透過美國的力量，也成為IMF的政策。這個共識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自由化、市場開放、貨幣流通，但是在作者看來，這樣的主張已經成為一個教條，譬如金融風暴時，即時在許多地方已經出現了危機，IMF不顧現實的情況仍主張開放，所以Stiglitz批評IMF很多，IMF也反擊他，之間有不少相互的批評與攻擊。

上述是我認為我們應先瞭解作者間跨學術與政府的兩種身份。另外一個看法也提出與大家討論，除了間跨理論與實際，Stiglitz 是非常願意提出政策建言的，也就是不是我們所說的「象牙塔」學者，這在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一書已經看得出來，但在今天這本書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中尤其明確，他對每個他提出的問題，都有具體的建議，譬如說在「公平貿易」一章，Stiglitz 不論對公平貿易、環境或專利都有他很具體的建議，所以他不只是談哲學（理論），也談現實。對我們讀書會成員而言，這樣的一個途徑，我們都有一個程度的同情，即兼顧理論與現實，在我們讀書會裡有好些人是很容易接受的，也就是不空談理

論，但對現實也不能都沒有理論背景，所以，這是我提出來提醒大家的。這與我們早先讀書會讀到的幾位理論家也是同樣的想法，如 Amartya Sen, Martha Nussbaum 等人，看來，這也是我們這個讀書會一步步接近的立場。

Dorothy 有簡單的書面報告。

白湘銀（報告人）：這章探討貿易體制的部分。實踐上的差異，也簡述國際貿易的，提出新貿易遠景。首先他提出在貿易自由化的學者意見...(詳情請參見「研讀綱要」)

.....自由貿易擁護者認為這些理論（保護新興工業）有些批評，第一，保護不是適當的解決辦法，第二，通常受到保護的「幼稚產業」經常會被隔絕，又被特定利益團體操作，造成其他工業的成本提升，所以保護產業對自由貿易擁護者而言是弊大於利。關於這類批評的回應，反而提出更廣泛保護的說法，認為應當對更多的產業進行保護，像是工業製品建立同一關稅、透過廣泛的保護產業措施擴大產業的規模，進而產生創新的源頭，並且擴散到經濟體的其他領域。這裡是「幼稚經濟保護論」的兩個看法。

黃默：假如大家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先提出來問她，不然也可以等到她（白湘銀）報告完了，我們再來討論好不好。假如有什麼不瞭解都可以問她。

劉恒君：可能是我沒有聽清楚，您在書面提到「另一個更廣泛的保護」是什麼？那麼 Stiglitz 是比較站在所謂要保護還是不要保護的立場？

白湘銀：我在這裡沒有看出作者是否要保護的意圖，他就是把這兩個看法說出來而已。因為，一開始的保護工業被批評為增加更多的成本，那麼更廣泛的保護，使家家都受到保護，就不會有特定的產業受到高成本的傷害。

劉恒君：為什麼單一產業的保護會增加其他產業的成本？

白湘銀：因為其他產業要與受保護工業競爭的時候成本就會相對提高。我記得在書中有提到例子，現在一時找不到。

黃默：我們可以等一下再回來，妳先找找這在哪一段？繼續報告。

白湘銀：公平貿易有沒有自由的基準?...（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黃默：非常謝謝，Dorothy(白湘銀)報告得非常清楚。假如你們讀過這一章，他是希望有個背景說明，也談到多年來談判的經過，也有他的建議，這些建議看來是相當清楚的。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提出來問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十九世紀英國提出來「自由貿易 (Free Trade)」，最簡單的想法就是放棄關稅，才能互通有無。我們現在回頭去看非常瞭解英國當初的主張，當時的英國已經是世界上掌控金融及世界的大國。從「大國崛起」一書可以瞭解英國的興起與她的科技密切相關，許多學者都已經瞭解到，英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的工業大國，是世界的大國，所以放棄限制，基本上英國的貨品就可賣到其他的地方，而別國是無法賣什麼東西到世界上的，因為她們沒有什麼工業化。

剛剛引了一句話「公平貿易以部分的問題是沒有真正的實現」這句話是在哪裡？可以找出來嗎？

白湘銀：在第 62 頁。

黃默：所以這個講法也沒有錯，公平貿易為何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的執行過，今日看來，南北的談判也不是公平的談判，尤其農業的補貼是一個大問題，歐洲的牛得到國家的補貼，一天獲取兩塊錢，亞非的牛奶產品如何與歐洲競爭？所以一方面是農業的補貼，另外還有好些不但是議題，而且每次談判，發展的國家就會強調資金的交流，譬如說這些已發展的國家與亞非國家的開放銀行體系，但是她們自己就不肯談勞工市場的開放，讓勞工可以從開發中到已開發國家，所以這都是不平等的情況。也因此 Stiglitz 就提出一系列相當具體的措施來達成公平貿易，提出來的都很明確，但都不容易做到。

下面我們還要談到貿易、專利與智慧財產權的關係，之間是密切相關，所以要去改當前的體制是不容易的，但是能提出具體想法總比沒想法來得好一些，所以我就來一個簡單的補充。大家有什麼問題？你們幾位剛參加讀書會的？覺得清楚不清楚？你們可能還沒讀到這本書。(林)雪非呢？(蔡)竟予呢？妳讀了這章沒？**Any comment?** 假如沒有的話，我們也可以把下面一章報告後再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黃)斐新有沒有什麼問題要現在提出來的？

高婷要幫菽芋報告。這一章也談到愛滋病與藥品的問題。

何嵩婷：先用兩個例子來說明專利對人民的影響...(詳情請參見「研讀綱要」)

黃嵩立：稱「學名藥」沒有什麼問題。的成分，作法很簡單，兩毛錢。其實學名藥是成分的，有學名的有效成分的藥就是學名藥。

何嵩婷：一個良善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可以利用各種方法使獨佔的成本與創新的利益之間達成平衡，這些方法包括，限制專利的期限、公開專利的細節等，使別人可以進行後續的研究，以及限制專利擁有人濫用獨佔權等。最後又回到TRIP協定，當初談判時，美國與歐洲國家代表並沒有考慮到屈服於藥廠利益團體和延長專利會導致的結果，僅有少數，如治療愛滋病藥物可以適用於「強制授權」，而且這個協定允許透過貿易制裁以合法落實智慧財產權，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更有執行力。但是TRIP使得美國與歐洲能夠強迫世界接受這種霸道的制度，使得開發中國家受到不利的傷害。這大概是前兩章。

黃默：有什麼問題是要現在提出來的沒有？前面是敘述的部分，再來他才要提出他的建議。這裡有一個翻譯錯誤「十九世紀英國與蘇格蘭圈地運動」，一看就知道是翻錯了這不可能是十九世紀，圈地運動是在十六世紀就開始了，從原文來看"**The enclosure movement in the late middle age in England and Scotland**"所以不可能是在十九世紀，十九世紀的英國早已經是世界工廠了。

談到這樣的問題，妳(Dorothy)也回頭去看一下妳翻譯的「至少可以允許開發

中國家銷售她們的執法權」，這是從哪裡翻過來的？我曉得是什麼意涵，但原文是怎麼說的？

白湘銀：應該有，應該是個註解。

黃默：嵩婷的報告，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她的？在這裡有沒有哪位是不同意 Stiglitz 的看法？黃嵩立老師您怎麼看智慧財產權？

黃嵩立：傳統贊成市場機制的人可能企圖提升最大的誘因，所以短期來說，會對大家造成傷害，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誘因的，可能都去做麵包了。相反來說，藥廠經常說索價這麼高是爲了要鼓勵創新。所以作者就問是否一定要用財富來引導創新？他認爲創新不一定要用經濟誘因來鼓勵。第二，藥廠所聲稱的到底是對還是錯？這裡的把柄是，爲了推動新藥花了多少多少，其實初期的研發都是在大學中進行的，大學都拿公家研究機構經費，譬如在台灣就拿國科會的錢，這可以算是大家集體的錢，然後，其中只有一兩種研究成果被拿去做藥廠的生產，其實有部分是公家出，應該得算公共財。

第三，自由派經濟學家會說，作爲一個公司，只要賺錢，對股東好就好。相對來說，一部份是對的、非洲人所需的藥物沒人發展，顯然沒有經濟誘因也不行。所以公司根本不需要去考慮是否造成傷害，讓資本最有效的運用就是對人類最好的，我想這裡的語病是，藥廠的股東是否瞭解到愛滋病藥物變得很貴的時候會傷害多少得愛滋病的人？在瞭解與不瞭解的情況下是不同的，所有的股權都給專業的經理人，我想這當中有些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使得這些經理人無法瞭解到一般大眾的想法，而變成所謂唯利是圖的商人。

吳景義：我想一件事，作者提到說沒有人做研究。很多公司是如此，可是許多公司不是一開始的開創者，反而是量產與推廣的角色。所以雖然要達到智慧財產權要保障繼續創新，但是著重的立意是推廣而非研發。我覺得這是一個藉口，我蠻同意作者認爲這樣反倒是阻礙了創意的發揮，雖然有所更新，但僅止於此，而且阻礙發展的可能性。

黃默：我讀到關於 Yoga(瑜珈)，特定的 yoga 教授或動作可以申請專利，在過些時候我想太極拳也可以申請專利了。同樣的例子是關於基因，也很有趣，解讀了哪段的基因就去申請專利。您（黃嵩立）怎麼看？

黃嵩立：一開始在做人類基因解碼的食後事實是由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出錢，所以她們就一直在做 DNA 的序列分組(DNA Sequences)，解出來之後就是公開的。但是後來美國好些公司就看到這個事情有利可圖，所以就投資得比政府更多的資產，然後定序的工作就做得比政府快很多，他們每解完一個基因就趕緊去註冊這段我要、又這段我要等，甚至到有一些.....。我想是沒有人把正常人的基因拿去註冊專利的，比較多的是有些特別罕見的疾病，比方某種特殊的白血病，公司就會聲稱我找了這種疾病的特定那一個基因了，而且那段基因的定序是他的專利權，搞得那個生病的病人都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怎麼他/她身體裡的某段 DNA 會成為某家公司的財富。或者，更有趣的可能是，跑到妳/你家後院去挖了一個什麼沒看過的樹，那顆植物的定序就變成人家的專利了。很多弱勢的國家裡面擠滿了西方人，將許多西方沒有看過的植物通通採一株回去，希望可以從中找到治療癌症的解藥，成為公司的專利，如智利。

黃默：也不盡然要說到智利，台灣人就把腳步移到原住民村莊，希望從原住民的血液當中，有什麼與漢人不同，看看對治療疾病的幫助，這看來也會引來法律上的倫理問題。

黃嵩立：我們系上有兩位中國來的學者，後來成為哈佛的學者，她/他們做了很多研究，回到中國蒐集很多血液的樣本，後來被披露欺騙村民是檢驗肝功能，也就沒有發表報告，後來被告出來，就離開學校了。

黃默：這裡看來有很多倫理、道德的法律問題，到現在看來還不是一下子能釐清的。我想今後好些年都有這樣的問題。你們有什麼想提出來問的？（蔡）竟予？

蔡竟予：我看到書裡在關於基礎研究裡，他提到Linnex的火狐(Firefox)的例子，我本身蠻有感觸的，我自己一直想用Firefox，可是微軟都是綁著IE，所以IE在微軟的介面上的確速度比較快，甚至最近的EeePC，或是一台小型、只需要一萬元

新台幣的筆記型電腦，一開始也是用Linnex，可是後來變得要多花五千元，然後是綁IE的，而且，我的電腦通常不大有經費去升級記憶體，但Visita是非常耗記憶體的，所以大家都會偷偷回去灌XP，然後微軟又發佈XP停止使用的消息，來強迫使用者都用Visita。我聽到一些工程師有不一樣的想法，是為微軟工作的，他認為IE還是對大家最友善的介面，因為有許多的工程師在做修正，也是最好上手的介面，一般沒有資訊專業背景的人，Linnex是不大好使用的，雖然一般打報告不需要艱深的程式。所以我認為，當公司獨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便能去設計出一個好像比較友善的感覺，大家不見得願意花腦筋去想要用哪一個介面比較好，原來電腦附什麼介面就用什麼就好了啊！？還有比爾蓋茲他一年捐好多錢，似乎做了很多慈善事業，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蘋果電腦只是慢了一步去登記，其實最早研發電腦的不是比爾蓋茲，但是他現在可以塑造一種好人，捐贈很多電腦等，本來說要替第三世界研發便宜的電腦，後來也無疾而終，後來是由Google提倡要製造三千元一台的電腦，但缺點是得用手動發電。我覺得比爾蓋茲如果願意的話，任務早就達成了。

黃默：好，這個我是有聽沒有懂。（大家笑）所以，你/妳們大家有什麼意見？還有什麼想提出來問的沒有？

Dorothy，妳那句話的翻譯在第九十九頁。字面上沒錯，但您能不能想想有沒有其他比較恰當、大家容易理解的翻譯？We are talking about patent, drug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onopoly of these rights. And its impacts may be in broad sense progress of creativities and there are always pros and cons. So w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this. Probably quite a few are more sympathetic to the criticism by Stiglitz against the monopoly but knowing that in some situations certainly that patent helps but in many instances it had gone too far.

大家有什麼看法或評論？換妳（劉恒君）報告了？將 Stiglitz 建議簡單地講一下。

劉恒君（接續第四章後段報告）：智慧財產權的制訂要達成哪些目標？……（詳細哪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黃默：大家有什麼問題沒有？作者最後談的「民主的改革」還是「決策的民主化」也是他在最後第十章談論的問題。黃嵩立老師有沒有要補充的？

黃嵩立：有些藥已經超過二十年的專利保護，但售價在各國仍舊不一樣，如在巴基斯坦買胃藥比在美國要貴，因為賣藥的廠商與這個國家的人談判時，端看要買多少藥，買得多就相對便宜，所以窮國通常買得不多，談判籌碼少，所以要價就貴。對開發中國家而言，不只是專利權，也與經濟利益為導向的運作制度有關。

黃默：大家有什麼評論沒有？

黃嵩立：我們在談對於世界人權宣言，不知道是哪一條，對於已經發展出來的knowledge(知識)人人都享有權利，這個條款能否拿來做察視呢？

黃默：就是在文化權的那一條，應該是二十幾條，哪位有世界人權宣言？就是說我們有共享科學、文化成果的權利.....，以您瞭解有沒有這的討論？

黃嵩立：我沒有耶。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有可能性的，我們要注意一下有沒有可能引用這個條文作為論證的開始，即科技的成就都應該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享有的，那麼是否會對專利有什麼影響？

劉恒君：第二十七條。(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

(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is the author.*

黃默：假如Mozart（莫札特）在我們這個時代，那對他一定非常有幫助，他那個時候既沒有專利也沒有保護。這是第二十七條，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icle 7. We are talking can we use that as a beginning point in the argument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share in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drugs. I think there is possibility in moving along this line but it would take some effort to make a solid argument. 妳（劉恒君）幫我把這個記下來，看看以後有沒有可能性？大家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的沒有？ Anything you would like to say?

Marceline Yudith : In many cases, universal health care system imposes so many condition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ccess.

黃嵩立 : I think it is less of the problem in countries where universal health care coverage is provided such as in UK and Canada. But it would be a problem in countries like US where people have to pay,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can not afford the cost of health insurance. So we can see that in countries, like US which is pretty much willing to have the payment system running and so they would have to buy legal medicine rather than generic medicine. The cost will be significant and portion of their people can not afford. That is the situation that US is facing.

I am not that aware of the American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US because in UK, in Taiwan and Canada, these countries all have a single provider, that i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But because US has often believed in a smaller government so currently there are dozens, if not hundreds, of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s and because they are running independently so they attract different people who want to join their programmes. So it would have richer people's programme and poorer people's programmes and so if, even if, the US wants to cover everyone, I think,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as to which governmental 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is going to provide for those who do not currently have insurance. I do not think it is feasible to break down all the current running health insurance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I don't think it is going to happen.

黃默 : We have not seen this movie. We do not know where it comes from. It has not shown here. I do not know who is behind it and what is the point for which the

documentary is made. So we would better leave it at that until we have more study or more evidences.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t would be difficult. Ok. Anyone else?

蔡竟予：作者在最後認為經濟發展以長期而言比GDP更為重要，但我們經常還是會比較關注在那些看得到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像他說提到的環保、文化或社會正義等的問題，像現在的台灣也是如此。

黃默：歷來都有好些人這麼說，但問題應該是在於是否有比較多的人看到社會正義、長期的發展也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一定可以找到一些人會說：『都吃不飽了，還管什麼...什麼...的』，這類的說法行之多年了。

吳景義：對於作者提出來的辦法我都覺得很棒，我好奇，想請教黃嵩立老師，聯合國或WHO對於貿易自由化所影響的健康問題有沒有什麼因應？有沒有介入？WTO與WHO有沒有這方面的協調？

黃嵩立：WHO與WTO的立場就像台灣的經濟不與衛生署的關係，一邊講話有人聽，而另一邊講話沒有人聽，WHO的力量真的很微薄，也曾經嘗試要去和WTO協商，但沒有什麼顯著的效果。

WHO自己有比較另外訴求的方式，比方，在這裡有提到，有些熱帶疾病，沒有人要去發展（新藥），所以WHO就在這個方面比較容易著手，她的策略是自己去找贊助，因為也不是從會費來的，或找些仍舊存在這類熱帶疾病同時又有科學發展能力的國家，如巴西，聯合這些中級國家的大學，成立一個發展新藥的聯盟。

另外一種是去買藥，忘了是治療什麼病了，是一種已經被發展出來的藥，因為在西方國家沒有這種疾病，所以製藥的藥廠很容易就關閉生產線，WHO就再去募得一筆款項，承諾購買兩年份的藥品，使得雖然藥廠沒有賺錢，卻不至於虧本繼續生產，而可以發給非洲地區。

WHO的人手與資源比想像的來得少，所以當要發放藥品給非洲地區時，還必須與當地的NGOs或無國界醫生，透過她們廣大的據點才能發放。發放還是小事，

重點得去追蹤患者是否服藥，而需要另外的一種人力。

黃默：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沒有？我本來想用五分鐘到十分鐘就把第五章報告。第五章談的是資源的詛咒。這章提出的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有好些國家，擁有好些豐富的資源，但是又發生內戰、又是那樣地貧窮？為什麼豐富的資源變成一個詛咒？Stiglitz用很簡單的話來說，在第一百三十五頁，我也借用他的分析”The problem is simple: when there is a pile of diamonds sit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everyone will make a grab for it. The biggest and strongest are more likely to succeed, and will be reluctant to share it unless they absolutely have to-- such as when someone else, even bigger and stronger, tries to grab it away from them, and they need to spend money to buy political support or arm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power. The resources are both the object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source of financial wherewithal that enables the conflict to go on.” That is they compete both for that commodity, either the oil or diamond so that that commodity of the resources are both the object of conflict but at the same time is where they get their money so that they can keep their fighting going on. So here, the resources apparently serve two purposes. Knowing that "Sadly, in the struggle to get as big a share of the pile as possible, the size of pile itself shrinks as wealth is destroyed in the fighting." Then he said, "Nowhere is this more evident than in part of Africa, exemplified by the heinous fighting over diamond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rebels in Sierra Leone during the 1990s that killed 75,000 people and left 20,000 amputees, 2 million displaced people, and large numbers of children psychologically damaged by having been forced into combat," that is what we refer to the child soldiers, "or worse."國家有那麼豐富的資源，但不旦沒有幫助，還帶來那麼多的傷害，這當然是一種悲劇，一旦開始，就很難停止，成爲一種惡性循環。我覺得「血鑽石」這個電影，非常血腥，叫我看了好心驚膽跳，不是很舒服，很不自在。這就是資源的詛咒。

同樣地，作者也提出幾個建議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這當然是可以避免的，這些都與貪污、貪婪與密切相關。所以他說有一個：不論是開採鑽石還是石油都要透明化，工廠運作都要透明化，再來就是不要賣給他們武器，這些政府還是叛軍都需要大量的武器。而且要有證明的制度，比如說聯合國安理會作了一個決定，規

定怎樣來源的鑽石在國際市場才可販售。再者，要有財政上的援助，就是說這些資源都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價格時就應該有補助。第三點，就是要有規範，怎樣使她們的資源或得到充分的價格？他說international body，如「世界銀行」也可幫助。第四點，要限制對環境帶來的災害。最後一個是執行，就是說不能只是道德上的勸說，這些規範、透明化的構想都應該是有效地去執行。

我的報告很簡單，五分鐘就把這章講完。在一個程度，若你們看了「血鑽石」，或多或少有個印象，他們在爭奪什麼，為什麼帶來了傷害，要怎樣減少傷害？或怎麼樣給發展中國家比較多的幫助？使她們的價格較好？我又看了一個紀錄片，說的是咖啡，在依索比亞，這個組織的代表就到歐洲或美國希望得到比較好的價錢。鑽石也是幾個大企業控制的利潤，如獅子國。咖啡看來也是這樣的，我看錄影帶是早幾年，咖啡的價錢在國際市場又降低分之十，那些咖啡農都很受傷害，她們的家人也到了吃不飽的地步，更不用說要把小孩送到學校，這是做不到了。最近如何？我不瞭解，是否報紙說有提升了？但這樣的趨勢，對咖啡農不見得有幫助，在印度早幾年，有一個時期，發生了很多棉農自殺的情況，這個情況與市場的價格、資源都有類似錯綜複雜的情形。這個當然是我們不能不去面對的問題。

我又想到，Stiglitz的解決方案都非常明確，而且看來也應該是可以去做的，但是他每一章解決的方案又是環環相扣；不能只解決公平貿易，還得解決環境的問題，不能只解決環境的問題，也得去問專利的問題，所以在一個程度是他的優點，是否也是他的缺點？因為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有沒有這樣的問題？開始講好像是非常簡單的，但把他所說的都加起來的話，得要產生一個大革命才行，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這是一個印象。

黃嵩立：我感覺他提出的解答如同小學生般直接了當。但沒法做到的原因是什麼？我想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關切的立意太龐大，但就是做不到。班上有位美國的僑生，他說在美國的時候，偶爾會看到有些做的好，有些做得不好，直到離開美國之後，才知道大家都在罵美國。不僅僅是如此，我猜這些問題，我覺得作者好像講就是這樣這樣，好像也沒有。

黃默：我當然假設每個人都認為這些解答是明確的。但為什麼沒有做到？牽涉了什麼？牽涉了大利益，在亞非又牽涉貪污腐化與無能的政府，我的說法異曲同工。(蔡)竟予我現在給妳一個開頭，妳要不要再來主張一下馬克斯的革命？(笑)
蔡竟予：如果是馬克斯，他會說下層決定上層，經濟會決定上面的政治文化等，就像我們現在不都是要讀英文，我的意思是事情背後的複雜度一定是千萬倍於我們所瞭解的。

黃默：這個跟妳讀英文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不讀英文，您剛才說的也一樣是。(笑)

蔡竟予：我的意思是，我們都處在美國或強大政治力的影響下。

黃默：我在這方面跟您是有不同的看法，您很瞭解的。不過，這個很好。(蔡)竟予有時候就想我們的讀物都是英文的，所以我們的想法受到美國人的掌控等。但是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就算不讀英文也同樣可能受到美國思想的掌控，世界上多少億的人口都不瞭解英文，還不是受美國主流思想的影響？！那又如何解釋？我對這個稍微遲疑。

最近有個學生說要來選我的課，但他說他的英文很遜，想要不讀英文，所以我就想出了一句話來回答他，我就說：「你/妳英語很遜，不怎麼能讀英語的文章或書，這不是一個羞恥的事情，但這也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我想語言的功能與思想的確有關，但您想馬克斯的著作您讀的不也是英語嗎？(大家笑)

蔡竟予：我不是說不讀，反而有時候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每次回南部聽到大家說台語，而我是講一般北京國語，就已經出現不同的文化與思考了。我自己台北，好像就有一種思想，回到南部住一個月後，我發現我的想法就會有所改變，何況，長期閱讀英文讀本都是很大的影響因素。回到南部的時候，我嘗試地要用台語來溝通，這麼做長期下來，我發現互動的模式都因此改變了。

黃默：妳想說什麼，(黃)斐新？

黃斐新：您提到在教會當中使用台語，我覺得即便是用台語來傳達聖經，但是我們仍舊是在傳達西方聖經的思想，只是用不同的語言作工具，但企圖被理解的概念是一樣的，還是要受到影響。

蔡竟予：後結構的思想當中也提到語言背後存在特定的意識型態。我並非是要討論這樣的事情，實際上有些南部年長者，因為會說日文，所以跟我所思考的方式與脈絡等都有明顯的不同，比方說對於台灣史的瞭解，我可能會覺得現代生活中物質或金錢會決定很多關於意識上的立場，但是我的母親卻會認為台灣現在再怎麼認為不景氣都沒有過去五十年來得窮困，這類的事情讓我深感到由於使用的語言不同，因此對於事情的看法可能變得很兩極。又好比日本人對於專利的看法跟台灣似乎就很不一樣，台灣是跟著美國的腳步。日本人似乎不覺得不會說英文是個什麼樣的大事！

黃默：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位革命家，從中國來的，我們來聽聽他有什麼說法。

陳榮利：我同意這位（蔡竟予）同學的觀點，語言有影響思想的功能。

黃默：我也沒有說不影響啊。（大家笑）問題是影響到什麼程度。好像讀英文就是西化，或接受當前西方主流的想法，那麼，譬如說台灣話又是怎樣的一個想法呢？同樣是使用漢語、中國的文字，不也有的是共產黨，有的不是嗎？！

陳榮利：就拿普通話與台語的區別為例，我在台灣，大體上是說國語的，如果說一群人聚在一起都是說台語的，那麼我大致上可以瞭解他/她們的政治傾向。（大家笑）因為他/她們不屑於講國語。（笑）

黃默：那個是有可能稍微測出來，但也不是那麼精準的。

黃斐新：但我也可以用英文、用台語、用法語或日文表達我對某一個政黨的想法，所以不見得說台語就是怎樣的人，只是用不同的工具在表達自己的想法，即便是

支持國民黨的也可以講台語，支持民進黨的也可以說國語或英文。

陳榮利：就好像總統大選時，候選人馬英九先生想融入比較鄉村的地區，所以說台語，但是大家似乎就覺得他說得不夠溜，頻頻被當成笑話，就可以看出困難度，語言的確會造成障礙。

黃默：學一種語言是不大容易的，我們也很瞭解，但這也不是我們爭論的。雪非？

林雪非：我覺得第一，語言是曖昧的，經常有雙關的成分。第二，語言是傳達意思的工具，語言本身沒有問題，重點在於接收語言的人，好比一個美國人說話給一個英語也很溜，但是沒有英語世界文化脈絡的人聽，那麼這個人就很不容易接收到話語當中的暗示性。

上課的時候聽老師談到「社會區隔」的概念，在台灣，一個英文說得很流暢的人與其他英文程度低或幾乎沒有的人之間會顯示出一種社會階層上的差別，包括品味、知識水準等，舉例而言，到台灣的餐館去用餐，在點餐時，對於英語較能使用的人，相較於其他不怎麼能使用英文的人，服務生就會以此作為認識的角度。

黃默：這個我也可以接受啊。（大家笑）

林雪非：我覺得傳達主要的想法是可以順暢的，但是有些附帶的東西是沒有辦法傳遞的。就讓我覺得對話的一來一往當中，像是一棵樹，但有可能最後僅有樹幹被傳遞，而莖葉與樹枝都被留了下來。

黃嵩立：我想今天的讀本可以算是一種「樹幹型」的讀本（大家笑），探討的就是globalization(全球化)，所以就算被翻譯成德文或西班牙文，可能大家接收的message都是差不多的，因為沒有什麼枝葉可言。因為我們班上有很多中南美洲的同學、非洲同學，但我不覺得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東西，也許她/他們無法讀一個美國詩人寫的詩，因為那個就是枝葉，可能沒有樹幹，可是這（本書）只有樹幹，看要讀什麼樣的東西，語言的角色不見得永遠都是一樣的吧！？

林雪非：我覺得在剛開始（報告）的時候，就像是在種下一棵樹幹而已，然而，我自己的感受是當我們想要更深入討論的時候，任何一種選定的語言，就開始遮蓋了某些意義。就像我覺得英語完全沒有辦法表達孔孟思想對我有這麼深的影響，尤其，即便我們都接受孔孟思想，但對方永遠無法瞭解到在歷經時空變遷，屬於我們這個孤島上的孔孟思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很難很難很難（大家笑）。

黃默：這個我都同意，都同意（大家笑）。最早我實在是想試探她（蔡竟予）怎麼回應。假若是馬克斯思想，當然一般我們會說是「經濟決定論」，但是，從這裡好像開始出現了某種「語言決定論」，即我們的政治意識是決定在我們的經濟還是決定在語言。我實在是稍微想給妳（蔡竟予）一點壓力，要妳把這個事情想清楚。

蔡竟予：馬克斯認為有了經濟上的決定權比較容易將觀念導引成意識型態，可是我覺得這的確是蠻普遍的一件事。好像我的老師是從英美回來的，所以我就受了英美的影響，我猜想大部分的台灣人對美國的思想會有什麼批判，好像我們在讀這些讀本的時候都覺得大致說的很合理，推論也很好，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落實的。因為我們長期親美的緣故，我們也會想加入WTO等，這些事情我們深入其中，所以其實無法想得那麼清楚。

黃默：我們現在不能再談下去。但我想提醒妳（蔡竟予），您提到的「我們」是什麼？是學校裡的人、政府裡的人又或是您在南部使用台語的親戚？至少這樣的問題您又如何回答？

陳榮利：我想她（蔡竟予）的意思是台灣人？

蔡竟予：比方書裡面提到「開發中國家聲音太小」，但我覺得在台灣內部不一定存在一致的聲音，就好比之前公投的事情就顯現出來，不僅沒有一致的聲音，可能連收集整體聲音的制度都還很不健全。同樣地，全球化的議題在國內好像也是

眾說紛紜。

黃默：那很好啊，這樣語言就沒有決定我們的意識型態啊！（大家笑）

蔡竟予：但是似乎因為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的聲音太小」，所以就可以從這個觀點上一環環地推論下去。

黃默：我們看來什麼時候需要有一整年來研讀語言這個課題，這個在當前是顯學。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停在這裡了，下一次再回來。下一次是由李河清老師，再來是黃嵩立老師。

(七) 2008/03/28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Ch6, Ch7, Ch 10

黃默：我們已經花了好幾個星期閱讀Stiglitz，開始對他的看法與approach(途徑)也有不少爭論，我想好些問題會再引起爭論。(介紹台大法研所學生陳文威與陽明大學黃嵩立教授認識寒暄) I think we shall begin if you choose to speak first, you speak in English and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you, we interrupt you. Probably very politely as we are all very gentle kind of person. You (Marceline Yudith) go first and then(黃)斐新, supposedly you would be doing this jointly together, am I right? You, two are doing this chapter are reporting on this chapter, am I right?

黃斐新：I will do chapter 6 with my friend so she will be here late.

黃默：So that she would be doing chapter 10 alone. Now just a few notes: chapter 10 really is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book in which that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we really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ll other chapters, he made recommendations as to what kind of reform should be taken for specific issue, for example, like said the working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curse of resources, that is resources curse. All for specific issu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of the book, in the sense, he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be thinking of the situation as a whole and we should go for the reform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greater degree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You (Marceline Yudith) go first. Why I said this because later on we would probably return to some of the specific issue and there would be certainly...You would be saying and while others would be saying certainly will be interact.

Marceline Yudith: Chapter 10: 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Ideally, globalization was proposed to bring the benefit for all countries... (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黃默：Thank you.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in your own language, am I right?

Marceline Yudith: Yes.

黃默：Just a suggestion for the next time if you... We used to give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 in the report and citing from the text, saying that: from this point it is important on this point what does the author have to say with a quotation mark so that would be easier to get a theme. I think you did very well, but probably I am still used to and I suspect that we are used to that you have a more detailed report and citing the author on some of the more key idea that he presents in the book so that we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e is really thinking. All right. Any question? Any one?

Let me begin. The very last part of your report, that the last paragraph: now for the influence by assumed, you said that " from my reading, this chapter and reading book, I conclude, we see that the way to make globalization work is to depoliticize the decision-making democratically in order to represent broader social interests, and in the other hand, local sense of interests is becoming a serious handicap." In this sentence, you are saying so many things. Probably you need to kind of separate them or kind of put them in some how a different frame work, that is, for example, I say, "would you be open to challenge when you say we want to depoliticize the decision-making democratically?" Do you get my point? Can you say we depoliticize as you sai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democratically? Do you find something difficult here? Did he use the word "depoliticize"?

Marceline Yudith: What I understand the "politicize" is open the politics domain.

黃斐新：Are you talking about not centralize or depoliticize? Because I find it is two different meaning. I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depoliticize? Are you trying to say that we should make the power not centralized? Or Are we taking this issue depoliticized, I mean not that political?

Marceline Yudith: I am just looking a part of this book...

黃默：Usually we do not say we "depolitici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becoming more democratic. OK? Because by being more democratic is highly political. So you can not quite say that. And it would, appeared to be, when the depoliticize is to open up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at probably no one would agree with you on that they would say if you are going to open up the process, you say open up, liberalize, or open up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y would not use "depoliticize." Am I a little bit clearer now?

Marceline Yudith: I do not know how to explain that in English. I do not mean opening but just like...

黃默：Stiglitz provoked opening up the political process, yes or no?

Marceline Yudith: Yes.

黃默：That is his argument. He wants to open up the political process. So when you use the "depoliticize" here, it is confused to many wrong ideas because, to return to what you said earlier in probably the first part of your presentation, that many economists argue precisely we should depolitici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en we come to talk about GNP, economic matter and so that we would use "depoliticize" in the sense to maintain the autonomy of the economic field. Stiglitz, of course, would not agree to that. That this group of economists is enemy, he is fighting against them. He is arguing here that we should not leave economics in the hand of the economists or particular kind of economists, those who deny politics should play any parts even secretly or covertly that they, of course, bring in political judgment if not political judgment probably even worse than tha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es, they bring in their ideological precedence into the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 of economic matters. Probably, you need to break up this sentence if you want to say the thing more clearly. Because you go on to say that in the other hand, local sense of interest is

becoming a serious handicap but you did not tell us why local sense of interests is becoming a serious handicap, in what sense?

Marceline Yudith: Because of what the author proposes, for example, for US, it is much more easier to explain and give examples because for US it is a large country and, what I wrote here, the one who is supposed to be in charge and arrange the part, especially in economics but represent more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ead of representing others' interests equally. So it is because of local sense and like the example I gave, we consider that more instead of too in another country which means we value self-interest more than others. US are supposed to consider more because they are super power and they considers other countries more but they did not do that because they have that local sense to bring more self-interests.

黃默 : Fine, you are saying that, like you said the interest of United States or the interest of Indonesia, for example, that prevail in so many cases of decision-making. Make that clear in your report so that, that is somehow a different issue. Because when you referred to that, of course, you can not help but have to face the problem of the government vs. the civil society, NGOs or the labor union, for example, in many places the government think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 society or labor union or the women's groups. Someone else would like to... I am happened to pick on the very last concluding part and I suggest that it would be open to challenge when you depoliticize because it is usually taken to mean that we should not bring in moral consideration, political things into our discussions. They would say when we talk about money, we are only talking about money or when we talk about GNP, we are only talking about GNP, do not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s suffering or th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by a tyrannical government or by the military strong man.

We have talked about trade, am I right? In our study, we have discussed that T-shirt's story and how the T-shirts have been made and what kind of impact from global economics. Let me raise another issue. I think you are right that Stiglitz was quite

critical of United States and we have seen this times and again when the high 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Critical of his government only after he left his office. Stiglitz has been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f we take his words he fault for the policy he thinks right or should be done but many times, of course, he did not prevail, for example, the IMF was his most terrifies enemy. Later on when he worked fo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re the very powerful enemy of what he proposed. So that here we have this phenomenon that, after he left his office, he is ver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I think some of you definitely remember, in particularly our CEO(陳文威), that Jimmy Carter was fairly critical of Israel only after he left his office. You find this in Taiwan politics almost only very bases, for example, 謝長廷 is not quite critical of the DPP only after he lost his position. How you explain that?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that?

陳文威:But at least, he is critical after he left the position. Look at Henry Alfred Kissinger; I see he is now a call and hint towar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China.

黃默：Probably he is a link in many situations.

陳文威： I heard the information that to make Kissinger, to make a call to those big bosses of the Mainland China that will cause about 50,000 USD.

黃默： That is not that much money for these rich entrepreneurs and they would pay, I am sure. So many students of diplomacy, in particularly I think in Taiwan, including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such a high opinion of Kissinger. I can not understand for the longest time, I do not understand why they have such a high opinion of Kissinger. Apparently, he is held as model as phenomenon that we have never made in our life. I have suspected many of your terrain students worship him and your(陳文威)Institute of the Diplomacy --政大外交所. I think Kissinger, probably he is an extreme case and how to explain him probably would be more complex than Stiglitz

or Jimmy Carter. What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Why these people only criticize his government after he left his high position? Kissinger is making his money.

陳文威：I would like to take another example. Madeleine Korbelt Albright,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However, I have a friend who worked for the US government and she talked me that even Albright who is favor of persisting of human rights issues she still made that kind of money.

黃默：I will not take Albright as so committed to human rights. Her background that, we can assume, given her background, she has some sympathy for people. But in her stewardship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her tenure Secretary of State, she did not do that much really.

陳文威：Really?

黃默：Let me think about some...

陳文威：That really breaks my heart.

黃默：I assume I will say that. That is in Rwanda, the genocide in Rwanda during her tenure.

陳文威：That is true.

黃默：And that will be case you will be challenged when you defend her as such a great champion. Rwanda, 800,000 peopl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massacred within a year. So I would not take her as such a great champion. I am sorry about that you need to seek another idol. (Laughing)

陳文威：I read too much...

黃默：黃嵩立老師您有什麼想法？

黃嵩立：沒有，但是...Reading the last paragraph, it just reminds me of the reading last year about Elevis Criton (? not clear). In order to achieve freedom...on liberty, such as the first one is democracy, the second, I can not recall all of the five, probably a commodity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 willingness for people to trust in each other which is based on, I think, the legal contract and such what he has the expectation. It is easier for a society to studying to a situation where people can be free. So I think although it is a discussing within a society, I think that can be us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here when we put the country as an individual, then we can see there is no trust and there is no a reasonable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mong countries and the little countries would not have fair way of voicing, just like they are allowed to vote. So I think the five of freedom can be used in the context although it is the very different scope.

黃默： Well, I do not quite remember exacted what the five freedoms you are talking about are. This is a very tall orde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that. I do not want to go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too far. But certainly like I said,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some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have proposed some new kind of methodology, or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at have been what you are discussing, in particularly,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idea: competition, power and military forces which really are the status of the real politics. Certainly two schoo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have proposed that probably there are some more room for maneuver and I am referring to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and post-structuralism. They are arguing that we should not assume that states are so permanent and they had very well defined interest and identity. We should assume that identity and interest come from the practice that is how the state interacts when through these long decades of interaction that identity and interest could change. So if we go along with these two schools' thoughts, either

the constructivist or the post-constructivist, certainly we will gain, I do not know how much, some freedom. We would be ever to argue that state has a little bit of room to maneuver and the NGOs or human rights regimes have a little bit more room to maneuver. But of course that the traditional idea we still can to mean that the states are very useful ideal about sitting, i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argue for transformation or change. I do not want to go very far on that. Anyone else would like to ask question or make comments.

黃斐新： I got a quite simple question. This semester I take the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y class and the teacher just asks us, like have you ever seen about the why you celebrate Christmas. So I suddenly think on the globalization we have a chance to appreciate the Hollywood movies. But I am just wondering what we can do to keep our local culture and which is especially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黃默： OK. Amartya Sen discussed that to some extent. I think he is after all a very sensible person if I am not mistaken, I remember that he said: first, we can not keep all the tradition. We simply can not afford to keep all of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r way of doing things or that of producing good. We need to make the choice. How much we decide to let it go. We keep some and there are some of others. So that there are should be this kind of a balance, or greater degree of balance. Certainly he implied that not all traditional values or things should be kept. Certainly for me, I would point to many customs, many well doing things that should go and it is becoming to say if I say so certainly I do not want to keep 纏小腳 and support some customs in some European societies...哈！李河清老師到了。

We have this Indonesia student giving a report so that we have been persuaded to speak in English.

李河清： Sure, no problem.

黃默：Of course, I did not mean...

李河清：This morning I reviewed a project in 木柵, that is kind of rude that you have to put out your report lied on the slut.

黃默：Does not make sense any how. (Laughing) You need something to eat first?

李河清：No, not really. Go ahead. I have been eaten snacks and I will be really fat.

黃默：That is junk food! (Laugh)

李河清：Ok, do not bother.

黃默：李河清 from 中原大學 have been there for some years and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ir general study programme and is well-known for her work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me, in particularly the climate change. Am I right?

李河清：It is environmental polluting and politics or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黃默：She just reported chapter 10, that is the very last chapter.

李河清：That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黃默：We challenged her very politely, very gently I assumed, and so we are engage in the discussion of some the things she had said.

李河清：Since you are the director, are we going to the chapter 6 and 7....?

黃默：One of them, chapter 7, the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guy will not show up, am I right?

黃斐新：Yes.

李和清：I can report it.

黃默：And let's conclude this part. Any one else still has anything else to say? Come in (賴怡欣).

我們有一位印尼來的同學報告，所以我們都變成說英文，不過她的報告就要結束了。

黃默：Do you have anything more to ask?

Marceline Yudith: No, thank you.

黃默：妳（黃斐新）是報告第六章還是第七章？

黃斐新：第六章。

黃默：第七章是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跨國公司)，您（李和清）待會兒稍微導讀一下第七章？Ok, go ahead.

黃默：哪位先？

賴怡欣：我先。

黃默：妳餓著肚子報告可以嗎？

賴怡欣：我可以。

黃默：假如妳報告有什麼錯，我們就說妳是因為餓著肚子。

Marceline Yudith: Sorry, I want to ask an excuse. I want to go to the toilet.

賴怡欣：Can I report in Chinese?

黃默：Yes, either way.

賴怡欣：書中談到整個世界就像是在一場實驗中，...(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當一個國家影響到另外一個國家時，例如，馬爾地夫和孟加拉均屬低地國，當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使得這兩個國家有淹沒的危機，可是造成這項嚴重危機的可能元兇，書本認為是美國，但是美國卻不用因此為這些國家負責任。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黃斐新：補充，從第一百七十四頁。作者說明全球暖化是一個全球的問題，需要每個國家來為這個問題而努力，而不是只屬於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個方...(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黃默：您（李河清）來決定是要先報告另外一章，或是先討論這一章？

李河清：是有些關連性...特別是有些跨國公司在環境議題大概也是有功有過。I think the tragedy economist, the scenario of tragedy economist, can not fully apply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or the oxygen depletion. 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things,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or oxygen depletion are considered as transnational or trans-boundary governmental issues. So therefore no things individual country or state can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s required. In 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solution would be or has b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 1992 and Kyoto Protocol 1997. So far these are tw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elating to climate change. The Climate Treaty has been or adopted the convention and protocol two stage process. First, we have the practical convention calling for the general guidelines to reduce greenhouse emission. Then we moved to protocols to give more specific approaches in terms of emission reductions. So first of all, general principle we all agree to reduce emission, then when it comes to then protocol we have to set up a specific time limit and the reduction target for individual state. The concept behind the whole things is so far global or total. It set up a global target in terms of the total emissions. Individually, in the individual country, you have your own reduction target. 「總量管制、個別目標」 So that you have total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global sense, but on individual level each country has a different or at least various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And this is all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stated in the Convention; it is called common but un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In terms of emission standard, the total protocol set up, you have to reduce, and the base year is 1995...

黃斐新：Why?

李河清：This is the compromised result. But you have to watch out so far onl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the immediate responsibility to reduce emission. Therefore, this reduction, obligation, is only applicable to developed countries. Only 38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they hav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It means, for instance, the CO₂, the major greenhouse gas, the life cycle of the CO₂ in the atmosphere ranges from 50 to 200 years. So the global warming phenomenon now is resulted from the CO₂ that have been immediate to the atmosphere 30 to 200 years ag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no obligation. We call it non-NS One. NS one has to pre reduce emission but non-NS one before into developing blocks, including India, China, Brazil and etc. By 2012, the end of the protocol, they are not under any obligation for individual reduction.

What we have to be really considering is this emission standard. It is whether we have to reduce all together proportionally in terms of total emission or we have to do it in terms of per capital which is in favor of those countries with larger population. In the way, it is fair. The total emission is divided by national population. We have different ways to reduce, first of all it is stated in the Protocol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and then, we have come out the two other alternatives emission standard so we could reduce the emission by per capital or the third one, it would be based on how efficient, the energy inputs vs. GDP outputs. That means if you are really efficient in term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n you have higher exception. Either to base on industry outputs, or per capita, or total emission reduc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do it.

黃默：They use all at same time?

李河清：We choose so far. In 1990, at best year, we reduced 500.12 point percent, but again it turns individual targets and then what they used there is minors 8 it is not minors5, so for the US they are supposed to reduce 8%. For Japan, they are proposed to reduce 6% and for the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Norway, they are allowed to have 1% plus, gain more because they are the major petroleum gas selling exporting country. In terms of Australia or Iceland, Iceland is allowed to have not emission reduction but plus 10. What Iceland uses for energy is hydraulic power, zero carbon. I think it is so complicated and also one more thing has to be notified is that Kyoto Protocol has taken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which is to regulate a basket of 6 kinds of greenhouse gases, not only CO₂(二氧化碳) but CH₄ (甲烷), but there is not SF₆ (六氟化硫) and PA₆. Some of them are industrial gases which are only produced artificially during the industrial manufactory process. It is totally man made that will apply to in terms of like IC industry or LED industry or TFT-LCD(液晶顯示器) industry. The IC companies, such as 台機電, they a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Kyoto Protocol. First of all, th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which

means that that applies to a basket of 6 greenhouse gases and also all that mean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anything else you can think of, including of electricity or agriculture now related to forest. It gets so complicated so that the next stage, in terms of climate negotiation. Their proposal says that we can make it simpler or make it more implementable or feasible. Some proposals would call for a ... approach. That means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tak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because it is too difficult. Let's do it our transportation only first, for instance. We set up the auto emission as the first step and then we can deal with forest, agriculture or the other things, like mining industry.

During the mining, then they have CH₄ released. It is really complicated. Again if you have rice paddies you have methane(甲烷) released. I think that, first of all, it is a problem structure, it could be very difficult and then also you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is why a market mechanism has been called for. So we have the emission trading and carbon market. In order to save money, in terms of the cost for the emission reduction.

In terms of the forest, you have two kinds of deforestation. A kind refers to some degrees of deforestation. B kind refers to naked forest, and then you have the reforestation. So you have A, B and R. All that can be calculated.

陳文威 : I am very curious about CO₂ trading. CO₂ can be trad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李河清 : Yes. I have some suspicion or conservative view. It means you are really paying the money to have the rights to release. Therefore, in terms of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are calling for carbon trade. That means you can trade to some limits and you can not trade indefinitely, right? I mean for those there is the one with the wealthy country. They are buying their right. If you really want to see how that works you could look at trade from here into there and from different accounts, transfer the

carbon from this account to another account. The bottom line is whether they are real domestic emission reduction.

陳文威：Who is the one having power to trade? To initiate?

李河清：It was initiated by the US. And then the EU was a strong component. But then there are a lot of papers writing about this.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 the way, I think again, holding a conservative view, they consider this is only buying and selling,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m, after the US dropping out Kyoto Protocol, Bush in 2001, and EU has turned out to be the only major economic powers in the climate regime and therefore it takes the leadership role in the carbon negotiation. They are kind of taking a U turn to make the carbon trading innovative. There are papers writing about this, policy U tur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From opposing it, when the US initiates it, this emission trading proposal and then turned around adopted but with modifications saying, trading is OK but carbon and trade. So now that has become a standard, especially in the EU that the EU emission trading has been The EU emission trading has been aggressive since 2005 January until now. Here applies EU 25 states and applies to 12,000 that means emission source and now will cover all energy consuming of industries, such as petrol chemicals steel, paper and anything you can think of. So it is quite broad, in terms of as a modified policy tool.

黃默：What country did you buy the right to?

李河清：Many. Argentina,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cipient countries. To receive all of this money by planting tree, by adopting clean technology. So if you want things to be good then you pay me for it. Then, I will do something which is more accommodating to the green energy or clean energy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So far, I think it is really interesting.

陳文威： I am very curious about who is in charge of them, the government?

(Omitted)...15 or 20 Euros per unit. During the early months of 2007, the price went down. People really feel, I think, that a lot of countries are holding these credits to sell. The US or Japan is going to be in great need so the carbon credit will be in great demand so everyone can sell it or dump it to the US. It went down to 5 Euros per unit but then expecting the Protocol to be put into effect; the price went back up again. If you go to Washington DC, there are consulting firms that are really in the business. When you go to the conferences, you really see money talking. These consulting firms will help you doing all kinds of things, help you set up business.

For the trading, there are other consulting firms. This is really big business. Norway is the center of selling carbon information: <http://www.pointcarbon.com>. Here is the PPT showing you the information. In Taiwan, the Taiwan Sugar Corporation(台糖)and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re keenly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黃默： Shall we break for a few minutes?

(休息五分鐘)

黃默：妳(李河清)要稍微給我們報告一下這本書。我們就請李河清老師給我們稍微報告一下。

李河清(導讀人)：(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我自己來談一下Wal-Mart(沃爾瑪,美國的世界性的連鎖企業),大家對於Wal-Mart有沒有什麼刻板印象?

黃默： In my impression, it is huge, cheap but not very good goods.

李河清：It always call quality but affordable price. (The following is omitted)

我也可以說他其實就是剝削地力的結果。能說他是非常好的management嗎？可是他對於女性勞工、同工同酬一事一直都沒有貫徹，及至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有很多社區是反對她們的進駐，而前是強烈的。這個事情對目前還在熱切擁抱Wal-Mart和「家樂福」的大陸是不能想像的，歡迎還來不及。可是這個事情就很難與大陸...上次我去安徽，那裡的「家樂福」還是「大潤發」是全中國銷售成績最好的，我以為那裡完全沒有購買力，開幕之後全中國銷售成績最好的據點就是在安徽省的合肥，在那裡購物停車還要收費呢！不是免費停車，而是要收費，然後大家衝進去買。（大陸人）覺得好好。

陳文威：為什麼？

李河清：非常便利，什麼都有。對她們（中國）而言認為，您怎麼能跟我講消費主義的邪惡，您先讓我消費了再說。我真的說不下去。另外也有人認為在這些地方買東西比較不容易買到黑心產品，或即便買到了，也可以找到申訴的機會。

另外我要講的一個也是屢次在環保團體 ...(omitted)

像我們的核四裡面有基地，那是多麼大的案子，當然我們的RCA，桃園中壢的RCA廠址，RCA是工業污染案，後來就賣給了GE(奇異公司)，又後來賣給了Thomson大家想想，GE已經是這樣富可敵國，Thomson是法商，是賣軍火的，賣火箭的，各式各樣的磁浮高鐵，只要不買GE核能發電設備的人，至少會買其焚化爐設備，很厲害吧！無所不在。

比國家還有力量

李河清：Of course. 我們其實對一些公司的理解，那些全球的前十大企業，我想大多都是油料公司。我是覺得這樣的跨國公司可能.....

陳文威：老師，請教兩個問題。第一，您剛才提的Wal-Mart與GE，還是一般我

們都會把跨國公司看作邪惡的？第二個問題是，我的直覺反應是大與賺錢好像沒有什麼敵對，問題是在那邊？

李河清：土地啊，如果用市場理論的話，她們完全沒有不對，比方說Wal-Mart幾乎什麼都賣，裡頭沒有什麼是美國製造的，因為美國製造的都很貴，所以她們會去非常遠的地方，如果還不夠便宜，就會到更便宜的地方，這不是Wal-Mart的專利，如果去看美國任何超市的生鮮區，可以發現所有的香蕉沒有一根是在美國長的，也許是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或哪裡有一塊，豆的話，其實是開始做鳳梨的公司，可是現在也可以賣到很多的地方（omitted）。如果再看自然資源的話，橡膠、可可都有類似的問題。只是說，大家在享受便宜東西的同時，沒有想到背後這些東西是怎麼來或從哪裡來。

這兩個暑假我都拜訪了德國，到超市買東西，比方買魚排，除了魚肉之外，其餘的骨頭的部分，德國人都不要，包裝上面會標示這個魚是從哪裡打撈的，其實吃魚是件奢侈的事情，聯合國有報告，在2040年就沒有魚了，不是只沒有魚可吃，而是原生的魚都沒有了，都是養殖的，看了那個產地標示之後，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哪來的，因為標示上寫的是在南半球的那裡，我想了很久還是不知道那是哪裡，到人家告訴我那是哪裡的時候，我們就能想像現在我們已經把資源耗竭到了一個什麼地步。最好笑的是龍蝦，我一定要講一下，前陣子「國家地理雜誌」出了一系列，在某些海域是盛產龍蝦的，所以到了那個季節，大家就會到那裡打龍蝦，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了黑道什麼的，第一，那裡人很少，第二所有的船都在那裡等，有比較好的區或比較不好的區，幾乎都要拿槍出來對打了，為了搶龍蝦可以到這樣子，稀少到這個程度，但有人去研究這種海洋裡頭，我不曉得，有文獻，看以前所有的有賣海鮮餐廳菜單，比方說海鮮多少錢，什麼魚是多少錢，後來有些魚就沒了，可能不是快沒了，就是變得很貴了，佐證，最有趣的是她們找到了一份跟家裡奴隸簽的約，裡頭規定工作內容，其中有一個提到一個星期提供給奴隸不超過兩餐的龍蝦，多就不行，因為龍蝦太便宜了，載名在合約裡面，就可以發現當時的龍蝦有多少，而且很便宜。我不曉得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妳說越大是不是可以越賺錢？我覺得也許未必，但是我們現在說的跨國公司已經是滿地都是了，不要說Wal-Mart，看看「大潤發」就好了，如果有五十種水果，幾

乎沒有什麼是當地種植的，因為三月這個季節是不可能有蘋果的，蘋果或橘子類都是夏天，我們現在吃的這些都是透過保鮮技術，所以所有的蘋果應該都是進口的，除非是椪柑，那是非常季節性的。我不曉得說應該覺得高興，任何時候都有這種東西可以買，還是想說應該有些憂心，這個food milage這麼大，或者我應該慶幸保鮮技術這麼好，讓我一年都可以吃蘋果，蘋果一年一貨，為什麼我可以吃呢？就是因為一點一點的釋出，可以撐住一年，我還可以吃到美國華盛頓蘋果，也可以吃到澳洲的蘋果或奇異果，可是都沒有當地種的。

那我又要問，所謂的小農都到哪裡去了？小農因為產量不夠大，也沒法跟「大潤發」或「家樂福」做生意，我不曉得要怎麼做回應，我也想聽聽大家的意見。至少我今年的課裡面，有一本書是珍古德(Jane Goodall)的「用心飲食(Harvest for Hope: A Guide to Mindful Eating)」，她一生做黑猩猩保育，之後投入了環保教育，這位七十歲的老太太突然對吃的東西感覺到問題，所以，這是去年的出，我就拿來擺在我課裡的單元，讓全班都讀，大家都感到有很多的不可思議，食物裡面有多少東西可以提？我本來想是不是弄錯了，珍古德怎麼會寫這樣的書？我後來一看才知道她發現了這件事的急迫性，還不說這些基因食品，咖啡也是另一項明顯的例子，咖啡是高經濟作物，所以砍掉了所有原生的東西，而只種咖啡，如果一天喝兩杯咖啡的人，巴西、越南還是哥倫比亞，就有一個山坡上的十二棵樹被我消費掉了。大家也不知道，現在咖啡的排行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越南，另一是墨西哥，這兩個國家以前沒有種咖啡，但就是因為那是好的經濟作物。種植咖啡的方法也不可能是讓它慢慢長的林蔭法，一定是全部砍掉都種咖啡，因為比較賺錢。

咖啡的問題又是別的，因為它的生產力與消費力是非常不平均的，全世界的咖啡只生產在南北回歸線的中間，而全世界消費咖啡的地方全都在北半球，其實這樣追，不論是咖啡，或去年出版的「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我知道這個讀書會也有讀嘛！那本書講的其實是棉花。當生產與消費的地域是那麼地不平均時，就有很多問題了，我也不曉得怎麼辦，譬如.....

咖啡讓我覺得更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是僅次於石油的第二大commodity，如果我

們國際關係的人都覺得石油是了不起的東西，要把它與戰略、安全等什麼都連在一起，那我覺得咖啡也是，量也非常大，每一個環節，從耕種、栽種，一直到烘焙、收購等等，每一個階段都是寡佔，所以其實是複雜的東西，可能因為我自己念國際關係，所以看到咖啡就不覺得它是個單純的飲料。

GE等這些跨國的，手上有很多的專利，再想到AIDS，就很厲害了，因為這些疫苗只有她們有，或者很貴啊，但是，妳就要在知識與生命價值上做個選擇。

黃默：我立即的一個回應，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Can knowledge be against life?**那您會怎麼回答？

李河清：我記得前一陣子，在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健康的治理單位有說爲了生命是重要的，譬如禽流感的事也有類似的作法，不管原來各式各樣的專利或所謂的智產，但碰到**for life**緊急性命交關的時候，好像就有更高的出來說不可以...

黃默：那叫做什麼？

黃嵩立：**Compulsary liscience**

黃默：這個沒有錯。但我剛才的問題又稍微比較遠了些，就是知識有沒有可能是傷害生命的？假如傷害生命的可否稱做知識？

林正弘：沒有一種知識會傷害生命，一定是兩面的，因爲知識不是單獨的，一定是知道一些更根本的原理，然後才有這個，所以延伸出來的就很多了。不可能這種知識是有害的就將它封鎖或禁止，頂多是**information**，不大可能是**knowledge**。頂多是**information**，**knowledge**不可能哪一部份是壞的就把它封鎖起來，因爲它與其他的相關。

黃嵩立：沒錯，我不曉得您（黃默）界定的知識是什麼？譬如說來做某一種很糟糕的武器的這種知識也算，或者我們認爲智慧財產權真的很糟糕，那麼去維護智

慧財產權那個知識也是一種知識，就是說妳/你需要一種非常好的一個專業、法律團隊去幫助這個公司去維護其專利財產權，那個知識也是不得了的龐大，所以我想是很容易有不好的知識。

陳文威：老師，我們上次做了一個非常無聊的討論，聊到現在的網路真的很發達，有個現象是，就算我們可以在「維基百科」上面，或是google上面怎麼樣把PS2，一個電動玩具，改裝成一個小型炸彈，有人提供這的操作然後...

黃嵩立：應該是假的。

陳文威：不知道是不是，但就是說有這樣謠傳，我沒去查證，但就算看到了我也不懂，問題就是，這個東西顯然非常危險，又扯到與九一一的關係，即任何人都可以穿越國界去攻擊無辜的人，這樣的東西在網路上出現該不該被管制？除了這樣的問題之外，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懇認爲了安全的理由而管制，那管制的位階是否放在平台本身？由誰來管制？或就像老師剛提的，知識本身有沒有evil的知識，或有沒有good knowledge？他的立場是，什麼？

有些東西應該被管制。

我就不停的舉一些例子，比方說我們都知道製造火藥的知識，但顯然製造火藥的知識一旦被揭露了，大家也就不會覺得這樣的知識是應該要被管制的，反正最後不歡而散，沒有結論。（大家笑）因爲他是念法律的，所以我們會比較關注在政府的角色與立場去控制一些事情，到底對知識揭露的本身要不要管制？或者，知識有沒有好壞之分？是知識的本身有問題？還是使用者的問題？

黃默：我想剛才林正弘老師的回應，有兩個部分可以解答我的問題，假如我們能區隔知識和information，那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或者若能區隔知識本身與知識如何去用(the use of knowledge)，那麼一個程度也可以幫我們解圍。但是，我剛才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想看看大家...

林正弘：知識累積而且不相關，從這些知識再建立一些知識，以這些知識為基礎還會發展什麼知識？以後不知道。以後發展出來的不一定是壞的知識，所以，在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其中是有一些可以做壞事的，我們把它停掉，會不會傷害整個知識的發展？比方說做原子彈和愛因斯坦有關係，那可以把它停掉嗎？很多武器是根據物理學的基本原理做出來的，整個發展，我們無法預測會看到哪些？

黃默：這我同意。

林正弘：所以，如何去界定說哪一個部分是不好的，然後將不好的，把它封鎖起來，只有少數能夠知道，大部分人無法知道，有沒有可能這樣做？有可能，但後果是怎樣？

陳文威：我有個直覺，再看了Discovery介紹二戰之後發展生化武器，美國是最先發難的，從戰爭的演變來看，好像很多知識、科學上的發展都扣緊了軍事用途，所以，這樣會否陷入一個套套邏輯，到底是知識帶動武器的革新？亦或是人類爲了某種目的去發展知識？那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又如何能區區知識的好與壞？或說如何在用途上的管制？

林正弘：使用上的管制不會傷害知識，但妳說的，知識一出現可能製造的東西是不好的，然後管制這些知識本身或information，這對知識的發展可能是一種傷害，可是，這可以回到更根本的問題是說，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的知識嗎？只是爲了知識的發展，就可以容忍那個所發生的害處？我常常在想說我們人類會不會把上帝的...太多了，原子能也知道、DNA也知道，什麼都知道，那原本是上帝特意不讓我們知道的。（大家笑）

陳文威：老師，我沒那麼樂觀，我覺得我們知道的還非常少耶。

黃斐新：知識會不會就像刀一樣，有很多用途，也有人拿來殺其他人，所以我想知識不怎麼能區分好壞，要端看人如何去選用知識還有，那影響是好或壞。

陳文威：假設我是美國政府，我命令一群科學家發明如炭疽病毒或是用兔瘟（二戰時使用的病菌），理由是爲了打贏戰爭，這樣的知識有沒有善惡的分別？

黃默：我想在很多情況可以假設一群科學家是不願意去發展這個武器的，妳看到了後來核子武器的發明也是一樣，引起很多的省思，在我們當前當然就是DNA的問題，也引起很多討論。我想這裡又牽涉到學術群與科學群，這裡就很難去有一個明確的回答，是嗎？美國的科學家，或歐洲到美國的科學家當時都想因爲納粹可能就將發明原子彈，所以去參加這樣的一個競爭，這裡有帶出好些問題來了，我也沒有答案。

林正弘：(記錄注：略，不清楚)

黃默：沒錯，在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看來在醫學方面，是不是也是這樣的？

黃嵩立：剛才妳提到爲什麼賺錢就不對？或者，大爲什麼就不好？跨國公司與neighbourhood company有個很大的不一樣是，看不到勞動者，譬如說，像賣香煙的大公司，若我們把國家的GDP排行起來，再將前三大煙商，她們的GDP排行大概是在全世界的二十名左右，即比世界上的一百八十個國家都要來得大，我們只看到一包包的香菸，看不到勞動者，這是在跨國公司裡才能看得到的，若是一般家庭旁的小混混的話，妳會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當他被包裝成那樣的時候，那個經營團隊的人好像不負責道德義務，因爲他被公司指派的工作就是去賺錢，有一個道德的危機是，好像這個公司是沒有人的，因爲股東都分散了，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股東，我也不管誰在管這家公司，我只等著分紅就好，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當她們把工人壓榨到一個程度，我們根本都不知道。關於Wal-Mart我看過一本書，也不只壓榨工人，他對美國公司的小生產商，記得蠻清楚的，PREGO的小黃瓜，Wal-Mart以一罐25元買下，決定要接下的時候，就被壓低價格到20元，要不要做？所有的生意都切給Wal-Mart了，雖然成本是19塊半，但是他要20塊，還是得拼命做出來，書裡面還描述了非常多這種不仁性的壓榨來撐起整個王國。不只製造者，就連販賣東西的人也是變得在一個非常不仁性的工作環境裡，工作內容永遠是上架，結帳的永遠結帳，這對人類的生活其實是很糟糕的。

有一個簡單的研究，是在Volvo做的，大家都知道在裝配線上工作是煩到底的事情，每天就只做一種工作，不單對身體健康不好，連身體都會開始發生問題，所以她們將工廠的幾個生產線打散，就是去把車子組好就對了，另外一種則是每個人只打螺絲丁的那種，結果發現，自己去組裝的那群人身體都變得比較健康，她們會覺得說對於工作有某種控制權，所以我在描述整個結構從廠長到下面掃地的人的分工狀態，是非常不仁性的。所以我會覺得會賺錢有賺錢的方法，但是這個方法對我們整個生活有太大的影響了。作為一個快樂的消費者，大家可以不用管這個，但怎麼樣讓消費者知道這些事情是抵制Wal-Mart這整個事情會不會成功的關鍵，因為消費者就是會去省那兩塊錢，也就是這樣的心態讓Wal-Mart可以成功，除非消費者願意去做多一點的選擇，要不這個癌就會一直蔓延。

黃默：我們時間看來已經到了。

(八) 2008/04/18 The End of Poverty: Ch10, 12, 13, 16

黃默（主持人）：我們來做一個討論決定今天要報告多少章？是由哪位來報告？今天人比較少，我們可以做一個調整。您（黃嵩立）的看法是如何？

黃嵩立：我覺得.....，我可以導讀一下，然後請她（楊雅琪）報告一章，其他的部分就由我自己來補充，把這本書講完。

黃默：那我們就開始了。

黃嵩立（導讀）：這個書已經翻譯成中文「終結貧窮」，能翻譯成中文也代表該書受到一定程度華人的關切。作者從發展的角度來問問題，為什麼貧富的國家差距這麼大、為什麼有些國家是這樣地貧窮？他提出"poverty trap(貧窮陷阱)做為解答。作者假設窮人如果沒有受到協助，是不可能走出第一步的，他形容發展就像一部階梯，這些人需要別人的幫助爬上發展的第一階，才有可能繼續往上爬。為什麼有些人必須為貧困掙扎？用「貧窮陷阱」的概念，作者提出很多的解釋。首先，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事物都是有折損的，如土地若不耕種，就會折損；蓋了馬路，沒有維修也會折損；工廠也是，都會折損。第二，非洲的疾病，這是來自作者親臨非洲時的切身觀察，原先作者並不是那麼地在意。第三個原因，因為許多非洲國家地處內陸，非洲是世界上擁有如此多內陸國的大陸，地理上也沒有海港或大河，僅有尼羅河，大部分的人終其一身無法與外界接觸，從近代來看，富國發展崛起的原因常是因與外界的貿易接觸。所以作者認為這些活在「貧窮陷阱」中的人是難以自拔的處境，所以大國應該給予援助。他進而檢視美國對於這些國家的協助到底有多少？直接跳到第十六章裡提到的數據：為了說服許多人投入援助，因為贊助者經常質疑援助並沒有帶來改變，而他的回應是其實我們所提供的援助是很少的，根據他的統計，2002年美國提供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平均給予受援助國人民僅3美元，在一人3美元的援助中還得扣掉支付美國的顧問費，以及food and other emergency aid（緊急救援，包括水旱災）、行政費用，還要拿來還債，金援成了利息支付，總計每個非洲人其實只能得到六毛錢的補助，也就是說美國給予的援助其實只有百分之五是實際給予了非洲人。因此以這樣的

規模，當然看不出援助的成績，也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即是投入更大規模的援助，越大越好。現在有錢的社會比過去更有錢了，因此能做到以前所無法執行的援助計畫，而援助的金額最好有270億美元，差不多僅佔OECD國家一年GDP的千分之一。他認為以前西方國家從未這麼有錢，而只要千分之一就可以解救非洲國家，和樂而不為？這是整本書的出發點。

書中花了很多篇幅來描述應當如何幫助非洲人？譬如疾病要怎麼處理？以「千禧年村莊計畫」為例，作者詳細描在一個完全沒有資源的村莊應當如何測量援助該村所需要的經費總額，如專業醫療與教育人員的增聘等，再用計算好的經費乘以一千倍即表示援助所需的規模。其後的章節則是有關如何獲取援助以及援助行動的規劃等問題，而且作者也在這方面付出了相當的貢獻，他建立了**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全球對抗愛滋病、肺結核與瘧疾基金會)，說服WHO與美國的高層政策官員，用這個基金來幫助非洲國家對抗非洲的三大疾病：愛滋病、肺結核與瘧疾。我想他是一個劍及履及的人，我的瞭解是的確有不少國家從這裡申請經費執行一些疾病的治療計畫。

上述是整本書大致的架構。作者的立論看來沒有什麼問題，但這本書的確給他帶來了一些批評，下週我們要讀的書（**The Wite Man's Burden**）也是在批評他的。包括第一，援助從來沒有成功過，在歷史上，不成功的援助案例較多，譬如貸款給這些國家進行建設工作，最後不但建設成功，反而使窮國又欠了一大筆債務。在第一、二章裡作者所強調的現代國家之富裕程度，很容易被批評是老生常談，好比五十年前的人也曾持過類似捨我其誰的時代想法，到頭來都沒有成功過。第二種批評來自自由上而下的"planner(「計畫者」)"的作法，「計畫者」經常以優秀的姿態為非洲國家開處方，但這不是民主的作法，被批評為忽略強化當地解決問題的能力，反而造成當地國更仰賴外援，在Stiglitz一書中也提到自然資源的詛咒，同樣地，在援助上，也可能發生「援助的詛咒 (aid course)」，使得非洲政府更積極地去爭取援助。第三點被批評的在於作者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大規模的解決方案。其他的批評，如書寫該書時似乎忽略了歷史的記憶，把西方人想得一派天真；就非洲觀點而言，西方國家一直是掠奪資源的角色，非洲國家甚或認為當今仍舊處於後殖民時代，怎能期待西方的大善心，也因此被認為許多重要的議

題，如貿易、國際協商等問題都未出現在著作的討論中，我也覺得這是Sachs最致命的部分。

我認為這本書還是有貢獻，因為他提出了對非洲問題的共識。另外，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例來說，非洲一年有三百萬人死於肺炎，書裡的研究指出，這是因為在廚房工作，長期暴露在濃煙底下的工作環境，因此，他也在「千禧年村莊計畫」中提出改善廚房空氣品質的方法，如裝通風設備、用煤換太陽能鍋子等，採用實際具體的作法來改善。但缺點可能是過度簡化了非洲的問題，比如作者認為非洲各政府的腐敗問題並沒有太關鍵，他比較持著腐敗與貧窮是共生的想法，相較於其他同等貧窮的國家，如東普寨，非洲政府的腐敗情形可能也未那麼差。我覺得他有點想要簡化問題來引導大家同意他的大規模援助論點所以，這也使他落入推論上的陷阱。這大概是我對這本書瞭解的情況。

黃默：非常謝謝。看看大家對這個部分有什麼問題，請先提出來。

劉恒君：您說Sachs認為非洲政府的腐敗問題並不是那麼嚴重的，而且貧窮與腐敗是共生的關係，我覺得Stiglitz也有這類的立場，但他似乎就沒怎麼陷入論證的陷阱中，我也比較能夠接受Stiglitz談的方式。我覺得這兩位，不論是以此做為證據或論證的角度，他們都有類似的觀點來說服國際投入更多的援助。那是否是您所說的必然的論證陷阱，我是有點遲疑的。

黃嵩立：我覺得這個數據要端看如何使用，我記得Stiglitz的用法是，既然腐敗與貧窮的共生關係是如此，那麼我們應當增加的是管理上的監督，可是Sachs雖然用同樣的數據，但卻是想要以此來說服大家不要把政府的腐敗看做是那樣嚴重的一件事情，或當成不去援助的藉口。我覺得這麼說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還是得審慎地思考援助與政治腐敗之間存在相互強化關係的這項事實，而且更不應該迴避腐敗的問題。

黃默：Stiglitz非常強調民主的決策，一個程度也把民主的決策看做是核心的問題？那Sachs會怎麼看(民主)？

黃嵩立：作者好像沒有特別強調決策過程與民主這一點。像我剛才講的，作者以世界銀行 (World Bank)、Consparency International、Freedom House等評比報告來看這些國家的好與不好，但我覺得他有點把這些問題應付過去。

楊雅琪：這個作者是經濟學家，似乎也想要用模型與數據來解釋，但沒有社會脈絡或歷史背景。

黃嵩立：因為援助是外來的，所以有時也被認為是侵略的，是西方國家硬要強加於其他國家的。最糟糕的例子可以算是IMF過去推動的structural adjustment，要求接受援助的國家一定要開放市場，很多的援助的確都是帶有條件的援助，而且常與地區脈絡有所脫節。

黃默：一下子可能不會有結論。但我們怎麼看民主決策與貧窮發展之間的關係？我印象Stiglitz也說得容易，但做起來難得不得了。

黃嵩立：援助難免會看到腐敗，NGO或許認為避開中央政府是最好的作法，因為經常最糟糕的問題都出在政府，還不如直接與地方政府裡頭願意做事的人合作反而比較有效地執行任務。但長久而言，我不覺得這樣做一定有好處，若幫助地方政府固然使得「增加識字率」，進而可能帶出監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想提供援助的人應當要非常意識到援助是否已經與某個決策階層掛勾，使得新的不民主的決策因應而生，我想這也是很容易發生的。

李仰桓：最後我沒有聽清楚，為什麼又會養成新的不民主決策？

黃嵩立：因為提供援助的決策可以說不是在非洲當地進行，我的一個非洲朋友告訴我她的國家政府在巴黎，譬如一個國家的GDP某個程度是依靠前殖民母國，如法國，那麼這個做決策的機構比較關心的就是法國政府的想法，而不是她的選民怎麼想，所以我說這會造成一種不民主的決策過程。

黃默：對。您所說的與援助是和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比較好的問題是否關係比較

少？因為不論是透過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都會有同樣的問題。

黃嵩立：對，但是中央政府特別地困難，因為有些人去觀察到那些直接給了行政院的援助資金，到了衛生部門的時候就只剩下百分之七十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就在過程中不見了，所以我覺得當權力越集中的時候，……（記錄注：聽不清楚）。

黃怡碧：我不是很同意民主與經濟發展沒什麼關係這樣的說法。我們都瞭解到政治對於經濟或發展能有正向的監督作用，但是這個觀察的時間向度要拉到多長才能有一個有效的檢驗？

黃默：這當然也是一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讓我一下子想到了Samuel Huntington最早的成名著作"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討論民主政治的形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二、三十年，認為民主的發展需要秩序的建立，因此受到的批評就是Huntington只看二、三十年的時序，假若將時間更拉長，看來結果就會不一樣。所以，我想那是個問題的面向。您提到了另外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作者將human rights(人權)與mass killing(大規模的屠殺)分開來看，僅認為民主政治有助於人權的發展與減少大規模屠殺的可能性，但對經濟的發展似乎不那麼地密切，我想作者也沒有很詳盡的說明，似乎就是這麼地在書本中提了一下，是不是？

黃嵩立：作者列了一個表，把不民主的國家放在一邊，等於在給國家排序，然後對照其各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相互有個遞減的關係，結果好像沒有這個地相關，所以作者也就沒有再多去解釋了，只說兩者的關係不那麼地清楚。在書的前面提到，現今的非洲國家有不少已經邁向民主了，所以不應當再以不民主作為不援助非洲國家的藉口。他應當小心他忽略了進一步去討論極權與援助之間的關係。

黃默：還有哪位有什麼問題？

何嵩婷：剛剛講的好像是由富國直接援助窮國，那有沒有可能讓富國的NGO去援助，會不會減少問題？

黃嵩立：是的，NGO好像比較對等一點。但問題是如何去？在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投入的金錢，這樣的金錢是很難用NGO的工作模式來做，而且這樣問題的規模是無法慢慢耕耘的。那問題就變成我們是要慢慢地培養NGO，還是我們就像作者說的一下子就把錢投入。

李仰桓：請問您提到作者設立的Global Fund(全球基金)發揮了什麼樣的效果？

黃嵩立：Global Fund是一個給錢的單位。這裡也有遭到一些批評，就是說這樣的基金會消滅既有組織，比如說WHO，依建制是主管健康的機構，可是作者會倡議既然WHO功能不彰，也沒有什麼錢，所以我們另外搞一個組織，大家把錢捐給我們來專案處理結核病、愛滋病等問題，所以結構上就顯得有些疊床架屋了，譬如說，實際的狀況就是有好多的單位在負責愛滋病的問題。

全球基金的實際運作方是就是募得各國企業的捐款，然後去找一些專家來組成一個審議委員會審核申請捐助的民間組織，機構必須是在當地有多種團體加入，具備政府、WHO或國外的專業顧問等，以計畫審議的方式進行。

黃默：多少資源？

黃嵩立：一個project(計畫)大概有幾百萬美金，不少。所以整個基金是數十億美元的規模，相較WHO一年的資金不過十幾、二十億吧，大多花在人事費上，業務費很少。

黃怡碧：我覺得WHO是個政府間的組織，合作對向是政府，然而Global Fund似乎給了自己清楚的定位--funding agency，所以我不覺得它會強勢地去主導一個國家的疾病防制或預防的政策，反而比較像是撥款的一個單位。

黃嵩立：對啊，但是在國際上本來就是power comes to money (記錄譯：有錢就有權)，這個本來被期待作為國際協調的WHO，其機制似乎在消退。雖然Global

Fund沒有意思要去取代WHO，不過捐款一直來，就更有理有不去理會WHO，逐漸也成爲一個沒有權力的國際組織。

黃默：你（黃嵩立）擔心這會影響WHO或這些官方機構的權威或影響力嗎？

黃嵩立：WHO理論上是一個決策機構，在過去提出來的一些活動，成立以來，政績最好的項目是抑制天花的擴散，救了幾千萬的生命。但後來提倡的，如 **primary health care**(基本健康照護)或是現在的煙害防治或慢性病防治都只是對於政策上的建議，但沒有什麼執行力量，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爲很窮，**Global Fund**成立以後，大家更不願意捐錢給WHO了，WHO的基金只夠維持本身運作而已。

黃默：我想到的是**Soros Foundation--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看來就和**Sachs**的**Global Fund**有異曲同工之妙，是不是這樣？

黃嵩立：**Global Fund**還會接受國家的捐款，所以不大像一個**private foundation**(私人基金會)，還算一個國際、由多個國家公認的、公開的基金會。

黃默：關於這章還有沒有想提出問題？如果沒有，就請您（楊雅琪）開始報告。

楊雅琪（報告人）：我報告第十三章。作者提到終止貧窮如同踏上發展的階梯，極端貧窮的國家或人民缺乏援助走上第一個台階，是因爲缺乏六項主要的**capital**(資本)：(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1. **human capital**(人力資本)：如健康與營養來源、生產的技能
2. **bussiness capital** (企業資本)：如機器、設備與交通運輸
3. 基礎建設：如道路、電能、水或公共衛生類等，又如通訊系統
4. **natural capital** (自然資本)：如可耕地，健康的土及生物的多樣性
5. **public institutional capital**記錄譯：(公共制度資本)：如司法系統、政府可提供的服務
6. **knowledge capital** (智慧資產)，如科學與科技使用

作者要來探討如何打破這些貧窮的困境。看到圖，第一個圖，資本累積的最主要運作機制是（從左手邊看到的）**household income**，政府將稅收（往箭頭的右邊）當成資金不斷累積時，同時帶動家庭的資金。（看右手邊）爲了要使整個機制得以運作，家庭儲蓄與政府應該保持平衡，（請大家看到第二個圖），所謂的”trap(困境)”指的是：當家庭收入只能維持生計而無法納稅或儲蓄時，人口成長與貶值繼續造成資本額下降，經濟無法發展使得貧窮困境陷入循環。圖三表示，藉由外來的援助，如ODA，幫助累積資本與促使經濟成長與家庭收入的過程。

外援有三種方式：一，在家庭收入方面，如緊急危難時，可提供食物；其二，大部分提供的資金是用作公共建設；其三，部分給予私人，如農夫，可以幫助額外的發展，如私人產業。外來的援助若能夠持續，資本的儲存就可以拉起家庭收入，使其超過日常所需，稅收跟著累積，就會打破貧窮困境，回到圖一的正常運作。

作者想以數據來說明，在困境中如何增進家庭收入，設計許多的數字來證明這個模型。

作者又認爲貧窮的困境，若失去ODA這類的外援，不論政府多麼努力，都會徒勞無功，因爲赤貧無法維持生活與累積政府的資金。

我個人的看法是，作者的模型是相當樂觀的。ODA提供的資金要來打破困境，我覺得這只是「給魚吃」的作法，認爲時間一久，人們自然能學會「烤魚」或「煮魚」。雖然作者想透過精心設計的數字證明，但現實中我們是否能如此？

回到主題，假設政府成功協議到一億元的外援，又是否能投入基礎建設？作者認爲這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問題在於，各國政府對於施政的優先順序不同，必須能找出適當的分工，看到圖四，政府的資助主要有五種：**investment**（投資），（看到右手邊）政府的資助在下方，私營的部分有三種，有時候，政府會直接資助私營，如幫助窮人發展新技術、小型企業的經營或新興工業，政府應該固守基礎建設，將高度專業化的投資交給私營部分，理由有五：

1. 主要的基礎建設，如電力、道路交通，具有利益回饋，私人可能將利益壟斷，而對使用者索取高價。由政府管理，列為基礎建設，訂定合理的價格。
2. 政府提供資助給非競爭性產物，如單一個人使用，不會減損，如科學發現DNA，就經濟效益言，每個人都可以使用這項知識，不應索取費用。誰願意投入這樣的產業？作者認為由政府資助最有幫助。
3. 政府扮演人類社會福祉的重要角色，如教育、**natural capital**，舉例而言，私人營運造成的污染，如伐木或過渡捕魚對環境的傷害，政府應該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來保護這些自然資源。
4. 舉凡人類生活品質上的照顧、醫療、飲水是有關正義，而非形式的保障而已，國際法等有關的權利保障規定。
5. 政府協助提供社會投資與基礎建設，也要投入生產性的投資。政府幫助窮人提升貧困家庭的收入超過消費必須量，並開始累積收入時，就能逐漸撤回投資。但是作者認為除了赤貧的人之外，政府不需提供給其他人。

建設不能單獨執行，而要同時考量六項資本，以促進兒童健康與減少兒童死亡率的工作來說，在**business capital**中，收入較高的家庭會裝紗門、紗窗來防治瘧疾；在**human capital**中，給予完善的營養、健康照護及家庭計畫；在基礎建設中是安全的飲水、公共衛生與醫療的緊急道路；在**natural capital**中要防治疾病的傳染媒介和對抗自然的天災（如乾旱、颱風），避免有毒物質排入空氣或水中；在**knowledge capital**中則要改善抵抗傳染病的組織程序，減少家庭能源的使用、發明新藥；在**public institutional capital**方面，公共衛生服務需要被提升。作者強調，不能只在單一面向去看，而要能整體去打破貧窮困境（**trap**）。

不論是在鄉村或都市地區，不但要增加資本額，也要促進科技或技術上的發展，如專業人員的培植：教師、醫療人員、農業推廣人員或工程師則需要妥善運用他/她們的專業技術。最後，在書的後面，作者列出了十個對抗貧窮與大幅提昇經濟成功例子。包含亞洲的綠色革命、天花的消滅、**Campaign for Child Survival**（記錄譯：改善兒童死亡計畫）、全球性疫苗結盟、對抗瘧疾、消滅小兒麻痺、推行

家庭計畫、非洲地區疾病控制。在這裡我提兩個例子說明。其一是在亞洲推動的綠色革命：因為擔心全球人口快速成長而可能引起大規模的飢荒，Rockefeller 推行高產量作物，先行在墨西哥、亞洲等地，1994 年開時在墨西哥種植小麥，透過技術培植日本品種而在產量上有新突破，墨西哥從大量進口穀物成爲出口貿易國，這項經驗移植到了後也南亞，印度的作物量成長遠超過其當時人口成長，菲律賓與秘魯也是成績斐然。另外一例是天花的消滅，天花本是高度的傳染性疾病，經使用牛痘疫苗，從 1967 年實行疫苗接種並推行到全世界，1980 年宣告免於天花的侵害。我的報告就先到這裡。

討論：

黃默：Sachs 的六項資本裡有沒有說政府的投入與資本門若有衝突應該如何解決？譬如說，投資 human capital 的健康、教育還是飲水等基礎建設，最理想當然是有這麼多的資源，但大部分的情況不是，他有什麼建議？那些有優先順序？有沒有這樣的討論？

楊雅琪：我沒有看到這樣的討論，不知道黃（嵩立）老師怎麼看？

黃默：我們能不能想到其他的資本，或我們想這六項資本其實可以合併成三個？

楊雅琪：我想有些東西是重疊的，如基礎建設與 public institutional capital 可以結合。

黃嵩立：我先講作者怎麼說，在第 251 頁提到，當一個經濟體拿到十億元時應當怎麼用？其實沒有統一的答案，作者認爲要視當下發展的強況而定，他自己沒有排出優先性。

黃默：您想有沒有可能排出一個優先順序，我的意思是即便每個國家情況不同，在亞洲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應當如何區分？

黃嵩立：我們一直在說他沒有談民主的問題，在 public institutional capital 當中有

沒有這項討論？所以他似乎如同我們所質疑的，很少去談民主或媒體自由。

吳景義：這幾個資本的目的是在檢視如何脫離貧窮，那麼有沒有針對一些成功的例子研究哪些資本的分配是比較好的？以此來預測需要多少的時間來脫離貧窮？那麼如果從來都沒有一個成功的模型能來檢視需要多少時候才能脫離貧窮的話，那作者提出的這些概念似乎一點意義都沒有。

黃嵩立：這就有點像知道我們每天需要攝取哪五大營養素，雖然不保證應該怎麼吃，但我們還是可以盡可能的攝取。

吳景義：但是關於五大營養要素還是提出了每天應該攝取多少比例才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人。

黃嵩立：我覺得這個部分他是比較有點輕輕帶過，但他認為需要給貧窮問題來個健康診斷，因為他太太是醫師，盡可能的列出一大堆可能的病症，然後對症下藥，但是我想他會排除存在某一種公式處方，他認為應該由每個國家去做診斷。

吳景義：但我想應該可以去發展一些模式，好比與特定國家運作方式有關的模式。

黃默：一個程度上，我覺得大家也都在嘗試這類的試驗，也都在做實驗，是否是理論是可能是另一個問題。但是，譬如說，談到台灣經驗，我們經常說教育制度是十分關鍵的、勞工有比較好的訓練也是等。但比例是什麼？能否那麼精準？需要嗎？我是懷疑的。

吳景義：我想談到台灣的經濟發展，十大建設是重要的基礎建設，老師認為只是教育嗎？

黃默：我不是說那個不重要，只是說若不那麼深刻分析研究，投資教育是發生了不少的作用，教育是比較基礎的，十大建設當然也是關鍵，但是過了一些時候，好像我們又得再提出其他的建設，比如現在的十二大建設。

吳景義：這不就是表示因為十大建設是成功且重要的，所以才複製了這些嗎？

黃默：您可以這麼說。不過，政客好像都得把他們的規劃簡單化，在中國還是台灣尤其明顯，很喜歡數字，一什麼、二什麼、三個不要，如「三個不要、四個要」等。

黃嵩立：我好奇好像都不會有十一或九大建設。

蔡竟予：我想讀社會科學的人習慣去觀察政治、自由與文化等範疇，但是仔細一看這本書裡面都沒有，所以我反思是否我們要求得太多了。我想看看台灣，好像也有很多都還沒做到，似乎也可以用這個模式先自我分析一下。就像我們讀 Amartya Sen，他很重視自由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如果同樣地想法來看這些資本門，如同剛才大家提出來的問題，哪些重疊或交互，都可以去分析，那麼到底作者關鍵是哪裡？

黃怡碧：Sach 是傳統經濟學者的想法，我很難想像存在一種絕對的比例，好比人力資本，有些貴一點，有些便宜點，理論上，經濟學家不會堅持每個兒童都需要去接種疫苗，因為有外部性，規模是不一樣的。可是黃默老師提出重點，哪些要先投資？但這又好像不容易。

李仰桓：簡單的問題，黃默老師問有沒有優先順序？作者的基本看法事端看每個國家的狀況，但實際上的討論主題是赤貧的國家，若以他的想像，是否其中還是有不一樣的樣貌？不過，在我們的思考中，這些窮國似乎又很像，還需要看不一樣的嗎？

黃嵩立：所以他提出來的一個方案是每個人每年需要七十元的援助，一年下來，就等於有一個套餐，假若一個十人的村莊，就能有七萬元，套餐裡就會看到有些什麼東西？比方有一輛卡車能把肥料載過來，看始種些吃的。再來，可能可已有個駐村的老師、護士。進一步，要給他一個手機，挖一口井等，花上一年，七十

美元可以做到的事。但這麼做就只能限於一個村莊，而與城市之間的道路就不可能做了，他的想法是，若人力資本與健康、營養都含括在內，就不會分開了。

黃怡碧：這也是我很受不了的地方：有了卡車，沒有路或有了手機，沒有電或基地台等。我覺得行不通。

黃嵩立：作者就認為先設法弄一筆錢，然後就能買到 A 套餐，等到他發現不夠的時候在偷偷地加價。

黃默：我同意怡碧。但也提到 Stiglitz、Amartya Sen 的想法比較接近。初步說法，是否比較接近技術人員 (technocrat)，與我們的十大建設比較近？我看我們的新政府也是這種科技官僚的路子。這樣可以帶來生活的改善與經濟的發展，但他/她們關心的項目並不是關懷人文的或提升每個人的生活自由，但科技官僚是可能帶來個人比較多的自由，但這不是她們所關心的，而是比較關心經濟成長等，是不是這樣的呢？我這樣的提問有沒有意義？

黃嵩立：作者自己曾經在書裡描述是一個技術的問題，但我現在找不到那句話。

李仰桓：不過，我覺得從剛才的報告聽來有點像總統大選的政策發表。(大家笑)

黃默：台灣當年也是走技術官僚的路子，沒錯。在五〇年代也是靠著經濟發展，總算是搭上了這班列車。

蔡竟予：如果台灣現在也是如此的話，可見就不是單純援助貧窮，而是存在一種意識型態。

黃默：直接的說法就是，大家都看到過去經濟的發展是停滯不前，又中下階層的生活也比較貧困。若以「痛苦的指數」來講，看來是在增長。妳說可能是怎麼樣的意識型態？

蔡竟予：這些"planner(「計畫者」)給我的感覺是好像是在改善我們的感覺，只是讓窮人感覺情況會好轉而已，但我們在意的發展資本是否能累積又好像很不確定了。

黃默：妳關心的窮人不一定得到幫助？

蔡竟予：對。又或許不持久。

李仰桓：但他的目標是要脫離 trap，所以只要能跳出來，作者認為接下來就能有辦法走上發展的路了。

蔡竟予：但現在我們也覺得台灣要脫離啊。這裡好像存在些迷思，是不是只在解決表面的問題？

黃怡碧：那妳是說我們現在還在脫離貧窮嗎？

蔡竟予：對啊，我們的政客都是這麼告訴我們的，而並不關心文化或生態。每個國家好像都可以宣稱要更好，只是標準不一樣，而這個模式好像在哪裡都沒有變一樣。

黃默：這裡可是需要稍微分開來一下，Sachs 談的 poverty trap(貧窮陷阱)跟台灣的情況當然有些不同。我剛才說的，政府好像都有些老習慣，我說的是政府都喜歡談一先什麼大建設等，那您提的意識型態是什麼？

蔡竟予：他一直討論結構上的病症，卻只是提出用哪些資本門去把那些問題在數字上變得比較漂亮而已，但我都沒有聽到作為主體的人民，這些被援助或計畫施行的對象會是怎麼想這些事的。

黃嵩立：我覺得很難去講絕對貧困的人會說我不想吃飽，或不唸書。但是，當然有種生活形態，譬如在泰國北部的有些人，整天都在遷徙，所以整年就在森林遊

走，沒有一個家，這些人可能不願意過固定的生活，但大部分的人應該還是會需要所謂更好的生活。

黃默：我很同意黃嵩立老師的這種說法。我們都瞭解我們的脈絡。是否有一些基本的需求，我們可以假設是普世的，而不是我們建構出來的需求？然而，當我們建立起一個大思想體系或意識型態時，少不了要使用這些材料。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我想您或許覺得非常難能想到有一個普世、而不是意識型態的，我也同意我們的需求大部分是被塑造出來的，但面對這樣絕對的貧窮，食物、醫療的缺乏，應當可以假設這是普遍、每一個人的基本需求。

吳景義：普遍的需求可能是共有的。需求有很多，順序不一定，哪個需求要先被滿足，可不可能是一樣的？

黃默：如果我們談絕對的貧窮，也可能沒那麼不一樣吧，好比我們都想食物很重要。

黃怡碧：我想基本需求好像比較沒有爭議，如食物、shelter(住屋)。

吳景義：那教育應該是擺在最後吧？

黃默：那不一定。

吳景義：對個人而言，生理上是需要的，但教育不是生理需求。

黃嵩立：如果是在農工社會，可能就沒有教育的需求，但若是一個工商社會就會出現那樣的需求。就會有需求。

吳景義：若是一個絕對貧窮的社會，那就肯定不是工商社會。

黃嵩立：可是，即便在非洲都是用手工種棉花，他/她也知道有天這是要拿去在全球市場販售的，所以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我比較難想像有些人的生活可以完全與世界的工商社會分開。

我們或許都能同意又這樣樣的基本需求，但是我們也怕，也同竟予所說的，下一步在哪裡？一旦，我們接受這些基本需求的時候，其他東西通通進來了，因為我們很難想像，當我們需要一條道路來提供肥料的運輸時，當道路建立好了，我們很不容易可以說我們除了肥料之外，不允許其他如報章雜誌等的流通，我們好似得全盤接納外面總總的花花世界，沒有建構自己、維持自己的……。

黃默：這是不是您擔心的？

蔡竟予：當我們觀察共產社會的時候，那些教條，就像老師剛才說的，的確都很厲害，比如說「超英趕美」、「全國執行一胎化」等，我覺得到最後似乎一開始以為不如食物來得重要的東西，如民主或媒體，卻反而是最重要的，人可以餓，但或許不能失去主體性或表達意見的機會，那可能才是比較痛苦的。

黃默：我本來想，宋儒有個說法：「餓死是小，失節事大。」您同意嗎？我當然不能接受。妳說？

黃怡碧：我覺得在資本的部分，可能不是這麼線性的，一定要吃飽了才會想到自己是人。我想(蔡)竟予關心的是：會不會這些都只是在改變自我感覺，如不丹？

蔡竟予：我覺得如果是在過去，我一定會很窮，比起我的父母，我以比較窮。

李仰桓：我還是覺得台灣的追求經濟，與脫貧不一樣。

黃嵩立：關於這章，還有兩個事情補充：我覺得大家都很關心的「吃魚與捕魚」，那個比喻我一直都很不喜歡，花了很久的時間才讓自己知道不喜歡的原因。「給他/她魚吃，不如教他/她釣魚」，我不高興的感覺是來自於我沒有發現有魚會沒人

去釣，我覺得大家都會去發展釣魚的概念、慾望或技能，那是自然會發展出來的，所以我不覺得需要教誰去釣魚。我認為讓他/她去吃飽、有知識，就會自己去發展出適合當地型態的。

再來補充的是作者在結尾舉了十個成功的例子，各有各的特性，我覺得是太誇張了，很多不是因為援助，如水道試驗所，與他的論證反而不大相符。

黃怡碧：至少這本書不是坐在象牙塔裡想出來的，是有很多的親身經驗。

黃嵩立：無聲的死亡，講非洲與疾病的關係，牽涉到我在導讀時的提問，為什麼有些國家仍舊陷入貧瘠？就非洲而言，疾病與健康是很重要的因素，他提到非洲，一天開會，一個同事沒來，才瞭解四十幾歲就愛滋病死亡。又從馬拉威來的學生告訴我的：HIV 為什麼導致貧窮的原因？因為大家忙著參加葬禮，而沒有時間工作，至少小學老師的 HIV 盛行率偏高，因為社會聲望因素，容易導致這種疾病。非洲的人才培養，不利於一個國家的發展，若要解決非洲的問題，要先解決疾病的問題。Sachs 想說服大家提供援助，解決疾病是一個目標，很多人不同意這樣的援助，原因譬如普遍認為是因為非洲的治理或腐敗特別多，作者覺得這樣的說法毫無道理，他舉了很多的例子來說明美國與歐洲的一些特務，是如何把一些非常好的非洲政治領袖做掉，然後換成會聽美國話的暴君，到底誰得「治理」比較差？

有或有另外一個反對援助的聲浪，認為非洲的腐敗特別高，所以作者就比較了幾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如 Ghana、Mali、Malawi 的腐敗，在世界排行是中後段，GDP 成長是負的，他說明腐敗與經濟成長也不那麼相關，好比印度的腐敗等，經濟成長卻都在成長中，所以也不應該一直指責腐敗。

又有好些事情也不用幫太多，譬如，他舉例Mauritius(模理西斯)就發展，這裡很好玩，Mauritius 的亞洲人很多，甚至還有鄭和團隊的後代，其中有一個人來到台灣探親，就發現台灣正好在發展加工出口區，回去之後就和Mauritius的總統說，結果第二年Mauritius也發展出一個加工出口區，對經濟成長也就一觸即發。

又說，非洲在傳統貿易受到很大的障礙，但是美國在2000年有個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AGOA)來幫助非洲國家的出口，降低產品關稅等等，作者認為這樣的作法是值得鼓勵的。

接著講到Malaria(瘧疾)，為什麼非洲的Malaria特別嚴重？其中的因素之一是非洲的瘧蚊只咬人不咬豬，相較於亞洲的瘧蚊，咬人也咬豬，但是瘧疾的傳染途徑一定是要咬到一個瘧疾的帶原者之後，再去咬下一個人，即必須人人相咬傳染才形成，也就是說如果人比豬被瘧蚊咬的機率是一比三，那其實瘧疾成為大規模傳染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作者認為非洲人特別倒楣，隱含這也不能怪非洲人，所以其他的國家應該，就這點來說，理論上應該要幫助非洲。

黃默：真是苦口婆心。(笑)

黃嵩立：又談到西方國家是多麼地小氣，才使得這麼多非洲人才因HIV死亡，所以作者也對於HIV的國際援助很有興趣。透過找了很多資料，令他最驚訝的是，西方世界知道愛滋病在非洲有多嚴重，一九八〇年代就知道這樣的事情了，從九〇年代就有治療愛滋病的經費進來，但是到了一九九八年整個經費僅七千四百萬美元，他覺得是不可思議的稀少，形容是"increase from nothing to nothing(好像有在增加)"，一九九〇年是兩千九百萬美元，九年來增加的比例是很低的，這也是作者苦口婆心的一部份。在其他的書裡看到，當去問美國人覺不覺得應該再增加國際援助時，美國人會回答：我們已經花了20%的GDP，為什麼還要增加？用個5%來援助也就好了。但是，美國人做的其是0.2%，所以，美國人若是認為百分之五是共識，那麼，應該可以繼續增加。

黃默：美國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一點多。

黃嵩立：對，她們一直都是百分之零點幾的，可是美國人一直以爲她們做了很多很多。如果用美國的5%GDP是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大部分的美國人不同意國際援助增加是因爲她們以爲已經用了她們20%的GDP了。我覺得從這個例

子來看很清楚，大部分人不知道國家花多少錢在做什麼事。所以，因此他找了很多人去做了這個Global Fund。

第十章有一個結論，為什麼非洲人會如此地不健康？歸結八種狀況：

HIV

瘧疾

肺結核

兒童拉肚子

肺炎

打疫苗就可解決的疾病

營養的缺乏

生小孩沒有人照顧（unsafe childbirth）

他認為這些事情對西方國家而言不是沒有技術，但是需要的是錢，每年需要兩百七十億美金，聽起來很多，但是OECD國家一年的GDP是約25兆，所以只要有千分之一來幫貧窮國家就好了。大家都知道有七分之七的承諾？所以理當大家都造著做的話，應該很容易可以解決。

吳景義：提到HIV的經費，那其他援助的經費，有否是相對的？

黃嵩立：我手裡現在沒有數據。印象中，直接用在衛生的差不多是百分之八。

十二章是A套餐的故事，肯亞一年需要十五億，也不是那麼多錢，以現在有錢國家不是問題。

蔡竟予：我們常聽到有錢人，只需要他/她的九牛一毛，但是，倒不如與有意願的善心人士合作。

黃嵩立：我們小時候，說問一個富翁。先把燈關掉。節省到了極點，沒那麼有錢的，是呼籲國家，如有錢國家的立法委員。對台灣來講，外交部做了什麼事，就

被套上金援外交，這與我們的政治動機有關，對我們來說，這件事好像很骯髒，但對北歐國家來說是很好的。

黃默：對北歐來講，還增加了形象。您想為什麼不同？

黃嵩立：因為台灣的政治角色，我們曾經支援過獨裁者，明知腐敗卻又給錢，我們做援助變得特別難。不只台灣，像其他新加坡等國家也做得很少，好像一旦有錢時，就覺得理所當然，但是，小企業就不同，一分一毫都省。

黃怡碧：這樣比較能說服為什麼我們有錢就要去幫忙？帶有道德上的義務，但我們曾被殖民，好不容易有錢，又如何說服國民我們背負這樣的義務？不論道德與否都應該投入這樣的工作？

我請問過幾年前，**Thomas Pogge**他說，有錢人是與有錢國家做生意。也就是說，我們從老美賺來，我們的錢非完完全全，若說都是壓榨來的，我們得到二手的不義之財，所以我們有義務。第二，避免不去做的理由存在。

我覺得有錢的國家，需要給予誘因是會比較好的。比如說要去說服立法委員，都是國際關係或外交的一部份。

外交部、政府說法也是要增加台灣的能見度。這也說了。

李仰桓：我覺得金援會被攻擊是因為這些錢給出去，反而沒有得到國際形象還被斷交了。

黃嵩立：因為我們曾資源過獨裁者，買武器。所以當然很不好。提供援助時，若真要幫助對方，為了買到對方的回饋又是另一種作法。每個國家的比重不同，幾個北歐的國家，還不是想幫就能幫。北歐就有清晰的指導方針。

蔡竟予：我認爲還是要盡可能地鼓吹每個國家都願意固定撥出一份經費來援助貧窮國家。在我們所讀到的許多著作或文章裡，經常去訴求一些有錢的國家是有能力負擔援助的經費，所以研究者都會盡力在揭露那個國家到底多有錢這些事情上，但這樣的揭露總來得不足夠，有時甚或被認爲不公允。美國也曾經援助過拉丁美洲國家的獨裁政權，台灣也同樣有這類親美的政府，短期好像能看到好處，但是長期的影響力要如何評估呢？假若我們都是出於人道的立場在援助所謂的地球村或世界，對於一個國家或人民而言，是不是會來得更好？而不要認爲位在世界哪一個階層的人就必定要付出什麼，因爲援助的核心價值本來就無法訴求（記錄注：富有國家或其人民），每個人的價值觀似乎都無法改變？

黃嵩立：因爲時間差不多了，我想快快將十六章說一下，我一直覺得，在台灣沒有那個政治人物願意，以一個國家之姿，關心拿出一部份的錢來捐助、協助最苦難的同胞，若有這樣一個人的話，在台灣的人們也不會一直都那麼地排斥。比如說台灣一年的GDP是十兆，換算千分之一就是一百億，千分之七就有七百億，其實這還蠻多，那我們若能有一百億，或依美國標準是兩百億，若有一個總統或任何人出來說我們一年就是應該拿兩百億來做國際救援，說不定會得到支持，但我們從未試過，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就是光明正大的想爲台灣的尊嚴作一份努力。

這章談的是關於爲什麼不願意援助的迷思。第一，很多人以爲已經給了很多錢了，但其實每個人只分到六毛錢，並不多。第二，因爲害怕失敗，常以政府的腐敗作爲不援助的理由，作者解釋，非洲的腐敗，必沒有特別糟糕，與其他相同程度的窮國比較來說。第三，有人認爲非洲是沒有民主的國家，所以援助會失敗，但他說現今的非洲已有很多國家正在民主化或已經民主化了，進一步論證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不十分明顯，因此強調我們也可以援助不民主的國家。還有一種說法是否定了非洲具有現代觀，他舉例，一個人被指定UNSAID（「美國援助總署」）的署長，那個人接受Boston Globe的訪問時表示非洲人根本連時鐘也沒看過，顯示就算要給非洲人愛滋病治療藥物，非洲人也不曉得什麼時候該吃藥。這樣的說法讓Sachs覺得太可笑了，Sachs以他自身到Kenya鄉下，並且與人約會在兩點半，結果大家都在兩點二十分時準時到了，熱烈地期待他帶領的討論，因此，作者不同亦非洲缺乏現代價值的說法。關於普遍批評非洲沒有自由的經濟政

策，除了政治自由之外，經濟自由也很重要。但他又以圖表顯示經濟自由與GDP之間沒有那麼重要的關係，即使非洲國家沒有經濟自由，但只要受到援助，經濟還是會成長。也有人說非洲人沒有士氣、很懶散。舉例，日本人曾被西方學者預測說會窮到底，出於日本人懶散的個性，但這也可能是種主觀的判斷，我們習慣認為窮人懶，進而反證懶所以窮。有些人害怕非洲人那麼窮，死了死更好，少生點小孩，少一點窮人，他又舉例，出生率與經濟成長呈現反比，收入越高，出生率自然降低，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窮小孩了。還有一種說法，因為國際貿易會帶來trickle down效果，自然水漲床高，作者同意這句話，但認為此法並不適用於內陸國.....（大家笑），因為非洲許多國家無法與國外貿易，所以不依靠援助還是不行的。有些人是完全地自由主義的、保守的，認為一個國家的GDP不要太高，若花在非洲政府的支出佔整體GDP太高是不好的，可是他說美國政府的支出佔百分之三十，可是為什麼只反對非洲卻沒有反對美國呢？差不多就是這樣了，上述是作者認為有關援助的迷思，都應該解除。

黃默：大家有什麼問題？我們還有幾分鐘？

黃怡碧：Jeffrey Sachs是否認為援助都不應有條件？

黃嵩立：對，他自己也不喜歡，在前面幾章提到好幾次擔任經濟顧問的經驗，提到在Bolivia（波利維亞）提出的建議就是不要還錢，因為這個國家每年編很多的預算去還國際負債。

黃怡碧：可是比方說今年（2008）的奧運，我認為抵制奧運能讓中國正視問題，所以附帶條件是真的不好嗎？

黃默：我想這個問題可能下次再回來談。非常貧窮的國家一定得接受國際上大量的援助才能脫離困境，但能否與另外一個情況作一個對照？比方說，有些非常極權的國家，改變她們是需要外力的，如戰爭，在戰爭中戰敗了，極權的體制才能轉變過來，又如日本、德國、阿根廷等，這兩者（記錄注：非常貧窮與非常極權的國家）能否對照？

進而我們可以討論外國涉入或國際干預的問題，我看當前的趨勢是朝向允許一個程度的國際干預，再不能用一個主權國家的說法來抵擋所有的責難，當前的中國政府也因此受到很多批評，她們對西藏問題的處理是非常差的，表現非常頑固的想法，不論是奧運或Darfur(達佛)都往國際干預的方向在發展，只是干預的程度在哪裡還沒有共識。您看盧安達和東普寨的例子，我想可能犧牲了幾百個聯合國的部隊，就可能不需要東普寨的一個大屠殺，應該是可以被預防的；盧安達也一樣。這樣有回應您的問題嗎？

蔡竟予：我聽到您講到犧牲，就覺得恐怖。我想無法寫成書去推廣，因為要犧牲，就沒有辦法說出口。

黃默：不是說不出口，而是對好些人來講是不願意接受的，可是在理論層次上是可以探討，而且在平時（與談人後注：好些情況，如車禍、天災）經常沒有什麼目的就死了很多人，這不也是被犧牲了嗎？妳（蔡竟予）的問題使我現在想起來為什麼要放棄我的生命來保護大家？Rousseau(盧梭)說：我們在一個生命有保障的環境裡，是因為有好些人都犧牲了他/她們的生命來抵抗外來的侵略，因為有好些人犧牲，所以我們也有義務去做同樣的是情，又假設機制是公平的，假設大家都應該去服兵役。這是盧梭的說法，妳可以不同意。

黃默（主持人）：下一次，我們讀 *The White Man's Burden* 第三（楊雅琪）、四（再找人）、五（吳景義）章。下次聚會是五月九日。

(九) 2008/05/09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黃嵩立 (導讀人)：好像今天出席的與上次的人都不一樣，其實，今天讀的這個與上次看到的Jeffrey Sachs的*The End of Poverty*，這兩本書其實是對照著來讀的，因為，他們倆人的觀點非常不同，兩個人都是經濟學家，Jeffrey Sachs過去在哈佛大學，現在在哥倫比亞大學，他扮演過相當多的政府與聯合國的經濟顧問角色，所以，Sachs提出的經濟觀點就認為，既然許多國家是如此的窮困，因此他提出的解藥是，作為有錢的國家，好像沒有任何的理由不去提供給這些貧窮國家協助，因此，Sachs就在上次我們讀的書裡十分強調一點，我們現在的經濟力量比起以往大很多，只要我們這一代下定決心，就可以永遠地終結貧窮。他提出關於有些人為什麼會無法自拔於貧窮的原因，一般我們假設一個人只要有機會都會努力地往上爬，所有的經濟都在成長，這也是人類有史以來一直努力的目標，那唯一的例外，是在非洲，所以他問非洲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他提出的一種解釋叫做“poverty trap (貧窮陷阱)”，有人被貧困的生活所綁住了，所以，不將他/她們解救出來，就永遠沒法發展。這世上次讀書回讀的，他說了很多的理由，還有很多理論的背景為什麼援助會成功。今天要讀的經濟學家叫做William Easterly，也在世界銀行工作了很久，他非常不喜歡Sachs的論點，不喜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他認為西方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來已經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以他的說法，援助的金額已累計了二兆美元之多，但是，幾乎沒有看到什麼成效，尤其是經濟成長，因此，我們必須先檢討這項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很大的business的得失效率在哪裡？他覺得若沒有進一步的檢討，而只是一股腦的鼓勵更多的投注，他懷疑這對被援助的國家到底是好與不好？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被援助的國家反而情形每況愈下？

楊雅琪：因為錢被政府吃掉了？

黃嵩立：對。援助的資金是直接給予了政府，反而強化了政府的腐敗。再來，當一個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是依靠外援的時候，她幾乎可以不向人民收稅，理當不需對其政策負責 (accountability)，也就是不用向人民負責，因為她直接要應付的

是給予援助的捐贈國。另外一個缺失在於，援助經常是帶有條件的（conditionality），捐贈國會開出許多的方案作為援助的條件，這些條件訂出來並不總是對接受國有好處，譬如說，世界銀行經常要求接受國必須進行結構調整，等一下我們還會針對此討論很多，在之前我們讀過Stiglitz的那本書中也談到所謂結構性調整的壞處，而壞處之一就是，譬如，將企業民營化的調整，這項調整本身就帶出了許多副作用；或者要求接受國的農產品必須從糧食性作物轉而種植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例如放棄種植玉米，而轉種其他煙草之類的，因為煙草的價格較高，所以當這些國家接受援助之後，且進行這些結構調整之後，經常弱化了國家整個體質。簡言之，援助並非如此地單純，也非永遠能對接受援助的國家有助益，這就是Easterly對於援助這項概念的整個質疑。

另外一點他不喜歡的是那些西方的"planner(「計畫者」)"，作者對驕傲自大的西方"planner"的優越心態感到不悅，而且整個決策是非常不民主的，認為這麼做無法做出滿足當地需求的政策。而他也用"searcher(「搜尋者」)"一詞，來對照表現出西方自大的"planner"，作者提出援助需要循序漸進地展開，「搜尋者」能夠面對務實的問題、尋求分析與解答，根據答案來一步步地突破問題，而不是一種類似終結貧窮的夢想，只是一股熱情，但最後好像什麼人也沒救到，那何不我們務實地說，我們就是要把小學給弄好，或至少這些人有乾淨的環境得以居住.....。所以，作者認為我們應該以「搜尋者」的這種心態來幫助比較窮困的國家，一個個地解決問題，不要抱著一個崇高的期待，到最終卻沒有一個可測量的結果，也就是說什麼是終結貧窮？難道是這些的國家的經濟必須翻兩番，可是，根據過去的經驗，用很多的資源，卻看不到所謂的經濟成果，那何以Sachs能說出我們能終結貧窮的話？可是我們上次在談Sachs的那本書時，好像也沒有讀得非常的憤慨，所以，就是說Sachs的整個說法，好像也有他對的地方，那對的地方就是說真的有些國家是需要援助的，然後我們也看到只是說，用那樣的心態去改變別人，就是會失敗，即你可以做得到，但注定會失敗，這樣的一個衝突，就是今天這本書所要討論的。

Easterly跟Sachs之間的想法是如此地不同，所以也表現在這兩人的寫作上，Sachs的風格看來就是四平八穩，事情的步驟十分地明確；可是Easterly寫來就是大量地

舉例，寫作的風格與作者本人好像也蠻相似的，他用了很多在實際的例子裡，比方說婦女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去賣她的木材，那她到底要怎麼辦？跟在身邊的小女孩為什麼沒又沒去上學？就是跟著媽媽在扛等等生動的在地經驗，所以並不像Sachs這樣，一直推銷他的理論。

我想我們就開始來讀，先請黃（默）老師開始。

黃默（報告人）：我想在一個程度，這樣的一個爭論，也反應了當代的大.....。剛才談的Jeffrey Sachs，他最為人稱道的一件事就是去當俄國解體時，去當俄國政府的經濟顧問，強調用「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來改革蘇聯的經濟體制，也帶來了非常大的傷害，因此，他的這個“shock therapy”就受到很多的批評，不僅Easterly不喜歡他，Stiglitz也不喜歡他。

接續我剛剛想說的，如果談到「計畫者」，也就是設法推動一個相當龐大的計畫，還是說，另外一種，那是一個從細節來改善貧窮國家的人民生活，這兩者之間的思辯也反映了當代的思潮，而當代的思潮是對所謂的大計劃持有懷疑的態度。

我現在報告的是第四章，作者談的是西方國家對外的援助與政治的關係，如果我沒有錯，第三章談的就是與市場的關係。我的報告很簡單，我不一段段地來讀。

「計畫者」和這些大型的計畫，在好些人看來就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計畫，企圖一下子將事情做一結構上的改變，若從思想家來，一下子我們能想到好多人，（蔡竟予今天沒有到，不然我就會挑撥她一下，因為我們一下子就會想到馬克思是這類的代表性人物。說到「計畫者」，作者談的也是西方的援助國家的政府（donor）、IMF，也是世界銀行，與此相對的是作者所提的“gangsters（流氓）”，即指獨裁專制國家的統治者。他想談的就是西方的援助計畫，包括「世界銀行」、IMF與政治的關係，尤其是跟民主政治的關係。

他開宗明義，於第一百十五頁說道，看來好多人的直觀都認為問題是出在政治。也就是，我們要如何看待壞政府（bad government）？他指出當前有有兩派的看法，在第二段：“Planners opt for one of two Camps about bad government(對壞的

政府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美國政府及世界銀行的看法，這些貧窮國家的政府表現得十分壞，西方國家應該強迫她們做改變，才給她們援助。但是很多時候，「計畫者」與捐贈國也沒有做到符合這樣的想法，好些國家的政府依舊腐化、貪污，但是每年卻得到非常多的援助。然而，理應來說，我們對於這些壞政府應該要有比較堅定強硬的立場。

另外一個想法，作者指出，UN與Sachs，在第一百一十五頁，持另外一種看法，認為這些政府並非如此地壞，只是太貧窮了，所以我們應當給予援助，這也是剛剛黃嵩立老師說的，而且我們也有能力去援助她們，所以也應該有自由來決定自己國家內的發展策略。

作者提到 (P.116) 問題出在政治，也就是是否民主的問題。第二段：“The theme of this chapter is similar to the last one on free market: democracy works , but imposing democracy from the outside doesn't.”也就是說，民主政治是能幫助經濟發展的，也能將一部份的問題解決掉，但是困難的地方在於要如何建構民主的政府。作者認為這並非外國能夠干涉或協助的，而是要從國家本身的內部開始改革才能建立起民主的政治。我覺得這裡談到的很有趣，他說最早西方是強調自由市場的改革，也就是要求貧窮國家的市場開放，但是在計畫失敗之後，所以在九〇年代後的作法則是轉而改變國家的體制，協助這些國家建立good institution(好的制度)，怎麼樣把bad government轉變成good government，這也就是作者所謂的“white man's burden (白人的負擔)”。這裡實在是作者主要的論點。

作者承認民主政治的確是可行的制度，保障了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這些都很有幫助，譬如在我們讀Amartya Sen的時候，談到飢餓的問題，認為一個民主的、受言論監督的政府，就不能不去想辦法解決飢荒的問題，就不可能放任幾十萬或幾百萬的人民受到自然災害的威脅。雖然民主政治帶來了不少“public goods”，譬如說建設公路、有乾淨的自來水或建立學校，但是如何帶來民主的政府，就變得非常的困難。再來，他用了不少的篇幅來談，在一個程度，假若從一百十九頁開始，也就是說民主政治有這麼多的作用，但是民主政府也有其問題，這頁的第一句話，我覺得很值得我們注意，“Democracy is a bottom-up system that rewards local,

specialized knowledge in a similar way to free markets"，作者強調民主政治是由下而上，這樣的一個政治上的規劃是能鼓勵對於當地、細節上的知識，用來解決問題的，這也就回到了作者說的，「計畫者(planner)」都是空降來的政策者，來自外地，對當地的情況一點都不瞭解，卻帶著一種既定式的想法。這段話，也可以看出作者的選擇。

進一步，有好多頁來解釋為什麼民主政治即便實行了，還是有問題。這裡他想表達的就是，他也並非天真地，他也瞭解到民主的自身缺陷與限制，我們也能或多或少的瞭解，所以我不一一的說明，譬如說在第一百九十頁，他談到的"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多數暴政)"，我考你們一下，誰談這個最多？最有名的在十九世紀，你/妳們這些政治系的。什麼人到美國去考察美國的政治，結果說了這樣的話？

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在1850年代被派到美國去考察美國的監獄，結果就寫了 *Democracy in America*，後來對什麼人很有影響呢？譬如說John Stuart Mill深受影響，在談*On Liberty*當中援引的就是這樣的想法。"tyranny of the majority"說的就是一個民主政治其多數與少數是屬於不同的兩個族群，很可能使得多數去壓迫少數的族群，透過民主的辦法來壓迫，那這樣怎麼辦呢？作者回答，民主政治也是無解。比如一個族群分裂的社會，這樣的問題就非常難纏。在後來，作者也提到，當代的憲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是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因此談到當前的美國，在第一百二十頁，他談到.....，在2004年的選舉，他用the red states與blue states，你/妳們在哪本書也看到這樣的討論法？就是在Dworkin的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也是。什麼是red/blue state?這是當時美國電視的報導，將選共和黨的那幾個州用紅顏色表示、選民主黨的則用藍顏色表示，所以沿用這樣的命名。我讀這段給大家聽，非常有意思，看來作者也又這樣的想法，這不但是政治上的分裂，看來在文化、宗教上也是一種分裂，所以這些人都很關係那麼美國的政治應該怎麼辦。"For example, the r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d a slight majority in the 2004 election, migh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rom now on consisted of god-fearing gun owners rather than married gay couples having abortions."瞭解嗎？很有意思吧？！這當然是一個偏

見，不是每個地方都如此，也不見得每個德州人都是"god-fearing gun owner";當然，在紐約也不是每個人都"married gay couples having abortion."，下面一句話是好玩的，他說，" So they could pass and electoral reform that denied citizens of blue states the right to vote. Then the majority of the most zealous remaining voters could vote to disenfranchise a less-zealous minority. So now the electorate is down to a little over 25 percent of the citizens. This could keep going indefinitely, until only television evangelists were voting."假若2004年他們就做這樣的決定，譬如說，如果不是憲法保障，他/她們就可以通過一個法令，將blue state的那些公民的投票權都廢掉。妳們會怎麼翻譯？（黃）斐新？

黃斐新：如果照這個情況繼續下去，最後會去投票的只剩下那些宗教者？

黃默：比較狂熱的會剝奪比較不狂熱的投票者，最後有投票權的只剩下那些在電視節目當中講道的人。這當然有些開玩笑，但他的意思是表達民主政治的危機。

除了多數暴政之外，也有貪污、腐敗（corruption）的問題。也有"aid curse"，即「援助的詛咒」，這是相較於"resources curse（「資源的詛咒」）而來，這個詞現在很常用，是說一個國家有非常豐富的資源，但是政治非常的腐化、不民主，要如何解讀這樣一個詭譎的現象，讀Stilitz，他有很詳盡的解釋，我不多說。這裡談道的是「援助的詛咒」，剛才黃嵩立老師也提到了，也就是指，假若一個國家得到很多的外援，並不竟然能幫助民主的發展，反而可能帶來傷害，因為這些統治者不需要對公民負責任，也不用幫公民做什麼事情，只消外援能源源不斷的來，就能夠維持她們的地位。在非洲這是非常普遍的。援助多了並不全然有利於民主的發展。不管是資源或是援助，反而不見得有利民主。

我不一個個地說他提出的許多民主政治的難題，上述的幾個是比較好玩的。再來，就提到外援，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看來一開始時IMF與世界銀行堅持外援必須透過政府，這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帶出了作者的核心論點--"bad government"，外援似乎甩不掉這些壞政府，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瞭解政府已經出了很多問題，但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得透過這些專制、腐化的政府來進行外援，

或將資源交由這些政府。第一百三十二頁：壞政府都是有幾百年的歷史背景造成的，從這裡也可看出作者對有些拉丁美洲、非洲國家的歷史非常地瞭解，如玻利維亞及海地等。世界銀行與 IMF的original charter就決定了只有透過政府才能接受援助，但是這些政府的壞習慣都是幾百年來延續下來的，如何能輕易地改變她們，更何況西方國家對這些政府也不是都那麼地瞭解的，關於這點，作者更進一步地整理出這些腐化的政府在什麼時候得到了多少的援助的資料。又美國政府經常因為戰略上的需要去援助許多專制的政府，同時，他也很關心世界銀行與 IMF是如何撰寫報告的，指的就是文字上的扭曲；第一百三十八頁提到：本來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計畫」是以三級分來評比國家的表現，分別是"strong"、"fair"、"weak"，但是在評核喀麥隆（Cameroon）的時候，卻被評分的專人以一個新的評價；"weak but improving"來表達，這也使我們聯想到所謂的"doubled talk"，應該是George O'well的話，指的也就是語言的扭曲，同樣地，這個新的評價其實是一個空話，那種表現應該是要放在「不及格」的。

我大概就說到這裡。當然，作者也同意在某些領域上是有進步的，這些進步也是很具體的、落實的計畫，譬如小學教育、女性兒童就學的比率上升等，但他對「計畫者」是非常不能認同的。我就報告到這裡。

討論：

鄭雯如：作者提到"planner"與"searcher"是全然的對立的嗎？兩者的關係是如何互動？

黃嵩立：作者也沒有說清楚「搜尋者」是誰？但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是在第六頁的解釋："planner determines what to supply and searcher finds out what is in demand"，所以，看來"planner"是屬於供給的一方，而"searcher"是比較站在客戶的角度在想事情的。在第五章裡面提到，即使在世界銀行這類的組織裡頭的人員還是可以很努力地去解決事情，也就能被當作searcher，也並非認為世界銀行中的人都是不好的。

您剛才說的的確是一個結構上的、內在的矛盾，那些"planner"似乎一定得唱高

調，才要得到資源，但作者仍舊不能苟同這樣的作法，因為這是惡性循環，為什麼一定得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才能獲得資源，不能直接說我需要能蓋好一條道路錢，而要說改變世界才能要到錢。比較好的情況應該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她擅長的援助能力，比如瑞典能夠蓋馬路，那麼那個國家的馬路沒有蓋好，我們很快就能明白是誰該負責任；又譬如瑞典去協助盧安達（Rwanda），那麼我們就能夠根據盧安達的好與壞來評價瑞典。而作者感到疑惑的情形就如同發生在台灣的事情，為什麼以台灣一個小國，卻要去援助二十到三十個國家，結果每個國家都只能分到一點點的錢，一個國家裡面有許多來自不同地區的組織，卻不瞭解誰做了什麼。

黃默：作者有沒有提到台灣？

黃崑立：完全沒有。但這好像就是政治上的一種陋習，希望聽到漂亮的規劃，才是好的政治語言。

黃默：您這麼一問，我就想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Kingdom of God）」，哪些是他認為屬於上帝之城的成員呢？這是開玩笑的，天主教？不說不說。

"planner"可能還不是指那些政客，作者想譴責的對象應該是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或IMF中的的官僚吧！？"searcher既可以在當地的人，也可以是藏在世界銀行或IMF的人，是不是？

黃崑立：對。

鄭雯如：那麼這兩者的關係是不是有點.....。"searcher"的概念看來比較清楚，但"planner"本身是不是.....，也就是說要如何使得planner能符合老師說言的假設，要不然，外援是不是就沒有用了？作者是不是較傾向參與式民主，將錢給予一個接受援助的國家，然後讓當地的人自己來決定自己的發展嗎？但是，這樣會不會就失去了比較宏觀的方向？我的意思是我們好像不得不有一個比較大的計畫，才能.....。

黃嵩立：這有點像一個漏斗式外援的過程，上面有很多資源，有很多人要做事情，但是也得經過最狹窄的地方，使得資源無法順利下流，那狹窄的地方就是一國的中央政府。設法給予一國外援，都需要透過這幾個人來審核，這些人天天在審核與寫報告，所以也沒力氣與時間去瞭解實際的狀況，因此，作者認為這樣的作法是注定會失敗的。因此，這章作者也問為什麼一定得經過中央政府？如果大家都要經過中央政府，哪麼勢必得有一種協調工作（coordination），世界銀行從1990之後也經常提起協調，但據他的觀察，協調功能從來沒有出現過，理論上，有那麼多人要來幫忙，如果大家都可以作自己會做的事情，那就是最好的情況，可是，大家好像偏愛分攤責任（share responsibility），即大家都來做同一件事，所以做不出來的時候，就不曉得誰沒有做好，他認為現在就像有個內生的情況要大家都不知道誰做的好不好。

黃怡碧：能不能請老師再解釋一下關於協調工作，是指的援助國或是接受援助的國家？

黃嵩立：需要協調的通常是援助國，譬如那些都想在某一個相同的國家進行援助工作的援助國們。（黃）怡碧或許能講一些柬埔寨（Cambodia）的經驗。有時候反而會使某一個接受援助的國家出現四分五裂狀況，好比接受國有二十個省分，其中三個國家透過英國的NGOs工作，另外四個省又是給了荷蘭的什麼機構，我聽說過一個很離譜的例子，有個國家的教科書是委由不同的國家分別來編制、印刷、分發，結果是印好的教科書沒有學生看得懂，甚至是本地的教育部人員也不瞭解內容，因為內容可能都來自早已經過時的資料，又因為是外國人印的，所以也沒發現。所以，我會覺得雖然完全跳過接受國政府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經過中央政府，就必然會有一個瓶頸，我也不清楚該如何做比較好。

黃默：您能不能想起是這是那個國家的教科書例子？

黃嵩立：阿富汗吧！？好像。

黃默：(黃) 怡碧，您願不願意分享一下在東南亞的(援助工作)經驗？或者您剛才也提到的有關coordination(協調)的事情？

黃怡碧：我不很確定這種代理人的理論是否適切，多數是用在企業，雇主如何使得勞動力增加生產。我覺得在這裡似乎不見得能這樣去分析，就算援助能當成一項business(企業)，可是畢竟不是一所公司，我反而期盼聽到政治學上的解釋。

黃默：您提的是哪一個理論？

鄭雯如：作者在第五章裡頭講的"principle"與"agent"之間的關係。爲什麼沒有效率的原因，在政治學的理性學派裡，也很喜歡用這樣的經濟學理論，讓課責性顯而易見，當測量的績效越明顯的時候，就能改善效率的問題。

黃怡碧：回到援助到底應該怎麼做的問題上，記得當初剛到柬普寨的時候，回想起我花了太多的力氣去要求政府同意我們的協助，並且能夠認知到作這樣的援助還得花一筆不少的錢去打通很多非援助本身的事情上面，這也會讓我很想迴避政府。但是，直到聽說某些很離譜的案例之後，也開始反省這樣迴避政府是否就真能對人民比較好，舉一、兩個例子，一位陽明的學生跟著某教會團體到非洲做愛滋病的衛生教育，他/她們是直接到一個村落發給愛滋村民醫療包，但卻發現患者都沒有吃藥。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因爲不曉得是否有其他國家的援助團體也進行著同樣的工作，也就是同一位村民手上可能同時有好幾個藥包，但卻不知到該吃哪一個。

另外一個案例是我們工作的小學，我們想解決學童營養不良的，尤其是寄生蟲的問題，這是一個簡單的工作，透過打針，再給一些鐵劑的營養補給就可以了，所以，我們去詢問校長學校有沒有做過類似的工作，得到的答案竟然是經常有團體拿藥來給學校，已經到了學校都不曉得吃了多少的藥。若我們今天願意忍受官僚，透過一個省政府，至少還能去追蹤藥物的補給，我會覺得是有幫助的。許多援助團體因爲有其特殊的任務(mandate)，想很有效率的去執行使命，卻忽略了在迴避官僚之後的影響。這麼一來，解決的辦法是什麼？而且，若不透過政府，

各憑本事，又誰來負責或補救？

黃嵩立：其實作者沒有講得很清楚，就像我剛才解釋的一樣，他認為有一個明確的計畫提出來，如改善一國的交通系統而且能做到持續維護的工作，這樣就是一個完美的工作了。

鄭雯如：除了當地之外，超過這些範圍或層次是否就不能做了？還是就不去處理？如何協調"planner"與"searcher"之間？

黃嵩立：我想到一個好玩的事，Jeffrey Sachs被他嘲笑是最糟糕的"planner"，可是Sachs提出來的計畫竟然是"village project"，從一個個的村莊著手工作，而不是"planner"的作法，也就是說似乎即便是一個「計畫者」，在實際運作的時候，還是會選擇一個大小適當、可操作的單位來執行。剛才（鄭）雯如的問題就是有關於操作的規模，什麼樣的計畫(project)適合什麼樣的規模？或在怎麼樣的決策層次去做？可能也必須因情況而異，譬如說印教科書，顯然是可做的等等。我想有很多事情是可以以國家的單位來衡量，使得某個援助國能願意援助一個完整的計畫，可是現在一般的實踐方式都不是這樣的，而是有好幾個國家都在一起做同樣的事情。

黃默：我想這與國家與國家的版圖大小有關、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複雜，如中國。如果透過北京，有很多問題，不經過北京也有問題，您要如何選擇？最近有幾個來自清華大學的訪問學者談到在中國做扶貧計畫，到了隴西的貧窮鄉村，他/她們沒有透過中央的管道，我不怎麼瞭解，當然可能因為是在國內，所以能這麼做，那麼如果換做是一外國的團隊，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麼中國與柬普寨，這兩個國家的大小又如此地不一樣.....，在柬普寨是不是什麼事都一定要透過政府？

黃怡碧：應該都是需要的。很多仰賴外援的國家事實上感覺起來是特別有制度的，怎麼樣的人才能夠進行援助工作，以柬普寨為例，首先必須先到柬國的外交

部登錄並獲得許可，這表示加入當地的援助團隊，也必須負起與其他援助團體的協調責任，可能是有定期的聚會或其他。

黃默：妳們也是這樣嗎？

黃怡碧：我們沒有（笑）。因為聽說這需要花上一年半載的時間，而且要一路地打通關。

黃默：這幾天的報紙上，緬甸在那樣的情況下（記錄注：指2008年4月的風災）還堅持這些援助都要經過政府，到了今天才比較放寬。看來獨裁的國家都是如此？民主國家會不會比較好？

黃嵩立：有一本書，名為"**Women in Kabul**"（記錄注：修正為"**Kabul in Winter**(中譯：誰殺了喀布爾的女人--美國女記者在阿富汗的現場直擊)，提了一個美國的援助團體想幫教育當地婦女，但是這些援助國的人開始覺得很憤慨，因為中央政府根本就是非常沙文主義的，因為存在這些偏見，所以援助的資源無法有效的運用在本來的婦女教育計畫中，甚至反而被利用成打壓婦女的力量。我剛才提到的教科書例子也正是如此。

黃怡碧：不透過政府也讓我思考分配正義的問題。"searcher"好像一定得是當地人。作者回答的應該是如何才能明瞭當地人的需求？作為外地人如何發覺這些需求呢？兩者的界線在哪裡？巴西的參與式民主是以教育的方式來訓練當地人，這些人算不算是"searcher"？

黃怡碧：我覺得「牛隻判斷法」很準。我們時在缺乏足夠的資訊，政府總是有優先施政的對象，但對於NGO而言，沒有義務去幫忙最需要幫助的族群，在什麼時間可以獲得什麼等問題？

黃默：這些有資源的、西方的捐贈國，大多是坐在辦公室裡做"planning"的，這些就是"planner"，我想世界銀行或IMF都是。那麼，若我沒有錯的話，作者所說

的"searcher"既可以在IMF或世界銀行的，但也可以是當地人，基本的關鍵就是要有瞭解當地需求的知識（local specialized knowledge）。

鄭雯如：如何讓"planner"更能更貼近"searcher"概念的制度是什麼？是不是有人往這樣的方向去努力？有沒有什麼方式能把這兩者拉近？Stiglitz有其明確的想法，那麼作者有沒有呢？

黃嵩立：沒有簡單的解決之道。我想我們還是趕緊進入下一則報告。

楊雅琪（報告人）：什麼是我們不能設計一個市場的因素？由下而上的市場，西方以為用自由市場就可以帶來經濟的發展，實際卻忽略了兩個因素，西方的發展有其制度上的條件、最低收入的社會無法有效率的執行。

要適應當地文化、而非能透過外來者。蘇俄與拉美，在第六十一頁說道："shock therapy（「震撼療法」）"被證明是失敗的，作者認為這是由於由上而下的推動。

IMF與World Bank藉由援助的資金提出開放市場的條件，從第六十六至六十七頁的表格66-67可以看出，借出的貸款對該國的經濟成長的成效並不好。

黃嵩立：左邊是國家的名稱、中間是得到貸款的次數，這個表格要表示的是得到多數貸款次數的國家，並沒有帶來經濟的發展，反而通貨膨脹的程度還很高。

第七十至七十一頁的圖表示，美國認為越開放、自由，則經濟的成長越好，但是對照到右邊的圖，在1980之後的經濟成長卻是停滯的，所以，並非自由市場總是適合每個國家。

楊雅琪：第七十二頁提到自由市場如何由上而下形成？Adam Smith認為：人們不是因為經濟繁榮而做生意，而是為了生產。整個市場的帶動是一種非預期性的結果。舉做菜為例，因為製作一樣菜是需要許多樣的原料，因此人們需要市場，而無法自己一項項去獲得，所以市場是帶來效率的，也正因為是人們所需要的，才

有了市場。

第七十七頁談到貧窮國家要如何發展市場？一個是自發性、另一是來自外國的援助。而且市場的發展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條件，比如說，欺騙是嚴重傷害市場的因素，因此爲了要避免這種情況，市場會設立一種懲罰的制度。

第七十九頁在說明市場是如何形成？市場的根本是要誠信(**trust**)，什麼是誠信？作者認爲，誠信是指對一個陌生人的信心，不論是契約或其他形式的，都必須建立在雙方的誠信之上。第八十一頁有一個問卷表格，從左邊開始是信任量表，這個表顯示所得越低，信任越差;所得越高，信任越高。

即使由專門機構來保障，但無法適用在貧窮國家，她們不像一個公司，反而是像跳蚤市場。所以，無法投訴。而訴訟的成本還比買賣來得昂貴，所以會形成私下的團體，相互規範，例如，西非州有一個團體便建立起相互規範，或不成文的規範，或與同種族夥伴同家族的人做生意、或拿對方財產來抵押。

第八十四頁：市場的網絡

信賴某一種族做的某種行業，叫做"ethnic specialization"，比如肯亞 (Kenya)相信 Luo族賣的魚最新鮮，所以只跟這個種族的漁夫買魚，但是，若商業網絡都被集中在少數族群就很可能會被多數族群仇視，例如猶太人被仇視。

如何保護自己的財產及所有權的問題？在貧窮的地區是尤其重要的，因爲這裡有武器的問題，進而會造成互相的競爭，大家都買武器，這也就是掠奪者的平衡，這個「囚犯困境」是不能藉由武器來解決的，生產才能解決問題。如何生產，開始可以說是由社會規範而來，後來逐發展出自衛隊的組織，後又有幫派及互助會的產生。幫派與互助會在相搶的例子，因而存在企業與黑道之間的關係，西方國家也就是從這些機轉逐漸走到法治的社會。

國家要正常運作是需要所有權的觀念來累積財富，以能投資商業，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作者再次強調，這不應該是由上而下，而應該是由下而上的形成。

關於土地的所有權在第九十一頁談到。在貧窮的地區土地所有權是如何定義的？人們不願意花錢做土地登記，因此多用非官方或口頭上的約定，如公共牧場，大家都可以帶自己的牲畜去放牧，但若遇到佔便宜的人該如何？所以就有長者輪流放牧去管理，避免欺騙，這是由下而上推動的，由下面的人根據需求，或者事先的口頭約定，之後才成為法定制度。這樣的約定所發展起來的經濟模式因為實際上不可靠，所以才又由政府來執行，但基礎還是由下而上的。

西歐對東歐的破產法轉移，這也是其中一個作者用來說明由上而下之市場失敗的例子。

第九十八頁說道：**common law**是優於**civil law**。

Top down的改革是指要一次改革所有的事情，但這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在第一百頁作者認為：

1.因為私下交易的存在，實際情況多會是由下而上，而由上而下就出現了兩種平行的系統，因而相互抵銷。

2.因為太窮無法支付這些費用，而拿土地借貸之後，又賣給其他人，缺乏了官方的手續，使得情況變得很複雜。

3.改革是要強化存有的作法，而非全面的抵銷，不應該以西方的去套用在固有的不同文化上。

4.自由市場依賴由下而上的運作，而這就是**Planner**無法瞭解的領域。

(第一百零二頁)為什麼人們在極度貧窮的情況仍為生命掙扎，但是國家卻停滯不前？這在第四章有詳細解答。新科技引進 (p.104) 的影響，作者舉例一位住在剛果河的漁夫如何運用手機，這就是科技與當地文化的結合。

(p.106) 人們如何從貧窮走出來？

黃默：第五章留到下一次。

鄭雯如：因為市場所以信賴還是因為信賴所以有市場？比如說信賴在中國的意義卻不大一樣，許多例子是完全與西方不一樣的。

黃默：在傳統，中國的企業界是非常強調誠信。

鄭雯如：但中國與西方的誠信意涵是不大一樣的，相互有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在民族研究的觀念上。

黃默：與外國做生意，十九世紀的企業家是非常強調誠信的，這與Fukuyama與social capital有什麼不一樣嗎？

黃嵩立：這裡說的是對陌生人的信賴。

楊雅琪：我不懂在第七十五頁所謂對金融市場帶來的好處。

黃嵩立：在成熟的資本社會必須借錢，才能有更大規模的生產，這是對照以物易物的交易。南美有位經濟學家認為，雖然有房子但是若不能拿來抵押，就無法換得資本來做大一點的工作，這就是financial market的意思，所以必須有一個程度的誠信，才能借貸。

楊雅琪：這與外援有麼關係？

黃嵩立：外國的資金可以進來投資當地的銀行，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提到，外國資金對本國的金融危機。我想這個地方並非在鼓勵外國資金的進入，而是關注於個人資本的建立。

黃默：他談了很多事情，問題是怎麼把這些都串連起來、整合？不然好像這裡談一些，那裡也談一些，很分散，讀起來也比較費力似的。

黃嵩立：我想他拋出了很多問題，他十分擅長提出實際的狀況，以及詮釋對這些政策的案例。

黃默：Amartya Sen批評他對有些分析十分出色，但不能同意他完全沒有計畫的論調。他寫的文章就以"The Man without a Plan"為名。

"planner"在很多時候也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讀了這本多本書之後，最後都是在問應該怎麼辦？Amartya Sen 算不錯了，Joseph Stiglitz 也是，Sachs的蘇俄經驗不曉得讓他挨了多少罵？再來就是Easterly。還有一位Martin Wolf寫*Why Globalisation Works?*要與Stiglitz的對話，我也讀了，因為早寫有個學生寫了一個報告，Stiglitz批評Wolf拋出許多統計數據，但是好像天馬行空，討論不到實際的問題，這位Martin也是來自世界銀行。

黃嵩立：經濟學家常說：「事情總是會變好的」

(十) 2008/05/30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主持人：黃默

黃默：在最後一次我們討論One World這本書，我想是一個非常恰當的結束。下學期我們仍在計畫中，但是，名單都已經出來了。因為我們錯過了經費提出的時間，所以，還需要再想想其他辦法。今天由林正弘老師來導讀。在此之前，先請上次未前來的吳景義先生報告The White Men's Burden的第五章。

吳景義(報告人)：由於上次重感冒，先行向大家道歉。這章討論的核心是外來援助系統對貧窮地區的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就是官僚體系。該書的論點以為，白人有市場的負擔，而窮人有官僚的問題。以瞭解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尋找可能替代方案的途徑進行。(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以下記錄僅就與會者發問或討論的內容)

黃默：您為什麼翻成「一群人」？這裡的committee，我想這裡是談的是"bureaucracy (官僚體系)"，所以"a committee"應該可以當作「一個委員會」。如果是「一群人」，應該是要用"a group"之類的，而不會用"a committee"。

吳景義：謝謝老師。就改翻成「一個具有權力的委員會」。

討論：

黃默：謝謝。大家有什麼問題？我想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我有個問題。您（李仰桓）先說。

李仰桓：我有個簡單的問題，請問「搜尋者」是指什麼？

黃默：我的問題同他（李仰桓）一樣。我想問您（吳景義）與黃嵩立老師二位，能否替我們整理出關於書中提到的幾個名稱，有「計畫者」、「管理者」、「搜尋者」，

如果我沒錯的話，「搜尋者」是用了"searcher"一字;還有「委任者」、「代理者」，這些個有沒有或可不可能重疊，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又能否提出一個援助的實例，將這些actors(行動者)的角色澄清一下？

吳景義：我嘗試回答。在書中的第一章，作者就對「計畫者」與「搜尋者」下了定義。雖然我只看了後面這一章，但從文中的脈絡來看，我認為「計畫者」，是在西方富有國家進行援助規劃的人，尤其是意見的提供者;那...

黃默：您說的不是「委任者」嗎？對不起，我不應該騷擾您的發言。不過，看來這些政壇人物都是委託的人吧？！比較不是您說的「計畫者」。

吳景義：我覺得「計畫者」在這裡應該是擬訂計畫的一群人，雖然具有專業背景，但沒有實際參與的經驗，來自受到政府委託的人。「搜尋者」則是較能真實去面對貧窮人民的人。

黃默：(「搜尋者」)這些是什麼人？我想仰桓與我都在追究。因為作者在書的一開始，對「搜尋者」的期望很大，希望能有好的表現，所以那是哪些人？黃怡碧是不是「搜尋者」？您看，她點頭。

黃嵩立：Planner (「計畫者」)是遠在天邊替他人擬訂計畫的人，如USAID (「美國國際開發署」)、World Bank (「世界銀行」)、IMF (「國際貨幣組織」)，其辦公室可能在紐約或什麼的，就在這些地方想(開發中國家)是否應該開放經濟制度等事。而作者比較相信的是受到整個組織委託行事的人。假設是同一個國家，我們習慣想像以人民作為主題，委託政府來進行某些事情，但是在跨國的想像中，問題是在"Agent(「委任者」)"的身上，也就是他們應該服務的對象是誰？可能是馬拉威的人民，但是，委託這件事的人可能是美國人，因為他拿的是美國的稅金辦公，使得美國的人民成了「委託者」，反過來，Agent要去達成的是美國人的期待，而不是(馬拉威)被援助國的期待。也就因此產生了權責不完全呼應的問題。

關於「搜尋者」的問題是在於跨國的援助計畫不同於國內的援助計畫，後者較可

以得到feedback（反饋），如受到準確的評估，但評估卻經常要不分析得不好，要不就沒有人去讀。從援助的機構似乎一直以來都呼喊著同樣的口號，同樣的需求，比如說必須有多點的合作，但十幾年的結果似乎都沒有學得教訓。我也經常提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偏遠地方蓋醫院的觀念，如同我討厭的一句話：「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那樣的觀念似乎是在說，我們把醫院蓋好就走了，其他人就自己得學會「釣魚」，可是，這會使得持續執行一些無用的建設，也就是feedback不好，更使得對整個貧窮世界的「援助工業」呈現組織學習能力的缺乏。

回到整個貧窮世界的發展來看，「援助」是一項龐大的industry（工業），一年的經費是600~700億，錢很多。與fair trade（公平貿易）的關係估計將會大於上述的數字。另外一項是debt（負債），統計顯示，窮國的負債情況約3兆美金，所以平均每天還10億美金的欠款。相較於貿易與負債來看，援助的錢也就顯得沒那麼多。可是，即便如此，每年仍是有6、7百億的錢，如果援助工作作得夠好的話，可以對很多人產生幫助，如前兩星期我們在Jeffery Sach的書中看到，雖然大家不那麼喜歡他，但他讓我們看到，去援助一個偏遠的非洲村落，一年若有100美金就可做得到，所以用實際一年的經費去除以這個概算，援助工作每年應該可以幫到幾百、甚或幾千萬人，而五十年下來，早就該做完了。_但是，因為bureaucracy的緣故，所以，結果異常的差勁。

最近一本書，被譯作「CIA：罪與罰的六十年（Legacy of Ashes）」，讀後的心得就是會感到特別地不信任官僚系統，譬如書裡描述杜魯門總統，或說艾森豪，為什麼決定轟炸印尼，只不過是CIA中的三個人，提供了假情資，覺得蘇卡諾是親共產的人，卻不理會印尼大使館內的當地駐派人員對共產份子活動的駁斥。再將這件事與USAID在做的事情相比較，似乎援助就是富有國家用來粉飾門面，一方面，提出施捨公平貿易的條件，卻又不停的討債，另一方面，派人暗殺總統，卻再給予涓滴的援助。整體看來，除非體制看來更民主，具有更多的參與與監督，否則，「援助事業（aid bussiness）」顯得非常沒有效率，尤其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發展援助)，比起一些民間組織更脫離常軌，更沒有效率，裡面還提到有回扣的現象，好似我給100元的援助，接受國必須購買我的車子之類的，同再把錢拿回來。所以，我不是那麼樂觀。

黃默：在這個體系當中，「搜尋者」幾乎是不容易存活，是嗎？那麼，作者在這本書中關於「搜尋者」的期盼，對其理論的建樹是什麼？

黃嵩立：假設去援助馬拉威，在思考如何協助是最好的，是否促使馬拉威政府提出類似十年計畫的方案是必要的？目前實際的作法確實如此，尤其R.S.B.P (Red Shirt Black Pants，一項脫離貧困的策略報告) 要求提出以正式的企畫報告來獲取經費，但是，作者認為，經費的提撥方式應是直接給予特定地區的執行者，如商人或小規模的團體，能針對培訓當地師資、解決農地問題等，而不是將經費交由政府，不論是美國或馬拉威政府來管理。使得第一線的工作者能直接使用資源，也由於這樣形式的工作內容小，目標清楚，因而容易對成效評估，這是作者所認為比較好的作法。

黃默：對，這個部分爭議不大。試問，從哪裡去找出這些「搜尋者」？

李河清：有沒有可能是當地的intereste consolidate(利益團體)，譬如當地的NGO？或是紅十字會？

黃默：應該是。我想到的是，向黃怡碧這樣的人，她到東普寨去，晃啊晃地，發現了一個村落，然後計畫於是展開。您（黃怡碧）想您是不是「搜尋者」？

黃怡碧：我比較懷疑的是，假設有一千個「搜尋者」，那麼會帶出什麼結論？可以帶來更多的成效嗎？對於個別的「搜尋者」而言，短暫的確有看得見的成效，然而，即便每次這些個別的工作都反映了當地的需求，如建立數個模範小學，但經費的來源仍舊受到阻礙，因此，能否將成功的經驗複製，仍就是困難的。再者，假若個別的計畫都是相當程度地適切各個特地區域，那麼，我們也應該思考這類計畫的「外推性」，亦即這樣的經驗是否較不易被複製。我認為，越是能夠回應當地的需求似乎其擴散性或者其他的說法，反而是一種trade off（交換，權衡利弊得失的選擇）。所以，我懷疑作者這樣的提出會不會是另一個烏托邦的想法。

黃嵩立：我覺得即便有很多的「搜尋者」團結起來，也無法解決許多結構性的問題，譬如暴君的統治，或不正義的制度。而這類的問題，或許可以透過教育，尤其是經過幾個世代的努力，而非僅就「搜尋者」的努力可達成。

黃怡碧：我想各地的需求可能是相互衝突的，所以每個代理者之間所代表的需求也是衝突的，這因此是我們需要一個能平衡「搜尋者」之間的協調者，或一個政府的原因。

李河清：您的意思是說，假若「搜尋者」的集體是diversed(多元的)，則需要一個最後的仲裁者來conclude(整理)各種利益，但這個仲裁者卻隱含結構性的困難，是嗎？

吳景義：作者認為目前缺乏由下到上的組織行為。雖然我認為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的反饋行為應該是互存的，但是投注的資源在目前來說是不均衡的。

黃默：您們二位有什麼問題嗎？假若沒有的話，就是您（林正弘）的時間了。

林正弘老師(導讀人)：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本書， *One World*。我將第一章的要點簡略的介紹，從裡面去談兩個要點。第六章的內容十分少。。之後，我們就進入氣候（第二章）與主權（第五章）的內容。

作者，Peter Singer是一位極出名的倫理學者，大有名的書就是*Animal Rights*，這本書的中譯者再翻譯工作完成後，開始吃素，既非是宗教，也非健康的理由，而是出自於道德因素，拒絕吃動物。我還記得另一位研究知識論的美國學者，曾經批評基於道德理由的素食者是不懂食物鏈的人，因為在這個世界上，若動物不吃動物，會造成食物鏈的終止。...（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我很簡略地對第一章及第六章做一個報告。

黃默：有什麼問題嗎？

黃崑立：我提一個小問題，關於**justification**（論證）的合理性與重要性。舉個實例而言，這也正好發生在我們學校，假設門口有野狗，去餵食野狗的人說不定提不出什麼**justification**，所以他/她會變得**unethical**（道德上的錯誤）；然而，有另外一個人可以提出一大篇為什麼不應該餵食野狗的道理，使得他/她變得比較**ethical**（道德），是這樣嗎？

林正弘：不是說合乎倫理與否，而是在探究這是否是一項倫理的行為，也就是**nonmoral**（無關乎道德的）與**immoral**（違反道德原則的）之間的區分。我在做這個行為的時候，只是個人的嗜好，比如去養一條狗，這個嗜好是無所謂好與不好的，說不定，做這件事情是好的，對行為者而言，這並非是在做一項倫理的思維或判斷。所以，並非是在說判斷一項行為的時候，有理由就是好的行為或有道德的行為；也不是說沒有理由就是不道德的行為。也就是說，若沒有想到是否符合某種倫理原則的判斷時，那就不是一種**moral action**（道德性的行為），也許只是一種嗜好而已。也許有人在街上隨便拿錢給小孩，是他/她的嗜好，這本生是好事，我們無法說那事件壞事。

而倫理是必須自覺需要理由的，這才是一個倫理的行為（**moral action**），我不是在說這是合乎倫理的（**moral**）行為，因為違背一般倫理原則，這樣的事情依舊是**不好或不對的**。

有了倫理的行為之後，我們才能說有沒有合乎倫理的原則。就好像我們說，以知識論來講，我相信一個信念，那**justification**夠不夠？理由充不充分？如果一開始沒有這樣的**justification**，就只是「相信」而已，不表示這個相信的東西是錯的，而只能說你/妳並不是在從事一次知識的活動。同理，儘管結果可能是合乎道德的，但一開始並未被認定是在從事倫理的行為，那就不是一種倫理行為（**ethical action**）。

吳景義：那如果行為者是無意識、不自主的去做一個行為，是否就不牽涉倫理範疇？

林正弘：並非說這樣的事情就不能有倫理的事情來說，而是說這個人在做的事不是一個倫理行爲（ethical action）。這個人在做的事，就如同我們剛說的，不是在從事一個知識的活動。

吳景義：是否沒有ethical或unethical的問題？

林正弘：對行爲者來說是如此。倫理的一個要素是要能夠做一個justificaiton。有沒有做好是一回事，但一定要做，這是倫理的要件。但是，這個說服的對象是誰呢？有時候說不定只是對自己講而已，我們說有良心的人，要對自己做justificaiton,總是有些聽眾，有時是一小個村落的聽眾，有時候聽眾是全世界，作者強調這項區分，是因為要說服的聽眾全世界範圍已經改變成了，所以倫理的內容就應該要有所改變。

黃嵩立：證成的程度要有多少？譬如說我覺得看到一條狗因此死掉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這樣算是一個justification嗎？還是說，必須能夠引經據典或怎樣的證成？

林正弘：不必要，您說的是牽涉到justification強度的問題。現在只是說到有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做justificaiton。至於強度問題是下個階段的問題。

黃嵩立：對，但是因為前一句話正好是說「倫理是由社會動物的行爲與感覺發展出來的」，所以我是在想「感覺」本身是否就是一種justification的形式？我們對於同一個國家的人所遭受到的傷害就比較有感受，雖然現在天涯若比鄰，但對不同國家的困境的確感受少，我覺得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像美國與墨西哥，雖然地理上如此地相近，感受卻很不同。這樣的現象反應到國際援助的問題上，就是我們不那麼能夠解釋的原因？

林正弘：書上有講，我之前沒有摘錄。我對比較親近的人比較友善、對疏遠的人則較冷漠，這可以作為一種justification理由。同樣多的錢，為什麼要先救台灣的人，而不拿去緬甸，這可以作為一種理由。所以，感情的親疏是可以作為一種「證

成」的元素。一大部分的倫理學家都認為，"feeling"確實是道德上必要考慮的因素。

黃怡碧：我覺得（林正弘）老師比較像是在講說什麼是justification;但是（黃嵩立）老師好像是在問，什麼東西可以被我們拿來當作「證成」的元素？比方說是基於「情感」、「法律」或「道德」。

林正弘：對。若一個人聲稱是在做道德行為，那這個人必須能夠證成，而強度則視個人不同。

黃默：您們open up a Pandora's box(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以您們的瞭解，我們有多少人？在多少時候？做道德的宣稱（moral statements）？有沒有這樣的研究或統計？對一般日常生活當中的人，不是專業的倫理學家而言。我這樣的問題不曉得有沒有意義？

林正弘：絕大部分的人是不會去考慮這樣的問題，而是順著習慣、順著大家覺得好的，但卻有可能是不好的事情去做。通常，當我們被問起時，總能拿出一番道理來講，知識也是如此。相信一件事，通常是已經習慣性的相信了，而非每一次的當下才去做證成。

李河清：渾渾噩噩過日子，不是嗎？（大家笑）

陳宏銘：換一個提問。第二頁的部分您提到這本書對John Rawls的質疑，「John Rawls並未將此方法普遍適用到全球各地，而只適用於某一特定社會之中」。但是，我認為作者的本意是認為John Rawls在理論層次上無法適用到全球層次，因為他的理論是用在社會或國家當中的個人，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層次。您這裡的詮釋是否會讓人誤解成John Rawls的理論無法用在每個地區？這個理論其實是在各地都可使用的，而是不能用在不同的社會之間。

林正弘：對，這是國際間之間無法使用，但並非是指不能適用於某個國家之外，例如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陳宏銘：如果我們同意是這樣的話，那我好奇的是，關於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是否真的無法以此來回應？

林正弘：作者認為即便是在Rawls之後的出版（*The Law of Peoples*（*萬民法*）），這裡作者講得不清楚。

黃默：簡單來說，John Rawls自己說他的*A Theory of Justice*（*正義論*）最關心的不是個人，而是再分析basic social structure（基本的社會結構），包括政治的、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規劃。在正義論一書中也提到不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而在*The Law of Peoples*當中就是在處理這個部分，是否很有力量，各方看法不一。

但我認為，將正義理論帶到國際社會關係或global justice（國際正義），包括全球的貧富差距，最多的應該是他的學生Thomas Pogge，也牽涉到理論上的階段性問題，Pogge也批評John Rawls的理論應用應該是兩階段的架構，而不是一次就能到位，也就是去解釋為什麼在原初狀態的個人無法一次就達到理論上的規劃，選擇一個政經代表，而需要先從國家內部的選擇出代表。

您們這裡有什麼問題沒有？

吳景義：老師您在後面有提到一個「共存的一個世界」，那人們是否瞭解他/她在世界上的位置？

林正弘：當然不知道。必須要不知道才能去做判斷。我比較懷疑的是這麼一個假設是否能運行？

黃默：「無知之幕」是理論上的道具，是爲了得到正義二原則，所以我想對於這樣的質疑似乎有待討論。

林正弘：我倒不是懷疑沒有這樣的人。而是說若有這樣的人，如何能做判斷呢？有沒有可能假設不可能爲真，但作爲推論是可以的？而且我們認爲這是有用的。

黃默：我想是有的，因此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同情這樣的推論。

李河清(報告人)：(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

討論

黃怡碧：請教高度發展核電的廢料如何處理？

李河清：先說美國，美國OTA(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一個國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評估超過十年，最後決定在全國尋找核廢的儲存場，那時候的幾個可能廠址，等到在內華達沙漠的Utah出現之後，其他的選擇性就完全消失了，很詭異的只剩下這個選項，因為在這之前，至少有另外五至六個選項。Utah到現在為止，聽說雖然許多大建設都已經做了，但離運轉還要好多年，可以看出，整個政治運轉的複雜性與困難度。Utah的好人市長也不同意，報導很多，也值得觀察。因為已經投入了龐大的成本，以後應該會在這裡，但在這之前應該還存放在各個州內。

台灣的情況低階廢料在蘭嶼，高階都存在核一、核二廠址。對台灣而言，不是要不要留的問題，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留，遲早都會被收走。

黃默：不能留，那要放去哪裡？

李河清：我相信某列強可能有意願拿走，因為這些高階廢料或許有戰略價值，或許可以做核武。中國是有趣的，我們可以再討論，對中國而言，這些廢料沒什麼了不起。但是，跟中共有別的困難，不是技術問題。像一些國家，記得蘇聯解體之前，議會通過歡迎各國送廢料來，要收錢，這比較是污染者付費。其實，調查立法院審議的質詢機密稿，我們接觸的國家還包括南北韓。雖然蘭嶼是暫時儲存，但對蘭嶼居民而言卻是永久儲存的意義，核能的整個過程似乎都不公開。

黃默：對，這裡還有很多糾紛。

李河清：而且這件事情很難為，如果送到其他台灣以外的地方，又有以鄰為壑的感覺。

林正弘：一次加州州長選舉，共和黨的核能專家說，即便是挖得很深，也不安全，結果就說不要說是在什麼地方，說了選票就沒了。

李河清：由他即便認為已經很安全了，還是一直拖著，等著半衰，也是很技術性的問題，這是很久的。而且還有發排問題，可能又要五年。

黃默：我不看好中國，因為國內的環保運度應該很快就起來了，因為問題很嚴重。民運一下子還對中國政府構成了一程度的壓力，但我想環保問題，會嚴重得多。

李河清：環保問題在中國就是以災難的方式呈現，如松花江、鼠患。真是太恐怖了。

黃默：我想民運想推翻中央共產政府，可是我想壓倒政府的會是環境問題。

李河清：奧運似乎也是由中國意志來運行，如強制遷廠，還有不准讓奧運那天下雨。又比方，不讓任何車子上街。八月八號是冬末春出，開幕是六月，因為都有過沙塵報，又為了討吉利，所以定了個八月八號，二零零八。我很同情那三十幾位科學家，被賦予不雨的任務。粗暴地以人為干預自然，我時在想不通，奧運與政治的研究又要再起高峰。而且規定，任何不涉及北京的都不准出現在市區的道路上，這些外地人若是沒有了，那我可以斷言北京人都不要吃早飯了，那些賣早飯、水果的其實都是各地方人民進來供養北京市的。這是一個奇怪的作為，不能想像，遲早可以寫篇文章。

黃默：我想您可以寫篇文章。

李河清：我很同情那三十位科學家，國家賦予這樣的任務。

黃默：您看，政治與運動、奧運歷來關係密切。到了中國更是登峰造極之勢。這個看來太有趣了，您不寫一篇怎麼行呢？！

李河清：這些破壞自然的行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怎麼會有這樣的主意？奧運與政治可以再來一次。

黃默：對。中國遷都的可能性是一步步的增加。

李河清：應該是設在南京。當初定都的是兩百萬人，現在是一千餘萬人，根據250公釐降雨線，已經逼近北京了。觀察打井，以前一百公尺就有水，現在就算打到六百公尺也沒有。

陳宏銘：下雨比不下雨容易，那能不能讓他提早下雨。

李河清：這是中國科學家目前的想法，企圖催化大氣中的降雨。而且為了改善空氣品質，下令任何工廠都不能再繼續進行。

黃怡碧(報告人)：(詳細內容請參見「研讀綱要」，以下紀錄內容為針對口頭報告之補充)

黃怡碧：我覺得這章的問題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誰可以決定、誰可以或應該基於何種主張，如何干預誰的何種行為？作者認為只有在某國的政權嚴重違反人道時，也只有UN在討論後的授權同意之後，才能進行。

這裡又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的軍事干預，因此該書從歷史的觀點來談干預的必要，又將干預分成兩種，一種是國際法，另外一種是以軍事干預的行動，而強調

唯有透國聯合國這樣的機構才能發動對個別國家如有侵害人權的行為做出干預。

由此，干預是否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主權行為？或民主這種體制能否預防種族清洗的行為？從聖經的歷史經驗，作者認為因為種族清洗的發生，迫使我們必須放棄傳統對於主權的觀念。作者進一步分析造成種族屠殺的原因。

簽約國有權力對違反的國家進行追訴。

道德相對論無助於跨文化的溝通，然而，回到非民主政體的統治來源，較能提出干預的正當性。但是，對於人民的決定權，仍舊應該尊重。

由於歷史的教訓與代價，我們需要有一個可以干預的空間。而干預的方式則以能帶來赫阻效果的軍事行動。並且，目前應該由聯合國，透過一群代表的討論，授權給予武裝的行動。

干預是權利或義務？作者透過康德、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看法，前者否定任何武裝的干預，後者認為在一套明確的規範之下，是可以進行干預的，而作者同意 Lassa Oppenheim 或者 Waltzer 的立場，在任何地方發生違反震撼人類道德的行為，然而，外國的干預不應該是優先的選項，而應尊重主權國家的管理。

公開的民主程序，應能制止傷害的程度與行動的不合理性。

在結論的地方，作者認為干預應該是種責任，當一個國家以無法保護他的人民，該干預的時候就要去干預。以上是我的報告。

討論

蔡竟予：我想到聯合國維和部隊對於駐守國的性侵行為？

吳景義：美國對於國際法採不理會，那麼作者又如何美國在聯合國的問題？

黃怡碧：我覺得作者也認為只能用呼籲的手段，希望美國能自重。

黃默：試圖回答竟予的問題。性侵的行為已經不是新聞了，但是在Peter Singer的理論中，似乎不影響對於聯合國或改造聯合國的期待相衝突。

另外，是有關於權責的問題。韓戰以後，美國刻意通知蘇聯的代表，蘇聯代表沒有參加到現在還是疑問。聯合國目前仍舊沿用大會的形式，以維和為目的來進行干預。而今後的干預，在聯合國的改革之後，比如說擴大安理會、避開否決權的使用。另外一方面，蘇聯的力量在解體之後也消失，而美國的力量也消解中，所以依我的看法，也是比較有機會繞過這兩國的否決權，因此，似乎使朝向干預的路在走，對於主權的侷限逐漸。

黃怡碧：作者強調若不能遵守比例代表的原則，就只能給他一票，但我想這還是無法解決美國可能使用否決權的問題。

林正弘：如果是以國家的人口比來說的話，就不應該如此。代表必須能代表自己，而不能完全聽從獨裁領導。聯合國能否去干預非會員國？

黃默：這個問題已經被傳統國際法解決了，國際法認為，非會員國若在重大違反文明國際社會的習慣，是可以干預的，也把這個當作一種習慣法。

黃怡碧：現實有這的例子嗎？

黃默：應該有。人道干預歷來被詬病的是在於，若非透過一個國際的機構，比方說Annan對於NATO在科索沃（Kosova）的行動是有批評的。若能透過一個國際的組織，正當性就會多一些。

林正弘：有人控告過聯合國嗎？我想做為一個「機構」（控告）應該是可以的。大概快十點了。

黃默：好，謝謝大家。今年就結束了。非常謝謝。

全文完